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黃蘭嫻

探討兼具調解經驗之修復促進者在修復
式司法中的理念與實踐

Exploring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the Facilitators
with Mediation Experiences in Restorative Justice

研究生：曾子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犯罪學研究所碩士班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論文

研究生：曾子奇 撰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題目：探討兼具調解經驗之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司法中
的理念與實踐

論文考試委員：

召集人

許福生

委員

許福生

委員

黃蘭娛

委員

許春金

指導教授

黃蘭娛

系（所）主任

許春金

論文口試及格日期：101. 7. 26.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6 日

謝誌

悠轉二十年，彈指一揮間。這麼快，我就不能再拿新莊外野參觀券了。無論有意無意，一再推遲此刻的到來，背後沒有爸、媽、妹的支持和包容是不可能的，你們也許不贊成我的想法，但總是讓我走自己想走的路，對於這一點我由衷感激。紙短情長，短短四行當然不夠，兩頁謝誌還是太少，就一如往常地盡在不言中吧。

吳秀英老師教我靜思語(雖然我現在還是每天口吐毒蛇)、王金燕老師期許我文質兼具(還是好難)、馮輝洪老師作為我之所以為現在之我的啟蒙(不知是好是壞)、潘、玉萍作為我九年良師，這些我都深深記在心裡，一切恍如昨日；與岳、吳、融、聿等人構築的童年記憶，儘管日後各分西東，有些事情還是依舊清晰。謝謝當時還好現在雖也很少見但很要好的阿古。最後要謝謝最老也最好的號稱一輩子的朋友，在所有朋友中，我最希望你得到幸福。

參加修復式司法研究案可以說是研究所生涯在學術方面唯一可以說嘴的事情，所以當然要謝謝黃蘭嫻老師帶我入門，以及過程中種種的指導，老師放心讓我們主導訪談帶來許多未來可能不會再有的經驗，這很棒；老師在得知我們竟於論文進度落後時跑去環島十三天也微笑以對，這更棒！謝謝許春金老師和謝如媛老師二話不說便擔任我的口委，也謝謝許福生老師在謝老師因出國不能續任口委時一口答應臨時救火，並謝謝大家對論文的批評、指教，也謝謝各個深具熱忱的受訪者。謝謝周憐嫻老師總是一直容忍我拿一錯再錯的公文去蓋章，謝謝王雅各老師的啟發。謝謝主掌行政事務的助教，幫忙行政事務的助理尚蔚、琬玲、力瑋、吳南、苑芬、佳芸、怡暄，最感謝常常被我拿公文事務去煩的千涵。

吳齊殷老師說過，一篇論文要有一個關鍵句，讓人看得出你的熱情在哪，我可能沒辦到，但一定會記得您的教學熱情；跟我同時間進入這個所的林老師真的可以稱作亦師亦友，搞不好友的成分還多一點，你堅持平素相處不展權威的信念很令人欣賞，不過有一點你可能搞錯了，如果是那條自在線，我的位置可能在很右邊才對，如果現在偽裝得不錯，那一定要歸功於那群王八蛋高中摯友：稼、賭、旭、洪、禿、釗、逼，因為好像這輩子都會常連絡，所以就不多說了，那些相挺的日子我都會記得，深深地記得。

謝謝我其實最尊敬的學長含及，出於這份尊敬，我還得在自己論文的謝誌幫你補謝喬茵(一次)，以後別再抱怨我們沒大沒小了好嗎？謝謝喬茵(兩次)，因為你是跟著我們 B93 世代成敗起落一路走來的經理，也謝謝你後來的一切批評、指教、鼓勵，我會記得 Nothing to lose, but everything could get. (茵，2012)

謝謝政治系棒的所有學長、戰友和經理，沒有你們與這個團體，我大學時期的記憶將是一片空白，一篇五萬字的戰史應足以表達心意；謝謝北大棒球隊。加入這支球隊純屬意外，卻也意外找到另一個歸屬，連續兩年跟你們一起打進北區前四是我棒球生涯很大的光榮，但更高興的是，儘管升了碩三後，才認真地感受到你們真的就像我的弟弟一樣，但平素一起嘴砲、累癱、喊聲的日子還是可以超越年歲差距，希望在很久以後，我們還是有機會一起打球，唬爛一下往日榮光。謝謝北大最強的經理團，雖然年紀大了因為打球、比賽都很累，很少招呼你們，但你們用心做的每一個禮物我都會好好保存。

謝謝基層棒球服務社的夥伴們，在我出現認同危機、茫然不知所蹤地只想做點什麼證明自己存在的時候，願意一起攜手同行；謝謝小朋友們包容我的脾氣，我沒有給你們什麼，是你們給了我什麼，願你們未來都有自己的天空。謝謝洪伯伯，你的精神我永遠感念，願台灣棒球的未來，有朝一日能如你所願地展開，而我也能像你所溫暖期許地，在先把自己顧好之餘有能力繼續在這一塊努力；謝謝勇伯跟仲豪，希望以後仍有機會跟你們一起耕耘。

研所三年整體而言是蠻快樂的，跟 98 級這些傻子去過的地方、看過的電影、打過的壁球、籃球、足球，玩過的桌遊、瞎拼 ABC、殺手、暗做指令、拿破崙等族繁不及備載活動的時光，不用等到以後，我現在就已經很懷念了，你們知道碩三之後有多麼難湊咖嗎？謝謝犯研所的大家長期忍受嗓門大、脾氣差、常常出包、難相處的我；謝謝驚爆十三天時義不容辭答應幫我代班的同宗柏康、最自在的彥岑、辛(ㄈㄣˊ)苦(ㄊㄧㄢˊ)的工讀生嫵如、最會吃美食的瓊雯。

然後要特別用一段謝謝樂維，研所生涯不停地搭你便車(但到底是哪台車我還是沒記住)、開你玩笑(趕快交出台北票房的檔案好嗎)，環島時也不斷地勞煩你補胎、帶路，真的是太、爽、囉，不過回想起這三年，我最懷念的，恐怕還是漫無目的在三峽開車漫遊的那些夜晚吧？別忘了桌遊店跟協會的約定啊！

許為知己猶按劍。碩三上傍晚練完球、回研究室寫個兩小時、晚上十點從三峽沿環河騎回永和的路上，碩三下晚上值完班從民生沿建國回家的途中，疲憊的腦中總不時冒出這樣的自我質疑：一個在實踐上並不修復的人，以修復為題來寫論文的合理性在哪？也許這是我最大卻也最無法寫入本文的研究限制吧？傷人的、受傷的、回得去的、回不去的，當物換星移，修不修復好像也無關緊要了。有朝一日，當世事再無完美，只盼仍能遠在歲月如歌中，想起當初的那個自己。

國立臺北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 探討兼具調解經驗之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司法中的理念與實踐 論文頁數：137

所 組 別： 犯罪學研究所 **系(所)** **組 (學號：** 79864101 **)**

研 究 生： 曾子奇 **指導教授：** 黃蘭嫻

論文提要內容：

法務部於 2010 年開始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這也是我國首度將修復式正義之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在此之前，我國對於修復式正義的討論有一部分集中於現行制度是否可能與修復式正義精神相通，而傳統調解便是論者著墨甚深的一個部分。而傳統調解和修復式司法方案究竟有何不同，亦為一般民眾甚至修復式司法操作者所困惑之處。於此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有些修復促進者兼具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主持之經驗，因此本文希望透過探討這些修復促進者對於制度異同之理解，以及他們在試行方案中之親身實踐，針對此議題做初步的探討。

修復促進者皆認為修復式司法應有別於傳統調解，但修復促進者在實踐上之操作普遍難以擺脫傳統調解式的作法，這是由於開案階段、評估階段所未能解決的問題，一般而言也無法藉由對話階段解決，其中責任議題未能釐清之結果，使得加、被害人對話聚焦於案件本身，爭執彼此的責任，使得對話走向朝向傳統調解式的目標(問題解決)，無從促進修復式司法目標之達成。

評估標準的嚴謹程度左右了對話前準備工作的多寡，而這其實反映了修復促進者心中對於「修復式司法目的」和「加、被害人對話目的」理解的差異，實則為此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所推動之主要模式為 VOM 方案所可能出現的矛盾。研究結果發現，若因推動模式為 VOM 而不為加、被害人對話設定嚴格的前提要件並確切執行之，便難以達成修復式司法之目標。

修復促進者的理想和實踐有其落差，反映出人的因素可以左右制度的成敗，因而在修復式司法中可能產生修復調解化的情形，但反過來說，也存在將修復式司法精神注入傳統調解制度，使其產生新面貌的可能。修復促進者普遍認為無論在鄉鎮市調解制度或家事調解制度中，若能將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對於問題的解決會更有幫助，因為緩解雙方的敵意關係會使問題的解決更為迅速，也使得案件因未能徹底解決而再進入調解程序的可能性降低。

具體而言，必須就案件實際情況來研判情感、關係修復對於問題解決的必要性，如有必要則作法有二，一為以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於調解程序，一則是在既有的調解制度之中，直接注入修復式司法之精神，使得主持程序之鄉鎮市調解委員和家事調解委員，皆對修復式司法精神有所了解，具備於調解程序中運用修復式司法精神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敏感度。關於何等案件需要情感、關係修復前置，在創設修復式司法新制度或於既有制度中注入修復式司法精神間該如何抉擇等相關問題，有賴後續研究做更深入的探討。

關鍵字： 修復式正義、鄉鎮市調解制度、家事調解制度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the Facilitators with Mediation Experiences in Restorative Justice

by

TSENG, TSE-CHI

July 2012

ADVISOR: Dr. LANYING HUANG

DEPARTMENT: GRADUATE SCHOOL OF CRIMINOLOGY

MAJOR : CRIMINOLOGY

DEGREE : MASTER OF LAW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started promoting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Pilot in 2010 --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idea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have ever been applied to Taiwanes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revious discussions about restorative justice focused partly on whether the existing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ad the spiri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hus, traditional medi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researched issues. However, the cru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mediation system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pilot puzzle both ordinary people and even restorative justice operators. Hence, in interviewing six facilitators who have experiences as township mediators or family mediator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amine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and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with regard to their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Pilot.

The facilitators interviewed hold that restorative justice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raditional mediation system. However, its practices generally cannot refrain from the shadow of traditional mediation system.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solved during the case-opening phase or the assessment phase generally cannot be solved in the dialogue phase, either. Among all the problem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e responsibility-taking issue -- if it cannot be solved in the early phases, then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focuses on the case itself, steer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versation toward traditional mediation (problem-solving) rather than restorative justice.

The gap between ideals and practices shows that human factor wields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onetheless possible to instill the spiri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raditional mediation systems. Facilitators assume that, whether in the township mediation system or in the family mediation system, preceded restorative justice processes would help solve the problems by reducing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victim and the offender. Whether to create a new restorative justice system or simply inject restorative justice spirits into the exist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 : restorative justice, township mediation system, family mediation system

《探討兼具調解經驗之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司法中的理念與實踐》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一、調解之歷史淵源	1
二、近代國家主導刑事司法制度之弊病	1
三、調解之發展	2
四、修復式正義之興起	2
五、修復式正義在我國	2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3
一、研究動機	3
二、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名詞釋義	4
一、修復式司法	4
二、調解制度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
第一節 修復式正義之理念與實踐	6
一、修復式正義之定義與內涵	6
二、修復式正義的全球實踐	11
三、我國的修復式正義實踐	13
第二節 我國調解制度	19

一、鄉鎮式調解制度	20
二、家事調解制度	23
第三節 我國調解制度和修復式司法方案之比較	29
一、制度目的之比較	29
二、達成制度目的流程之比較	29
三、制度使用階段之比較	30
四、居間第三者資格要求之比較	30
五、參與者及其定位之比較	30
六、準備工作多寡之比較	30
第四節 調解實務有無修復式正義內涵	31
一、郭元宏(2005)從修復式正義探討調解委員會刑案調解之效能	32
二、夏化祥(2006)研究具修復式正義內涵之刑案調解	32
三、黃政達(2006)對我國修復式正義與刑案調解機能之實證研究	33
四、李浩然(2007)從修復式正義探討鄉鎮市調解委員之婚姻暴力調解策略	33
五、綜合討論	34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38
第一節 研究流程	38
第二節 研究架構	39
第三節 資料蒐集	39
一、研究方法：深入訪談法	39
二、訪談大綱	40
三、訪談對象	40
四、研究案例	41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研究信、效度	43
一、資料分析：研究者	43
二、研究信、效度	43

第五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倫理	44
一、研究限制	44
二、研究倫理	45
第四章 研究發現	46
第一節 受訪者對修復式司法之理解	46
一、推動修復式司法之目的	46
二、開案標準	54
三、分工方式	56
四、評估標準	56
五、責任歸屬	59
六、小結	61
第二節 受訪者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實踐	63
一、案件來源：當事人自行申請或由其它機關轉介	64
二、開案與否之評估標準	66
三、對話前準備與評估	67
四、對話與對話結果	72
五、小結	85
第三節 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比較	87
一、修復促進者對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比較之認知	87
二、修復促進者主持修復式司法之方式是否近似於傳統調解	90
三、小結	97
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	99
第一節 結論	99
一、不同制度均有當事人對話的過程，但制度目標之不同形塑出歧異的 操作方式	99
二、修復促進者認為修復式司法異於傳統調解制度但實踐上仍帶有調解	

的影子.....	99
三、受訪者理想與實踐之差距主要出於所受之訓練有限、評估階段欠缺 實質標準以及準備工作不足	100
四、修復調解化的主因為未釐清或礙於現實難以釐清案件責任歸屬.....	100
五、受訪者以傳統儒家文化來理解「關係修復」之意義	100
六、「人」的因素對於「制度」之成敗有重大影響	101
七、將修復式司法理念導入調解制度有其可能性與必要性	101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02
一、對修復式司法方案的建議	102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03
參考文獻	105
一、中文文獻	105
二、英文文獻	107
附錄一 鄉鎮市調解條例	110
附錄二 地方法院辦理家事事件調解實施要點	117
附錄三 家事調解作業流程圖	119
附錄四 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	121
附錄五 訪談大綱	133
附錄六 訪談同意書	136
附錄七 研究者逐字稿編碼分析過程範例	137

表次

表 2-3-1	傳統鄉鎮市調解、家事調解、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比較.....	31
表 3-3-1	受訪者資料.....	41
表 3-3-2	修復促進者處理之代表性案例.....	42
表 4-1-1	修復促進者所受之教育訓練.....	47
表 4-1-2	受訪之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及對話目的之看法.....	51
表 4-1-3	受訪的修復促進者之專業背景、經歷與調解經驗.....	52
表 4-1-4	修復促進者對於對話前或對話時應否釐清責任歸屬之看法.....	63
表 4-3-1	修復促進者對於制度之間精神是否相通的看法.....	89

圖次

圖 3-1-1	研究流程.....	38
圖 3-1-2	研究架構.....	39
圖 4-1-1	修復促進者之學經歷背景、其認知的修復式司法目標、對話目標 和評估標準之關係.....	62
圖 4-2-1	各個代表性案例之責任議題於各階段處理情形及最後結果.....	86
圖 4-3-1	各階段易使修復促進者之實踐偏向傳統調解的情形.....	9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調解之歷史淵源

自有人類開始便有紛爭。在西方社會之初，主要是以氏族(gens)這種血緣團體作為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成員之間有共同的祖先、共通的氏族名、祭壇及墓地，此一時期是一個團體至上的時代，不存在所謂的孤立的個人的觀念，這種身分狀態決定了法律型態(不區分公、私法)及紛爭解決的處理程序。由於當時並不存在個人的觀念，氏族內的紛爭是由族長依通用習慣加以仲裁，而當紛爭出現於不同氏族間之成員時，紛爭的解決並不是個人間的問題，而是氏族與氏族間的紛爭，由於缺乏一個上位權威的存在，氏族間為了保護其所屬成員的利益及維繫整個氏族的生存，會以血仇復讎的方式來解決紛爭，在極端的情況下，雙方氏族可能因單一紛爭的發生就面臨瓦解。因此為了確保社會和平及切斷復讎循環，以和解(例如給付贖罪金)來解決爭端的方式出現了，決定贖罪金多寡的調停第三者也因運而生(李卓儒，1997)；而在東方，我國傳統上即一直存在調解文化，自古以來便存有許多由民間自行調解糾紛的制度。由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社會上相當強調非正式社會力量的控制及預防犯罪為優先，因此重調解而輕刑罰，在繼受西方法律文化的同時亦保存也為人們偏好的是傳統止爭息訟的調解文化(林端，2002；黃蘭嫻，2011)。

二、近代國家主導刑事司法制度之弊病

西方社會到了中古時代仍無組織化的刑事司法，受害者由其家族或領主支持協助，來與加害者解決其所遭受到的傷害。犯罪事件的處理是被害人的責任，他可以僱人逮捕重刑犯，也可以自行起訴加害者。犯罪發生後由犯罪之被害人或其宗親啟動刑事追訴程序的這種模式稱為「被害人追訴」。到了當代國家形式的政府出現後，所謂的「國家追訴原則」開始盛行，認為犯罪應由國家本於其職權追訴並處罰，犯罪的預防與制裁被視為公共利益，私人賠償的制裁方式逐漸轉化為公法上的刑罰，這種刑罰的科處必須經過國家的刑事追訴程序始得為之(許春金，2010；林鈺雄，2006)。西方社會這種由國家主導刑事追訴程序的方式，到了近代產生了三個問題：一、法院無法負擔過多訴訟案件所帶來的壓力；二、案件趨於複雜，單一法官無法解決高度專業化的紛爭；三、被害人地位之低落。台灣社會受到西方社會現代刑事司法制度影響，就歷史而言雖是相當晚近的事，但亦不能免於國家壟斷刑事司法程序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深植於文化基底的調解於是成了重要的解決方式。

三、調解之發展

西方近幾十年來訴訟外紛爭解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簡稱 ADR)機制日益受到重視,即因訴訟事件過多,因此法院希望藉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的發展,減輕其因負擔過重所造成的壓力(蔡文育,1994),調解(mediation)即為 ADR 的其中一種;我國受到西方近代法制影響乃自日治時期開始,中西文化的交會使得中國傳統調解文化有了西方近代調解機制之色彩,我國現行鄉鎮市調解制度之調解委員,即是由鄉、鎮、市長遴選鄉、鎮、市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擔任,由其動之情理、居間斡旋,勸導相互退讓以促進鄉閭和諧,是我國傳統社會中用「以和為貴」為宗旨處理紛爭的方式之延伸,但此一制度所帶來紓解訟源的效果,不能不說受到西方影響甚深,兩者交融形成如今的面貌,也大大影響了鄉鎮市調解委員對於自身任務的理解。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變遷迅速,案件的複雜程度也與日俱增,法官能否面面俱到著實不無疑問。以我國而言,以往我國之民事事件承辦法官亦須辦理家事事件,但家事事件當事人與一般民事事件當事人的特質不同,若以相同方式處理,往往無法真正解決家事紛爭。因此,我國於民國 94 年開始試辦家事專業調解,民國 97 年試辦期結束,各法院皆須依「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正式實施家事調解制度,期能對家事事件之特殊性為妥當之處理(謝靜慧,2005;張淑芬,2008)。在家事調解制度中,家事調解委員必須具下述資格之一始得受法院之聘任:心理師、社會工作師、醫師、律師、具有心理諮詢或心理諮商之學經歷者、具有家事調解專業經驗者或曾任法官者。這些資格之要求是針對家事事件的特殊性而來,制度的運作與其設置之目的有其特殊性。

四、修復式正義之興起

在近代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加害人不再被認為是侵害被害者的犯罪者,而是被認為侵害國家的犯罪者。加害者的賠償是對國家、社會,而非被害人;犯罪被害者成為案件的背景與陪襯,程序的決定權也由檢察官主導。被害者在近代國家刑事司法制度中受到忽略的狀況於 1970 年代開始引起廣泛討論,學者、被害者、司法政策決定者等紛紛對於刑事司法體系中被害者的缺席表示不滿,被害者運動於是在歐美社會風起雲湧,與許多有關思潮相互輝映,其中修復式正義的發展便與被害人權益運動有著密切關聯,修復式正義強調以社會而非法律的觀點來看待犯罪事件,尋求加害者、被害者及社區三者共同之復原,被害人於修復式正義方案中重回程序主體之地位,有權尋求物質補償以及情感之修復。

五、修復式正義在我國

我國於民國 99 年由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由八個地檢署作為試辦單位,遴選具有法律、心理、諮商輔導、社會工作背景或有參與加害人或被害

人之助人工作經驗者擔任修復促進者，以中立第三人之角色，協助當事人經由對話完成犯罪傷害之修復。在試辦地檢署的實際操作中，各地遴選修復促進者之方式各有不同，在各地檢署實際執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有一些修復促進者同時兼具(或曾經具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調解委員或家事法院之調解委員的身分及經驗，本文即以此為背景作為探討的出發點。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 探討我國調解制度與現行修復式司法方案有何差異

由鄉鎮市調解、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所從出的背景之探討我們可以發現，鄉鎮市調解雖源於「以和為貴」的傳統，但於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中，調解之目的亦在舊有理念之上再添「疏減訟源」之色彩；家事調解之出現乃為針對家事事件相對於一般民事事件的特殊性；修復式司法所秉持之理念乃是修復式正義，其係為解決傳統刑事司法體系偏重加害人一端因而忽略被害者及社區的弊病而生。這些制度要解決的問題雖因其制度所從出的理念和宗旨而各有差異，但在實踐上，這三個制度卻有極其相似之處。

鄉鎮市調解所要解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這點在家事調解中並無二致，只是這時候當事人之間具有親屬關係；我國修復式司法制度所採之加、被害人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簡稱 VOM)模式，其本質仍是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在這三種制度中，其共通之處在於其解決問題的方式，同樣都強調利害關係人以面對面的方式自主地決策出屬於當事人自己的解決之道。由於這種解決問題過程的相似之處，研究者於參與法務部委託台北大學進行之「修復式正義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研究案時，亦常聽聞身在司法實踐場域中的實務人員提起「修復式司法究竟與調解制度有何不同」的疑惑，而其各自對於調解與修復式司法異同的理解亦深深影響實務上之作法。

(二) 探討為何在現行調解制度外還需要修復式司法方案

調解、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都是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發生的問題，且其達成解決方案的途徑都是透過紛爭之利害關係人以面對面方式討論進行，那麼這三個制度何以在現實上有所不同？其中當然牽涉到其發展源頭、理念、目標、精神，但實然並不等於應然，一個存在已久的制度如果不能妥善應付所有情況，那麼發展另一個制度便勢在必行；相反地，眼前有著三個不同的制度，並不代表它們本質上就不能合而為一，如果一個制度在運作上本身就能涵蓋其他制度的功能，那便沒有必要再設計其他制度疊床架屋，在功能重疊之處，若一制度能將某功能發

揮得淋漓盡致，那另一制度便沒有必要再將其視為己任。因此，若能釐清三個制度間的關係，便可找出其是否存有可相互截長補短、分工合作的空間。

（三）發掘曾有調解實務經驗者如何理解與實踐修復式司法中的對話

此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推行，在修復促進者一職上，不乏先前或至今仍有擔任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主持經驗之人，在試行方案已推動了一年有餘且打算繼續擴大試辦規模之際，本文試圖以這些人的經驗出發，探討其對於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制度的理解為何？其理解又如何影響其自身角色之扮演？他們認為這些制度之間是否有可以截長補短或融會貫通之處？

本文另一重點在於瞭解修復促進者於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之實踐，是如何受其背景、經歷、理念等因素影響，並於試行方案制度之中實踐其理念，在此過程中，他們的實踐方式又在什麼程度上與其在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程序中的作法有所不同或相似？本文不擬採取批判角度看待這些相同或相異之處，毋寧是採取詮釋的觀點，試圖去解釋這些修復促進者間理念的不一致或其自身理念與實踐間產生的矛盾是何以致之，而這種情況又會導致修復促進者所處理之案例出現什麼問題，以為未來方案之開展作出建議。

二、研究目的

- （一）探討鄉鎮市調解制度或家事調解制度與修復式司法方案之異同。
- （二）探討促進者對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及修復式司法方案之理解與實踐。
- （三）以修復促進者的經驗探討各制度相互配合之可行性。
- （四）探索未來調解制度和修復式司法方案的發展方向。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修復式司法方案

Restorative Justice 一詞在離開英文世界後並沒有清楚的界定，這點無論在日本或我國都是同樣。在日本，基於著眼點的不同，有學者將其譯為「損害回復的司法」，亦有學者翻為「宥和的司法」，也有人認為應翻為「關係修復的司法」。多數文獻選擇的譯法是「回復的司法」或「修復的司法」，而後者逐漸成為日本學界統一的翻譯名詞；在我國，有將其譯為「恢復的正義」或「復歸性正義」、「復歸式正義」，亦有將其翻為「修復式正義」（李育儒，1997；黃翠紋，1998；許春金，2002；陳珈谷，2002；陳祖輝，2004）。

法務部此次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在其實施計畫的前言闡明：「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對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們，即加害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甚至社區的成員或代表，提供各式各樣對話及解決問題之機會，讓加害人認知其犯行的影響，而對自身行為直接負責，並修復被害人之情感創傷及填補實質損害。」在前言中本計畫亦清楚寫道：「修復式司法是相對於以刑罰為中心的現行刑事司法制度」，而在法務部針對此方案委託台北大學進行之研究之計畫，係將此研究命名為「修復式正義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

因此可以看出，法務部此次推行的計畫是「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而其所秉持之理念為「修復式正義」，兩者之源頭同為 *restorative justice*，差別僅在著眼點之不同而已。許春金(2002)認為 *restorative justice* 旨在提倡人類互助及互相關懷之共同責任，並非僅與犯罪有關，而是和我們每天生活中所遭受到的各種損害、衝突有關，因此將其譯為「修復式正義」。如此看來，修復式正義應是一可廣泛運用在各種領域之理念與方式，當它運用在刑事司法領域來處理犯罪行為時，便是修復式司法。然為避免因兩者英文原文皆為 *restorative justice* 而產生混淆，因此本文於提及法務部推行之計畫時皆稱之為「修復式司法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本次試行方案所採之主要模式是「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VOM」，VOM 僅為修復式司法的模式之一，亦為本研究關注焦點之所在。

二、調解制度

最廣義的調解泛指由一個紛爭雙方皆可接受的第三人來幫助當事人透過合作而非對抗的方式來解決紛爭(楊利華、于麗英，2006)，這種方式在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而且東、西方皆然，隨著時代演變，調解的型態也日趨多元，可根據其模式、應用領域、在刑事司法中的階段等標準進一步區分，且在不同的文化、政治體制下會產生不同的調解制度，故「調解」並不等於「調解制度」，本文所研究之調解則包括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調解制度以及法院之家事調解制度。

我國的鄉鎮市調解制度可處理民事案件以及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而所謂的家事調解，簡單來說係將家事事件以調解的方式來處理。將家事事件自民事事件中抽離，就人類歷史而言是相當晚近才出現，區別民事事件與家事事件之必要性來自於家事事件之特殊性，此特殊性使得家事事件之處理更添專業之需求。在家事調解的應用上，這種需求呈現的是中立第三者專業化的必須性，在這種理解下，Folberg 和 Taylor(1984)對調解之定義或許在家事調解之上會更加恰當：「調解是透過受過專業調解訓練的中立第三者，協助糾紛雙方以商議或談判的方法處理及解決他們的糾紛，達到互相和解和滿足雙方的訴求。」從中立第三者必須受過專業訓練此一面向而言，家事調解是一種專家調解。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修復式正義之理念與實踐

修復式正義是一個全球性社會運動，其目標是要轉變當代社會對於犯罪及偏差行為的看法及回應方式，具體而言，它是要以根基於社區的賠償式正義和道德化的社會控制來輔助既存之高度專業化的懲罰式司法及控制體系。然而其倡議者對於修復式正義的本質究竟為何看法並不一致：有人將其視為可用於刑事司法體系中的新社會技術或計畫；有人希望能以之廢除國家懲罰，代之以根基於社區而有教導、治療、賠償和修復受害者、加害者及社區功能的回應機制；也有人認為修復式正義的終極目標是要改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及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之看法(Sullivan and Tift, 2001；Johnstone and Van Ness, 2007)。

一、修復式正義之定義與內涵(Johnstone and Van Ness, 2007)

修復式正義這個詞看起來並沒有單一而既定的解釋，一個問題在於人們是在不同的脈絡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這個詞，有些修復式正義的支持者甚至主張或暗示他們所使用的概念才是最正確的，而將應用於非修復式的實踐或議題納入修復式正義的範圍只會更加混淆概念。Johnstone and Van Ness(2007)認為定義修復式正義之所以困難，第一個原因在於它是似乎是個開放的、變遷中的概念，例如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最常見於北美對於加、受害者調解(VOM)實驗的脈絡中，這些計畫往往只有加、受害者及修復促進者參加，修復促進者通常是受訓的社區志工，然後在1990年代初期，新的會議(conferencing)方式出現，在紐西蘭和澳洲隨即被認定為修復式正義的一種形式，更多人(包含家人或朋友)被納入會議中，討論更廣泛的議題；另外，在修復式正義所應具備要素的討論中往往會提及下列要素(Johnstone and Van Ness, 2007)：

- (一) 使利害關係人得於其中自行討論、決策的非正式程序
- (二) 對被害者的增權之強調
- (三) 修復促進者應確保加害者負責及賠償以使其重返社區。
- (四) 修復促進者確保協調過程和結果符合以下幾個原則或價值：
 - 1.當事人間彼此展現尊重。
 - 2.避免暴力和強迫(coercion)的成分

3.包容(inclusion)優先於排除(exclusion)。

(五) 修復促進者重視被害人受到的傷害及其需求並積極處理。

(六) 強調促進或修補人際關係，並以良好關係的力量來解決困難的情況。

以上各種要素如果都具備，沒有人會否認該程序是修復式正義的體現，但是問題在於：沒有具備全部要素的實踐是否仍屬於修復式正義？此時便端視每個人對各個要素看重的程度及其著眼點何在而定。當我們在談修復式正義時，不應過早將其視為具有固定內涵的概念，以免做出錯誤的判斷。在這些概念中，Johnstone and Van Ness(2007)再將修復式正義的定義問題整理為三個觀察面向：遇合¹(encounter)面向、修補(reparative) 面向以及轉化(transformative) 面向：

(一) 遇合(encounter) 面向

1.內涵

近幾年在社會對於犯罪事件的回應上，一些新方案開始設計、發展和採用會面的方式，例如 VOM 和修復圈。這個程序最獨特的是由加、被害人及被犯罪所影響者，在安全且具支持性的環境中會面，於討論及決策中扮演主動的角色。在修復促進者的協助下，利害關係人能夠彼此尊重地公開陳述發生了什麼事情，表達他們的感覺及討論彼此可以為此做些什麼。這被視為「民主式經驗」，因為在程序中，受到影響的人們可以自主地討論如何解決問題(O'Connell et al. 1999)。專家與政府官員大多數時間隱藏在幕後，使利害相關人能夠自行決策(Christie, 2003)。此一面向的支持者認為，當遇合程序被應用於適當的案子並被適當地主導，一些有益的結果就會出現，有些在刑事司法體系中聽來很熟悉：矯治(rehabilitation)、嚇阻(deterrence)與重建道德規範；其它益處對於司法系統而言是新穎的：提供被害人獲得賠償的方法、使其有機會涉入對於犯罪後果之決策、有助於減少恐懼和增加安全感，並可幫助他們瞭解促使加害人犯罪的情境(Robinson, 2003)。這種轉變的潛能被視為能使當事人達到個人成長的方式。

為什麼遇合方式在回應犯罪方面會被視為比起法庭更好？因為最直接受到討論及決策影響的人有權利以有意義的方式參與討論及決策的過程，就算干擾到司法程序有效率地進行，或是對於問題的解決之道被專家們視為不明智的、錯誤的、愚蠢的，或並非屬於當事人最佳利益的，這個權利仍需受到尊重，此面向的支持者亦認為，這樣的程序整體而言對於達成有益的結果是有幫助的。

2.質疑

¹ 本文將 encounter 譯為「遇合」，此詞彙係參考鄭美里(2008)之用法，取其「遭遇」之字面意義，亦取其諧音「癒合」以借喻加、被害人可能藉「遇合」之機會所達成「癒合」之修復效果。

上述遇合面向的兩大支持論點使得一個問題浮現：到底遇合之過程是因其為利害關係人的「權利」(於程序中的自主權、決策權)而重要呢？還是因為遇合過程有辦法產生「好」的結果而重要？衍生的問題是，到底「未以修復式方法進行的遇合」及「無法達成修復式結果的遇合」是否落在修復式正義定義內？

如果認為遇合過程是因其為當事人的既有權利而重要，那麼必須瞭解的是，利害關係人的遇合不見得就能產生轉變的、修復式的效果：遇合可能是以非修復式的方法進行而產生非修復式的結果(Young, 2003)；另一方面，若認為遇合過程是因其能產生好的結果而重要，那麼要如何定位那些明顯未達成良好結果的遇合過程？這些是修復式正義失敗的例子？還是這些根本不是修復式正義？

(二) 修補(reparative)面向

1. 內涵

修補概念的擁護者亦認為應以革新的方式來回應犯罪。傳統上的假設是，若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犯下罪行，亟待修正的不正義狀態就會出現，因此加害者必須依其罪行的嚴重程度承受相應的痛苦。修補概念的擁護者雖承認犯罪造成不義，但認為將痛苦加諸於犯罪人於事無補，只能帶來短暫的成效而無法長久，因此應以其他方式來針對造成的傷害以及損害的關係，從而加害者必須做很多事情來修補物質上或象徵上之傷害。有些倡議者甚至認為，如果能夠完全以賠償方式修補傷害，加諸痛苦於犯罪者完全沒有必要。

對於此一面向的支持者而言，即便不存在遇合之過程，司法系統還是應該以填補而非加劇犯罪所生傷害的方式來回應犯罪(例如在沒有公共安全考量的前提下以賠償來代替罰款或監禁)。修補面向的支持者認為，修復式正義原則會成為影響刑事司法體系所有層面的深層革新動力，司法體系對所有犯罪事件都會產生新的修復式回應。也就是說，修補面向的支持者認為存在不含遇合程序的「不完全修復式解決方案」(partially restorative solutions)，這包括在正式刑事司法體系的管理者所命令、規制的賠償性制裁(reparative sanctions)。

2. 質疑

遇合面向的強力擁護者完全不認為「不完全修復式解決方案」應包含於修復式正義的定義範疇之內，對他們而言，官方介入的強制性干預、賠償措施欠缺了修復式正義最重要的元素：重要的利害關係人齊聚討論該如何處理與其切身相關之犯罪事件(McCold, 2004)。Roche(2001)認為，儘管修補傷害是這種官方介入手段的目標之一，這種賠償性制裁仍是官方強制加諸的措施，只是偽裝成修復式正義以自修復式正義的良好名聲中受益。

另有觀點主張遇合面向是達成修復面向的絕對前提，認為若要修補傷害必然得透過遇合程序：Zehr(1990)認為，被害者受害的主要原因是失去個人掌控感(sense of personal power)，犯罪破壞了被害者的個人自主性(personal autonomy)，而傳統司法處理犯罪時對被害者的忽視會更加破壞而非重建其個人掌控感。要改善這個缺點，必須使被害者有掌控感，或使其能參與程序之中，此程序能夠讓他詢問加害人以解決心中疑惑(這可能唯有透過面對面的方式才能達成)，並表達自己的情緒以及對犯罪事件之想法。

另外，修復式正義認為加害者其實也是自己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因為犯下罪行可能使他們受到社區的孤立，若要使加害者重新融入社區，則必須做一些事情來填補此一鴻溝(Burnside and Baker, 1994)，必要的方式之一是加害者要展現真誠悔悟，並願意為其所作所為作出補償，這可能必須透過與被害者見面並帶著敬意地聆聽其想法，回答被害者可能的問題，向被害者道歉並同意其所提出的合理彌補措施，以上所述的種種方式無不指向遇合過程。

(三) 轉化(transformative) 面向

遇合面向及修補面向的內涵雖有異，但兩者的目標都在於改變社會回應犯罪的方式，轉化面向與此兩者不同者在於它訴諸的是更徹底的翻轉。其支持者認為，修復式正義運動應該要能在日常生活中轉變我們瞭解自己及我們如何與他人產生連結的看法，沒有如許轉變，則任何想扭轉特定實踐的作法都不會成功，而且可能產生預期外的效果，就算成功了，對於促成一個公平社會的效果也只是短暫的，要完成這樣的任務必須要有更深層、廣泛的轉變。在轉化面向下，修復式正義被視為我們應該達到的一種生活方式，關鍵在於必須拒斥我們與他人生活於某種階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的想法，必須捨棄我們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觀念，相對地，要過著修復式正義的生活形式，我們必須捨棄自我，並將我們理解成與他人及外在環境有著內在關聯，並以此辨識自己(Sullivan and Tifft, 2001; Strang and Braithwaite, 2001)。

(四) 各面向間之關係

事實上，遇合、修補及轉化三個面向之間有許多共通點，而使得其各自的擁護者能往同一社會運動方向邁進，然而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一些難以解消的緊張關係。例如，若以會面面向在當事人不願見到彼此時即毫無用武之地來看，其涵蓋範圍較只要傷害得到回復即可的修補面向來得小；但若自會面程序可以應用在各種不必然要有傷害存在的爭議、問題或衝突的觀點來看，會面面向比起修補面向似乎又可涵蓋更多領域。而轉化面向的出現的確某程度激勵了會面面向及修補面向的擁護者，但他們大多並非將轉化面向視為實踐修復式正義的必要條件，而是視之為一種新技巧或心靈成長的方式，屬於一種工具性的手段。這三種相互有某

部分重疊卻存在本質上差異的面向，使得定義修復式正義的工作困難重重，修復式正義概念的開放性、時代變遷性及內部複雜性顯示了單一定義途徑是不可行的，我們不必心心念念想消除其中各式各樣的歧異性，而應瞭解到修復式正義內涵的豐富性，並採取一種新的視野來應用修復式正義措施，佐以修復式基準作為指引以免偏離修復式正義的方向。

(五) 檢討

如果我們將遇合面向視為修復式正義之核心，一如 Marshall(1996)對修復式正義所下之定義：「修復式正義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有與犯罪有關的當事人，共同對犯罪產生之後果及影響思考解決之道以邁向未來。」如此一來浮現的問題是，就我國而言，既存的鄉鎮市調解制度和家事調解制度是否與此定義位處同一條軸線？若將鄉鎮市調解處理之案件限定為刑案調解、家事調解處理之案件限為家暴案件，是否可以說這兩個部分其實都是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反過來說，是否存在將修復式正義運用的範圍擴張於犯罪事件之外其他場域的可能？以此取徑而言，是否在不限定案件類型的情況下，鄉鎮市調解制度和家事調解制度也存在實踐修復式正義的可能？

遇合面向涵蓋的不單只有「面對面」(face-to-face)一種方式而已，例如當事人間書信往返之方式當然也涵蓋在會面之中，它使當事人自決之方式同樣是透過當事人間之接觸。就這樣的立場而言，鄉鎮市調解、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制度之間似乎就更為神似。本研究中並不將修復式正義視為必須遵循的準則，而是在各個制度之間，找尋其共通或相異之處，而修復式正義是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存在：不具修復式正義元素的制度可能在解決某些問題上特別有效率，具修復式正義元素的制度也可能在某些問題上使不上力，反之亦然；如果認為修復式正義的精神對於人與人之間所產生問題的解決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也必須思索在鄉鎮市調解制度和家事調解制度之中有沒有直接納入修復式正義精神的可能。

將修復式正義的定義方式大別為「遇合面向」和「修補面向」，對於本文的意義在於區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和「修復式司法」的不同。必須強調的是，作為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主要模式的 VOM 只是眾多修復式司法模式的其中一種而已。VOM 模式自然是遇合面向的箇中代表，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所規劃的六大宗旨中則涵蓋許多符合修補面向的修復式目標，這樣的區分浮現的問題是：對於試行方案所規劃的六大宗旨而言，VOM 所代表的遇合面向是不是在各種案件類型、性質上都適於目標之達成？會不會有 VOM 並非最佳解的情形？若然，那可能的因素又是如何？修復促進者能否清楚瞭解兩者的不同？如果不能，又會對他們的實踐造成何等影響？

因此，本文不擬對於修復式正義之定義應以遇合面向亦或修補面向為核心下

定論，而是藉由遇合面向和修補面向擁護者意見之分歧為起點，探討在以 VOM 為主要模式的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修復促進者是如何理解(或未曾理解)這種歧異，他們是否認為要達成修復式司法目標必然得透過加、被害人對話？如是，他們對於是否適合召開對話的把關標準是否嚴密？這些都有待探索修復促進者對於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想法及其於過程中之實踐來做進一步澄清。

二、修復式正義的全球實踐

(一) 修復式正義實踐的四大型態

許春金(2010)指出，全球修復式正義的四個實務型態為修復圈(sentencing circle)、社區修復委員會或補償委員會(communitary restorative or reparation boards)、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和加、被害者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修復圈」是將加、被害者及其支持者，還有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員警及社區相關人士聚集，共同瞭解事件並討論如何治療受傷害的人們以及預防犯罪；「社區修復委員會或補償委員會」係由地方百姓經專業訓練後組成，與加害人討論事件並共擬補償計畫，加害人完成計畫後委員會便向法院提出報告說明執行狀況；「家庭團體會議」則是將受犯罪影響的加、被害者及其支持者和家庭人員聚在一起，共同討論事件的解決方式。「加、被害者調解」則是由被害者和利害關係人與加害者在安全的環境會面，進行結構性的討論，而這種討論往往是由受過訓練的中間人來召集、協助。

(二) 以 VOM 為核心的實務型態發展

這四種實踐模式看起來各有不同，但有沒有一條軸線能將其串起來呢？就出現的時間順序看來，修復式正義於近代司法制度中的最初形式應該是加、被害者調解：1974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一位觀護人 Mark Yantzi 對青少年破壞公物之行為(vandalism)作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回應，他認為直接讓加害人與其犯罪之被害人面對面並作出賠償，或許會帶來治療性的效果，這個稱作 Elmira Case 的計畫被視為加、被害者調解之始(Raye and Roberts, 2007)。Raye and Roberts(2007)認為，在某一段時間內，VOM 基本上是修復式程序的唯一形式，它最典型、最原初的形式是「一個被害人與一個加害者在一個促進者的主持下進行對話」，而許多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型態之所以各有不同，是因有經驗的實務人員將程序調整為適合當事人的文化脈絡，究其根本，這些形式仍都是在「修復式對話」(restorative dialogue)的框架下所進行。據此，他們以「參與者」、「決策權」和「討論範圍」三個指標，將修復式正義計畫分為六種形式(Raye and Roberts, 2007)：

1. 受促進之加、被害者對話(facilitated victim-offender dialogue)

這種模式即為前述 VOM 的原型：一個被害人與一個加害者在會議中直接針對牽涉雙方之事件進行對話，決策權掌握於當事人，修復促進者的工作是創造一個使當事人能暢所欲言的環境，只有出於必要時才幫助他們與彼此對話。典型的 VOM 必須有明確的加、被害人，若無被害人就不可能有對話。

2.受促進之加、被害人、支持者對話(facilitated victim-offender-supporter dialogue)

這個模式相較於典型 VOM 而言在決策權誰屬方面並無不同，然而在參與者方面多了加、被害人的支持者，而討論範圍則超出特定事件，延伸至加、被害人潛在之需求及議題。這種模式其實就是家庭團體會議。

3.受促進之所有相關者對話(facilitated all-party dialogue)

在這種模式中，決策權仍在當事人之手，但參與者除了加、被害人及其支持者之外，更多了政府官員或社區成員(可能兩者皆有)，討論範圍除了特定事件及加、被害人潛在之需求及議題，更將社區議題納入其中。這種模式就是修復圈。

4.指引性對話(guided dialogue)

在此模式中促進者的角色變得更加積極，他會向當事人拋出問題、評論、摘要和其觀察所得，但當事人仍有最終決策權。這種促進者角色之轉變可代入前述三種模式調解者主持會議的方法之中。此模式可見於一些北美原住民的修復圈。

5.間接對話(indirect dialogue)

參與者為加害者及被害人，加、被害人並不直接見面討論問題，而是由促進者居間代為傳達，互動是藉由信件、影音或口頭話語之方式，由促進者將訊息傳達至另外一方，決策權仍屬於當事人，但促進者如何呈現雙方訊息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影響最後的結果。這種模式有時候會變得很結果導向，使得溝通較著重於賠償的數量和方式。然而在當事人間有極度權力不平衡狀態，例如一方為受成人性侵犯之兒童時，這種模式便顯得重要，因為直接接觸對兒童來說可能太具刺激性。

6.指示性對話(directed dialogue)

於此模式中促進者就如同其他模式一樣地幫助當事人溝通，但促進者擁有最終決定權，與法庭訴訟程序不同的是，在法庭中當事人是試圖說服一個具權威的上位者，而在此模式中的促進者則是扮演幫助當事人們找尋共識的角色。這種模式出現於文化傳統上不那麼民主的文化中，於其脈絡很難認定當事人有自主權。

(三) 檢討

如前所述，本文認為 Johnstone(2007)所歸納出之會面面向是修復式正義之重點，解決問題的修復式過程是修復式正義的核心。而從 Raye 和 Roberts(2007)對修復式正義的實務型態之討論可以看出，以修復式對話(restorative dialogue)之程序為基礎，則各種實務型態「可能」只是同一種基準的不同展現(決定這些展現面貌者包括參與者、決策權之歸屬以及討論範圍的射程及溝通進行的方式及其程度，而這些差異可能是因文化差異、權力關係等因素而生)，這種觀點似乎呼應了 Marshall 對於修復式正義的定義。在這種以過程為著眼點的基礎上，對於調解或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方案也許不是那麼截然不同的想像似乎更有根據，因為在這三個程序中，當事人原則上都是以面對面的方式直接溝通並討論對於紛爭的解決之道。

(四) VOM 之運作流程

一個常見的加、被害者調解程序依序通常包含以下階段(Liebmann, 2007)：

1. 個別會議(separate meetings)

- (1) 促進者個別與加、被害者見面，評估調解的可行程度，並討論所有可能選項。
- (2) 若評估結果可行，則告知加、被害者調解會議基本規則，為直接調解作準備。

2. 聯合會議(joint meeting)

- (1) 開場陳述及介紹，並再次提醒會議基本規則。
- (2) 每個當事人有一段可陳述自身立場、看法而不受打擾的時間。
- (3) 雙方有機會詢問對方、交換意見。
- (4) 若合適的話即可建立協議(building agreement)
- (5) 若合適的話接下來可將協議付諸文字(writing agreement)。
- (6) 對話結束，安排後續。
- (7) 促進者簡單匯報(debrief)。

三、我國的修復式正義實踐

(一) 文化根源

研究者認為修復式正義和儒家追求和諧一致的觀念是相通的(Braithwaite, 2003)。

2002)。華人社會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因此傳統上重調解而輕刑罰。在儒家社會，輕率地提起訴訟往往代表個人修養的不成熟，表示其無法和他人建立適當關係，或欠缺處理與他人發生的紛爭之智慧(Huang，2011)。即使在繼受西方法律之後，時代的變遷也沒有改變華人反訟的態度，顏厥安(2010)主持之「台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對於輕微的衝突事件，民眾仍會優先考量以訴訟外的方式來解決紛爭。

然而在陸振芳(2008)以人際關係特色為例探討將修復式正義理論應用於華人社會可行性之研究中，作者認為華人社會人際關係的特點可能與西方所持「人人平等」的觀念不盡相同，這種文化差異可能會決定不同社會對於正義內涵的理解，其於分析國內九篇修復式正義相關研究後發現，調解委員會中的調解模式多為華人對陌生人的「工具性情感關係」，這種人際關係以物質性賠償的金錢調解模式為主，基本上符合修復式正義強調的雙方當事人平等概念；但在婚姻暴力或熟人性侵害等相關研究中，由於華人人際衝突處理不同於西方的觀點，因此不盡然與西方式的修復式正義相符。Huang(2011)也指出，認為修復式正義和儒家文化有相容之處的研究似乎忽略了儒家文化本身特色對於修復式正義可能產生的影響，其研究顯示，修復式正義原則在以儒家文化為根本的華人社會中似乎有受折衷、妥協之虞，本文將於後討論這份研究。

(二) 我國現行制度之修復式正義元素

在我國實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前，國內關於修復式正義的討論，有一部份集中於在現行的刑事司法各種制度之中，是否存有與修復式正義相容或已然發揮某些修復式正義元素的制度。例如呂宜芬(2006)對於酒醉駕車者運用緩起訴制度的研究便指出，若要使緩起訴制度能帶來修復式效果，有賴於檢察官在整體起訴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其若能以更具關懷性的態度對待犯罪者，則這個過程更可能使得加害人心有所感因而復歸社會；其餘則包括觀護制度、更生保護制度、少年司法體系、少年犯罪協商、少年安置機構以及如何處理校園霸凌等等議題，可以說是包羅萬象，這些研究中所處理的制度或議題，或多或少都有修復式正義精神介入的空間，因此與其說是這些制度原本就具有修復式正義精神，倒不如說在我國正式引入修復式司法之前，這些研究所指出的，其實是一條如何可以將修復式正義精神融入既有制度之路。在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直接在既有制度之外另闢蹊徑之餘，這些前導性的研究提醒我們，在研究試行方案如何不同於傳統的調解制度之時，不要忘記存在於既有制度之上改革的可能性。

(三)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所採之 VOM 模式(參閱附錄四)

「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是法務部對於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原則性說明，而由有試辦意願之檢察機關提報實施計畫，經法務部審核通

過後即可辦理修復式司法方案。各地檢署所進行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乃由其各自提出，因此雖有共同之大原則與方向，但實踐上必然有所差異，最後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地檢署共有八個，分別為高雄、台南、澎湖、台中、苗栗、宜蘭、士林和板橋。儘管各個地檢署推行之方案有所不同，但實踐之修復式正義形式則皆遵照「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所定，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VOM」為主要模式，以下便以實施計畫所介紹之 VOM 模式為主幹：

1.宗旨

(1)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群)進行充分的對話，讓當事人間有機會互相陳述、澄清案件事實、聽取對方的感受、提出對犯罪事件的疑問並獲得解答。

(2)讓加害人能認知自己的錯誤，有機會主動向被害人、雙方家庭及社區(群)真誠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並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之正向轉變，以改善自己與家庭、被害人及社區（群）之關係，俾助其復歸社會。

(3)提昇加害人對修復與被害人間關係的自信與動力，協助其啟動再整合之重建機制，並降低其再犯罪之機會。

(4)尊重被害人在犯罪處理程序公平發聲的權利，讓被害人有機會描述所經驗的犯罪過程、被害感受與直接詢問加害人，表達他們的需求及參與決定程序。

(5)透過對話程序，讓被害人得以療傷止痛、重新感受自己仍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且能進一步了解加害人，而減少因被害產生的負面情緒。

(6)提供一個非敵對、無威脅的安全環境，讓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群)能完整表達其利益及需求，並獲致終結案件的共識及協議，以達到情感修復及填補實質損害。

2.運作流程

(1)開案標準

實施計畫認為基本上偵查、審判、執行、保護管束、更生保護各階段皆可實行 VOM，各地檢署之選擇各有不同，有些所有階段都做，有些則只選擇其中一到二個階段；案類方面，實施計畫建議以微罪和少年犯罪案件為優先，但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地檢署將少年犯罪案件納入，處理之案件也不盡然皆是微罪。

實施計畫認為參與之當事人或其案件性質需具備以下要件：

- A.加害人必須先有認錯及承擔責任之意。
- B.加害人無重大前科。
- C.當事人未因罹患精神疾病致減損其溝通表達能力。
- D.當事人皆未因藥物濫用致有影響對話進行之虞。
- E.未成年之被害人或加害人，應經監護人同意或陪同參加。
- F.無被害人之犯罪及兒虐案件，暫不列入。

實施計畫規定各地檢署應成立方案專責小組，評估加害人是否符合上述各款要件，必要時應與加害人面談，如認不適宜進行修復程序者便結案，若認為適合進行修復式程序，則將本案轉交修復促進者，並提供有助其一定程度瞭解犯罪事件內容及當事人基本資料之資訊，使其能展開修復之準備程序。

基本上在 B、C、D、E、F 五款，各地檢署都依循法務部之要求，在 A 款的部分則未必如此：依照實施計畫的文字看來，加害人必須要先有認錯及承擔責任之意始得參與修復式司法，但在實踐上，許多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的加害者其實並沒有認錯的意思，一種可能性是加害者有錯不認，但使得狀況更複雜的原因是，所謂的「認錯」是否意味著承認自己「全然有錯」才算？是否有可能出現「與有過失」的情況？當被指控的加害者只肯承擔一部份責任的時候，是該如實施計畫所建議的不讓其參與修復式司法，還是先使其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再於對話的過程釐清責任的歸屬？就各地檢署的實踐上來看，顯然後者是比較常見的作法。

然而我們也不應忽略一種可能性：即使「地檢署」的開案標準不要求加害者一開始就認錯或承擔責任，「促進者」基於其對修復式正義及 VOM 的理解，也還是有可能將加害者未認錯的案件拒於修復式司法之門外，也就是說，制度以及人對制度的理解會影響其實踐之面貌，我們無法單就制度面的規定去理解修復式司法，必須同時探討在制度中的人對制度的理解，才能獲得比較清晰的輪廓。以下各個部分皆必須佐以人對制度的理解之分析，本文只能於後面的章節處理，在此不再贅述。

(2)準備工作

根據實施計畫，修復促進者接到案件後應分別與加、被害人及有必要參與之社區成員見面確認意願及是否適宜進行，修復促進者倘認當事人尚不宜面對面對話，可先以書信或其他間接方式互動，等評估適宜後，再安排雙方會談。經修復促進者評估認不適宜進行對話時本案即應終結，並分別轉知當事人，並將結果回報試辦機關評估小組，完成結案；如果認為適宜者，即可準備展開對話程序。

進行對話之前，修復促進者事先需分別與雙方直接見面，了解雙方的情形及需要，並建構當事人間信賴與和睦的基礎，向當事人提示相關資訊，如對話程序、雙方權益、潛在危險及有關加害人之資訊，並判斷有無適合陪同出席的親友或其他有正面支持力的人，並經當事人同意，邀請其陪同出席，同時要注意雙方的身體健康及精神狀態是否適合對話，並確保當事人之安全及解答其疑問。

(1) 對話

實施計畫規定之對話方式原則上以面對面為主，但得視實際狀況採間接之書信、電子郵件、電話或遠距接見等方式，參與成員原則以加、被害人為主，雙方家屬或陪伴人員需經修復促進者邀請或評估後才能參與。試辦機關應提供和善、安全、平等及不受干擾的對話環境。對話的主要內容包括犯罪事件之描述、結果及影響(包括感受及實質損害)、修補犯罪傷害的責任者及方法。對話過程應予觀察記錄，以便討論評估下次對話之方向與主題，並供為本方案試行成效及修正之參考。

(2) 對話結果

如果雙方在第一次對話後未能達成共識，修復促進者可能請雙方回去，並約定下次再來做第二次的對話，修復促進者應隨時評估修復進行狀況並決定是否繼續或結束，當事人則可在任何階段決意暫時中止或完全結束修復程序；若雙方能達成共識則寫下共同協議結果(例如一定金額之賠償、向被害人道歉、參與社區服務或公益活動等)。

(5) 對話結果及其效力

1. 協議不成立

若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則案件回到訴訟程序中續行。

2. 協議成立

若雙方達成共同協議結果，試辦機關之執行小組應依實際情狀，適時轉向導人民事和解、試行調解、緩起訴處分、協商判決等程序，以取得執行名義或供為緩起訴、協商內容之參考。

(6) 後續追蹤與轉介

實施計畫規定，於整個修復式對話程序結束之後，修復促進者應進行後續追蹤，以了解被害人對話後之需求及加害人履行協議之情形。試辦機關於修復促進者回覆追蹤情形後，如被害人尚有心理諮商、醫療或生活重建等需求，應徵得其

同意後轉介至適當機構，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 應用於家暴之修復式司法方案

台灣共有八個地檢署參與此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其中一個地檢署係委託一非政府組織以修復式正義之理念處理家暴案件，Huang(2011)之研究訪談此組織中的六名修復促進者，探索他們如何理解修復式正義以及這些理解如何影響其實踐，從儒家文化、女性主義和修復式正義之理論出發，探討這些理論所導引出之原則在修復式司法方案中如何互相合作或競爭，試圖呈現將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家暴在今日之儒家社會中所呈現的面貌。

此研究認為儒家文化、女性主義和修復式正義之理論，由於對「個人、家庭(社區)、國家間關係之本質」的理解不同，因此對於「誰是處理家暴問題的關鍵角色」之看法亦有所差異；關鍵角色之不同會相應形塑支配運作過程的原則。研究結果指出，修復促進者的觀念是以儒家思想為根本，而修復式正義與女性主義的原則在某些環節上會因儒家思想的基調而有所折衷：對這些促進者而言，修復式會議主要是要修補破碎關係，這能使得婚姻、家庭關係就算不能繼續維持也可以和平地分開(peacefully separated)，然而為了達成修補關係之目標，一些修復式正義原則被刻意擱置，例如「事實揭露」和「認錯」；懺悔(remorse)的價值被視為個人在自我修養方面的成長，它可以在被害人不在場的情況下表現於促進者面前，卻不是處理家暴問題之必要條件。

此研究亦指出，在儒家文化中，個體是以「關係我」(relational self)存在，「關係我」的概念不單單表示個人特質是以關係網路建立，更重要的是指出關係倫理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方式。許多傳統儒家「關係我」的元素在促進者的思考中被保留：以「自我修養」而言，促進者認為大部分加、被害者會捲入家暴事件是因「自我修養的不成熟」而使其無法建立與維護關係；在「階序倫理」的部分，當家暴發生於長幼之間時，促進者採取的立場是教導參與者遵守階序倫理的習俗(custom)；最後，「個人與家庭之密不可分性」之原則使得促進者相當重視加、被害者之家庭的角色和意見，有時甚至會凌駕於加、被害者個人的感覺及想法之上。促進者雖注入男女平等的觀念在關係我之中以求兩性更為平等，但在修補關係此首要目標之下，他們似乎不願嚴正或直接地反對仍存有性別偏見者，而寧願以比較柔軟及溫和的姿態來說服人們性別平等和同等尊重女性的觀念。

本文認為，從此研究之發現看來，修復促進者雖為進行修復式司法方案，但所秉持之理念卻多是源於儒家文化而非修復式正義，儒家文化與修復式正義之理念交鋒時，在「修補關係」、「維持和諧」的中心思想下退讓的總是修復式正義諸如增權、事實揭露、承認錯誤、責任承擔等原則，而在修復促進者心中，這些修復式正義原則的優先順序，亦是根據其對於「修補關係」之目標有無裨益而定，

在這種理解下，修復式正義理念其實只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種必然要遵循的理念基礎。但是應該注意的是，修復促進者心中視為首要目標的「關係修補」在此可不可以被視為修復式正義理念的實踐呢？

Huang(2011)在討論中指出，所有受訪的修復促進者皆強調家庭的角色，且認為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最主要的目標是透過關係倫理的原則來修補關係：「是『家庭』而非『個人』在修復式正義試行方案中扮演關鍵角色。」本文認為，在這樣的意義上，修復促進者視為首要目標的「關係修復」，事實上和修復式正義原則中的「關係修復」已然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在修復式正義理論中，所謂的關係修復是以加、被害者「個人」為基礎出發，以修補傷害為目標進行使當事人「個人」自決的過程，和諧關係的建立或許有助於修復性結果之產生，但雙方當事人的自決過程並不以竭盡所能、無時無刻皆要「維持和諧」為必要；視「家庭」而非「個人」為關鍵角色的視野會產生目的與手段間的矛盾：家暴問題的產生顯示「家庭」之內發生了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採取某種方式，但這種方式又在「和諧」的大旗下加諸種種限制，結果便很可能與家庭發生問題的現況一模一樣，絲毫改變不了情況，所謂的和諧是表面的和諧，而「關係之修復」可能只是回復到發生問題的那種關係而已。修復促進者心中的「修復關係」只是把家庭視為一個整體，填補回修復促進者心中的「家庭關係」，而不是修復「加、被害者間之關係」。

在此研究中處處可見這種跡象，例如促進者不認為事實陳述會有什麼作用是因為「強迫人們承認錯誤或試圖揭露事實會威脅到參與者想保留的面子」；懊悔也因「為了保存加害者的面子」而可以不在被害者面前表達；建議受岳父或岳母所傷害的女性被害者「不要公開指責或羞辱其岳父或岳母。」凡此種種可以看出，「個人」在以「家庭」為主體單位的思考中消失了，個人的權益為了家庭的和諧可以妥協或犧牲，維持和諧意味著盡量消除可能引起緊張氣氛的因子，不挑戰、面質既存的觀念，本文認為，在當事人間本存在特定關係的脈絡下，這種作法很可能只是將問題暫時按下，沒有真正解決當事人間的結。

第二節 我國調解制度

調解是指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經由雙方當事人同意，透過法院或特定機關團體居中斡旋，以非訴訟方式協調處理以解決糾紛的方式，因此，調解若要具有司法裁判效果，則必須賦予其法律依據，受到法律的規制(黃明陽，2008)，本為私法概念的「調解」在有法律作為依據後始成為「調解制度」。

我國現行有關調解的制度類型，依其辦理機關公權力之性質予以分類，可分為司法調解及行政調解兩種類型，司法調解係指由法院進行之調解，屬於司法公

權力運作；行政調解則是由行政機關進行之調解，屬於行政公權力運作，其尚可分為一般行政調解與特別行政調解兩種，而一般行政調解即是指依鄉鎮市調解條例所進行之調解，簡稱鄉鎮市調解，是最基本的行政調解制度(童淑枝，2009)。由於本文係為研究曾任或現亦兼任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委員的修復促進者對相關制度之見解及經驗，故於我國現今制度之僅探討鄉鎮市調解及家事調解：

一、鄉鎮市調解制度

(一) 歷史淵源

1.傳統中國法時期

調解制度在我國其實古已有之，早在西周時期調解制度即已建立，當時的調解人員是地官司徒之屬官，負責調解糾紛，工作是調解民怨，使其和諧相處；秦朝時之地方制度採郡縣制，因此審判權利屬於縣級以上之官吏，而調解民間糾紛的工作便由鄉以下的組織負責，漢朝承襲了秦朝的體制並使調解制度的運用更加完善；唐朝時官方開始介入輕微案件之調解；而元朝則開始以調解處理較輕微之刑事案件；明朝將調解制度規定於律法之中，設立民間調解之常設機構；清朝於鄉以上實施保甲制，民間組織的首長(甲頭、保正)均有調解之權責(羅朝勝，2004；黃政達，2006)。

2.與西方近代法交會時期

今日調解制度所呈現之面貌絕非只受傳統中國法所影響，源自西方國家的近代法對於台灣的調解制度亦有相當之影響，而近代法之法規範與傳統中國法制產生交會之濫觴，源自於日本對台灣之殖民統治。

日本法於七世紀時曾大幅仿效唐律，而進入傳統中國法律文化圈，然而於十九世紀時為了避免日本淪為西方強權的殖民地，日本進入明治維新時期，制定與西方國家相似的法典，至1890年代時已完成以歐陸法為本的各種法典，構成日本近代法體制(王泰升，1997)。1895年，清廷在對日之甲午戰爭中落敗，依馬關條約將其對台灣的主權讓給日本，台灣進入日治時期，於1895年至1945年間受日本之殖民統治，接受近代法之洗禮。日本殖民統治的策略大致上以1923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為1895年至1922年，是「特別統治法制時期」，原則上皆依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法律，與日本內地相同，但仍保留一些當地人之行之有年的制度，也就是說，傳統的中國法仍具一定之影響力；後期是從1923年至1945年的「內地延長法制時期」，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轉為「內地延長主義」，希望殖民地之制度盡量與日本內地同一，因此更多近代法規範被施行於台灣，造成傳統中國法在台灣更無適用之餘地(王泰升，2001)。

在日治特別統治法制時期，諸如保甲制度、由行政官員調解紛爭的清治時期「舊慣」都保留下來。在調解部分，由於清朝地方官就民事紛爭常逕以官威調解，台灣總統府早於1897年就承認地方官得為民事調解，其後更於1904年加強公權力之介入，使該舊慣更趨向日治法制中「調停」之制度，廳長²於處理民事爭訴時得將案件交由調停官負責，調停係基於行政權的發動，以促使紛爭雙方同意和解為目的，若紛爭雙方達成和解即做成筆錄，可據以向該廳申請強制執行，此後不得再就此紛爭提起訴訟。本來調停權僅限於地理環境較偏遠之廳長才有，但至1912年時全台廳長都已擁有調停之權，考量重點為減少法院訟源(王泰升, 2001)。1923年起進入內地延長法制時期，日本內地之調停制度至此更是深植台灣。

1945年，日本的戰敗使得台灣政權再次輪替，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946年開始推動由地方人士擔任調解委員的鄉鎮調解制度，1955年公佈施行「鄉鎮調解條例」，隔年規定此條例準用於院(省)轄市的區和縣轄市的市，1982年修正公佈「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鄉鎮市(區)公所應設置調解委員會，由當地具有法律知識、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組成，成為今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存在之依據。

(二) 目的與功能

調解之目的，在於藉由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委員之聲望與信譽，動之情理、居間斡旋，勸導相互退讓以促進鄉閭和諧並疏減訟源，減輕法院負擔，是我國替代性解決糾紛機制中很重要之一環。調解的功能在於能使當事人復歸社會，不必因此而受到刑法處罰或矯治方面的處遇手段，能使當事人免於訴訟之苦，由當事人雙方自主解決糾紛(羅朝勝，2004；郭元宏，2005；夏化祥，2006；黃政達，2006)。

(三) 運作流程

在我國鄉鎮市調解制度的運作上，若是鄉鎮市調解條例有規定者，基本上全國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均會比照辦理，唯於一些沒有規定的部分，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作法可能會有些不同。然則將整個運作流程以「開案標準」、「準備工作」、「對話」、「對話結果」、「調解結果與效力」五個項目切開來看的話基本上大同小異。本文謹參考郭元宏(2005)針對臺北市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所作的研究作介紹：

1. 開案標準

我國的鄉鎮市調解制度，依照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一條的規定，可處理民事案件以及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包括婚姻、收養、繼承、商業買賣、房地

² 日治時期之初的行政層級本為總督府、縣廳、辨務署之三級制，1901年(明治34年)11月，總督府認為此三級制，在行政事務上有欠靈活，乃將臺灣地方行政區域由三縣三廳改為二十廳，加重地方廳級的裁量權。

產買賣、租賃、佔用、債權債務清償、公害賠償以及其他有關的民事案件；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則包括妨害自由或名譽、妨礙婚姻或家庭、妨礙信用及秘密、傷害、毀棄、親屬間之財產犯罪及交通事故等等。調解案件之來源一是由民眾自行至調解會申請，一則是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由法院移付案件給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另外在刑案調解的部分也有可能是由各單位(包含地檢署、市議員服務處、警察局、里長辦公室及社區等)轉介過來。

2.準備工作

當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收到民眾自行申請或由其他單位轉介之調解案件後，便由調解秘書開始進行調解行政工作，由其聯絡各個鄉鎮市調解委員，確定每個調解委員每週能到場調解之期日，並與當事人約定可進行調解的時間。案件由哪個調解委員負責也是由調解秘書決定。

3.對話

進行調解會議時，調解委員一般會請聲請人(不管誰是加害者，先聲請調解者即為聲請人)先簡短敘述案情並提供意見，當聲請人的敘述告一段落後，便由對造敘述自己的意見，在雙方都表達了之後，調解委員便表達自己的看法，並表示希望雙方能夠達成共識。

4.對話結果

如果雙方在第一次調解後未能達成共識，調解委員可能請雙方回去，並約定下次調解的時間過來做第二次的調解。當調解成立的時候，調解秘書即會當場寫成調解成立書。但雙方也可能在第一次的調解即表達不願意調解的立場，在調解委員評估沒有調解之可能性時，便可以當場宣佈調解不成立而結案。

5.調解結果及其效力

(1)調解不成立

根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三十條，法院移付調解之事件，經調解不成立者，調解委員會應即陳報移付之法院，並檢還該事件之全部卷證。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三十一條則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調解不成立時，於調解時所獲得之證據或言詞可以作為往後訴訟時之證據(黃政達，2006)。

(2)調解成立

根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民事事件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調解已然成立並經法院核定者，訴訟及就此終結。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

(四) 鄉鎮市調解制度之效果

我國對於鄉鎮市調解制度效果的研究多半顯示，對於鄉鎮市調解委員和使用鄉鎮市調解程序的參與者而言，鄉鎮市調解制度具有疏減訟源、達到較司法程序更為迅速解決問題的效果。以王惠美(2008)的研究為例，其研究發現指出鄉鎮市調解制度能夠真正落實減少訟源的目的，亦具有提高裁判品質、維護社會安寧，促進地方團結和諧、便民利民之功能、調和或彌補法律與司法裁判之不足、導正個人行為、產生社會制裁、輔助社會法治教育之功能等等。在鄉鎮市調解制度中，針對刑案調解的這個部分，國內亦有研究指出，除了鄉鎮市調解制度本欲達成的疏減訟源此一主要目標之外，鄉鎮市調解制度亦可發揮具修復式正義精神的功能，本文於第二章第四節中討論。

二、家事調解制度

(一) 歷史淵源

1. 家事調解在西方

以調解來解決紛爭的方式在西方社會可說是淵遠流長，將調解應用在家事案件亦有其古老背景，例如美國早期的貴格派教徒(Quakers)及猶太人社會即有使用調解以處理婚姻上紛爭之例(賴月蜜，2004³)。西方近代社會將調解制度應用於家事案件，則始自1977年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高等法院的家事法庭進行的監護權調解，自此之後，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陸續將調解制度運用於家事案件上(Salius and Mazuro，1988)。以下僅以美國、英國為例：

(1) 美國

³ 賴教授區分 conciliation 和 mediation 的不同，認為在 conciliation 中的主持人會給予建議，而 mediation 中的主持人則是讓當事人自行尋找共識，據此其將 conciliation 稱為「調解」，而把 mediation 稱作「商談」，family mediation 稱為「家事商談」。這種區分對於本研究並非必要，因為 conciliation 中的主持人縱或給予建議，但決定權仍操於當事人之手，當事人仍能自行討論並決策，因此本文所稱之家事「調解」實是對應於賴教授文中之家事「商談」。

在美國，1960年代中期心理衛生專家 Judith Wallerstein 和 John Kelly 的研究促使聯邦政府開始重視離婚對家庭及小孩造成的影響，美國兒童局(Children's Bureau)因此提供經費研究美國家事調解的現狀(賴月蜜，2004)。離婚調解(divorce mediation)的觀念始於一群律師和諮商人員，這些人對於傳統「對抗式離婚」(adversarial divorce)無法達成其當事人需求感到挫折，多數調解者若非從業律師即為心理衛生專家，他們都冒著走出傳統領域的風險幫助當事人。家事法領域的實務人員常因那些好鬥成性的律師將離婚升高為無謂的戰爭感到憤怒，像 O. J. Coogler 這位律師(亦為家事調解協會(Family Mediation Association)的主席及創辦人)便是在自身經歷對抗式離婚的慘痛經歷後開始致力於發展家事調解程序。美國各州對於家事案件是否運用家事調解的規定不一，有些州立法要求強制調解，有些立法強力推薦使用家事調解，有些州則由當事人自由選擇是否參與家事調解，整體而言，雖然有些州並未明文規定提供家事調解程序，但家事調解在全美已廣泛使用(賴月蜜，2004)。

(2) 英國

1978年，英國開始以法院體制內(in-court)方式協助離婚調解；1979年成立了法院體制外(out-of-court)的家事調解機構 Bromley Bureau，其商談架構正是採用美國家事調解制度創始者 O. J. Coogler 的理論，兩者的不同在於，Coogler 模式多運用在分居、離婚的爭議上，而 Bromley Bureau 則是以兒童為最優先、最重要之考量；1996年家事法(Family Act 1996)修訂，企圖以國家公權力的介入，使得兒童縱使在離婚後成為單親兒童，仍能受父母共同之疼愛與照顧，因此，尋求離婚者在離婚裁定作成之前的每一個階段，都被鼓勵(而非強迫)尋求諮商或調解的可能性，法院皆可提供家事調解服務(賴月蜜，2004)。

2.家事調解在我國

由於家事案件本身性質特殊，各國之司法體系皆感到有以不同方式處理家事事件之必要，我國亦不例外。台灣早期並不區分民事案件與家事案件，皆由民事法官辦理，後來家事法庭出現，由家事法官專門審理家事事件，未設家事法庭之法院也盡量將家事案件交由特定股別的法官專股辦理(張淑芬，2008)。然而家事法官們發現這種作法可能仍無法解決家事案件當事人之問題，因為有著親屬、家屬關係的兩造在家事法庭的審理過程仍處於對立面，在相互較勁以求勝訴的情況下，令人懷疑其於判決塵埃落定後，如何能履行仍需雙方共同合作完成的判決結果(例如最重要的孩子撫養問題)？在這種思考下，尋求審判外的機制來處理家事事件成為有志者努力之方向，調解這種深植於華人文化的紛爭解決機制便是一個可行選項。兒童福利聯盟在1996年開始接觸家事調解後，成為鼓吹家事調解機制的重要推手，逐漸喚起台灣社會對此議題的重視(賴月蜜，2009)。司法院亦逐漸瞭解家事調解制度於處理家事案件之重要性，開始著手於家事調解之建制(黃翠

紋，2011)。在試行三年之後，家事調解制度開始正式實施：

(3) 試行期

民國94年3月25日，司法院公佈「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共12點規定後，家事調解於同年4月1日首次在台灣上路，試行之初擇定台北、板橋、士林、新竹、台東、屏東等六處法院辦理家事調解。由試行要點第三點對家事調解委員資格之要求可以看出，家事調解所採者乃「專家調解」，規定唯有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具心理諮詢或心理諮商學經歷或具有家事事件調解專業經驗者，才有資格擔任家事調解委員，這與鄉鎮市調解委員多以退休人士、各鄉鎮市調解委員之前任或現任委員之「地方仕紳」擔任調解人的情形截然不同。一年後，家事調解之試行再延長一年，並增加基隆、苗栗、雲林、台南、高雄等五所法院試行家事調解；民國96年4月1日起，再增加桃園、南投、彰化、嘉義、台東、花蓮、宜蘭等七所地方法院試行家事調解。至此，除了外島的金門和連江法院以外，全國皆已開始試行家事調解制度(張淑芬，2008)。

(4) 正式實施期

民國97年3月27日，司法院將「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行要點」修正為「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並於同年4月1日開始實施，其中第四點規定所有法院皆應置行政團隊，辦理篩選案件、選任調解委員、指派調解委員先行調解、監督考核調解進度等相關事務，而得出任家事調解委員者除了試行期所規定之身分外，增列了具律師或醫師身分者亦得擔任家事調解委員的規定。

民國98年6月25日修訂之「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對家事調解委員之聘任與汰換做了更嚴謹的規定。據此，未曾在法院辦理家事調解業務之調解委員，應經司法院或各法院舉辦十二小時以上之專業講習課程後，始得辦理家事調解。各法院每年亦應召開家事調解委員評鑑決定是否予以解任或續聘，必要時亦得臨時辦理；司法院及各地方法院每年應定期舉辦家事調解委員專業講習或座談會。民國99年1月20日修訂之實施要點對家事調解之範圍、適用法規及期限作了更明確之認定，同年11月26日之修訂則將得出任家事調解委員之資格增列「曾任法官」一項。

(二) 目的與功能

家事事件通常涉及家庭成員間身分及財產之紛爭及衝突，和民事事件不同的是，在家事事件中，當事人的情緒糾葛往往會大大影響紛爭的解決。過去法院僅針對兩造表面上的爭執或是非判斷後便賦予法律上的權利義務，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也很少對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未成年子女提供相關人性化措施和替代訟爭方式之選擇，最後訴訟程序非但在時間、勞力及費用上所費不貲，其精神上所承受

之壓力更是難以估算，往往無法真正解決家事紛爭。因此，以裁判外之方法使家事事件當事人自主解決紛爭便顯得更為重要，而調解就是協助當事人自主解決糾紛的方法之一。由於家事事件當事人與一般民事事件當事人的特質及需求有所不同，家事調解委員所需具備的資格和民事事件調解員有異，家事調解的程序也與一般民事事件的調解程序有別。家事調解委員在促成協議之餘仍必須小心留意雙方當事人的協議是否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或協議內容是否不夠明確，而可能在未來引起更大糾紛(彭南元，2006；張淑芬，2008)。

家事調解的目的是期待家庭成員能自主地解決家庭成員間的糾紛，調整成員間的利害關係，發展令雙方滿意的調解糾紛方案，作出分居或離婚子女生活安排、監護權、探視、居住及財產分配等各種妥適安排。達成以替代性解決訟爭方式圓融處理家事案件之目的。透過曾接受專業訓練的中立第三人居間協助，雙方得以在非敵對之氛圍下，自主地協商出解決方案，所能發揮的功能包括(Umbreit & Coates, 1992；黃翠紋，2001；黃翠紋，2011)：

- 1.改善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情形
- 2.減少已有紛爭配偶之間的衝突情形再次發生
- 3.締造以溫和方式解決衝突的效果。
- 4.讓夫妻、父母以及子女之間的接觸不會中斷
- 5.夫妻或國家皆可減少因分居或離婚而產生的社會、經濟上損失
- 6.降低解決衝突所需的時間

(三) 運作流程

1.開案標準

(1)初步篩案

根據現行「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實施要點)第二點，家事調解是指除了監護、輔助宣告等相關事件、宣告死亡、撤銷死亡宣告事件外之人事訴訟調解事件。家事法庭收文之後先依此原則進行初步篩案，納入強制調解、非強制調解及得協議之非訟事件(參見附錄三之家事調解作業流程圖)。

然而根據實施要點第六點之規定，於辦理家事調解事件時應注意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三條第七項及第四十七條。據此，家暴保護令事件原則上不得進行調解，而原則上法庭在訴訟或調解程序中認為有家庭暴力情事時亦不得進行調解，但是

以下情形為例外：

- A.調解者曾受家庭暴力防治之訓練並以確保被害人安全之方式進行調解。
- B.准許被害人選定輔助人參與調解。
- C.其他行調解之人認為能使被害人免受加害人脅迫之程序。

(2)二次篩案

實施要點規定各地方法院應設置行政團隊來辦理案件之篩選以及選任家事調解委員等工作。此行政團隊於初步篩案之後，應開始調查事件性質上有無不宜調解之處(例如家庭暴力或雙方權力不平衡)、顯無調解必要(例如不具訴爭性事件)或顯無成立調解之望者(例如當事人之一方行蹤不明)，若無以上情形即可正式開始進行家事調解(謝碧莉等，2008)。

2.準備工作

初步成案之後，行政團隊即依家事案件之性質分配家事調解員，排定家事調解日期，並以言詞、書面或其他方法向當事人介紹家事調解之流程，實施要點規定法院寄發第一次調解期日通知書給當事人時應附具調解相關說明資料(謝碧莉等，2008)。

3.對話

家事事件的性質有別於一般民事案件，因此家事調解委員之選任具有專業性的考量，此等考量在家事調解流程中於調解委員主持對話時最為明顯：家事調解委員往往會有意識地基於其專業背景形成一套調解策略，將之用在主持對話的調解過程中，這些調解策略也會依調解工作階段的前後而有所不同。

王唯馨(2005)訪問參與台中地方法院家事調解服務的彰化師大組成團隊之家事調解員，這些家事調解員的背景為諮商心理，其調解策略結合了個別諮商、婚姻諮商之技術。研究結果顯示，家事調解員的專業性高於一般之調解委員，然而受訪者在對話過程中所使用的諮商技術雖然具有「自我覺察」與「修復關係」的心理諮商功能，但這些諮商技術使用的主要目的是為促進協議的達成，「問題解決」才是其工作的主要目標，而非個人或關係之改變；另外，這些家事調解委員並未於事前對當事人的調解意願和準備程度進行了解。

王唯馨(2005)認為，使得這些具有諮商心理背景之家事調解委員將諮商心理首重目標轉移之原因，在於家事調解制度的設計及其目的，在此框架下，家事調解委員能夠進行調解的時間不多，使得他們只能將重心放在促成協議，調解策略

的使用雖然亦有對當事人情緒或心理層面的關照，但終究只是達成目的之手段而非目標。婚姻諮商的訓練是希望當事人能夠妥善經營關係，但家事調解之主要目的則非如此，因此修復關係只能居於次要地位。

4.對話結果

如果雙方在第一次調解後未能達成共識，家事調解委員可能請雙方回去，並約定下次調解的時間過來做第二次的調解，但在家事調解顯無成立之望、當事人陳明無調解意願者或有事實足認當事人無調解之意願時便無須另約時間續行調解，調解不成立；若第一次調解即達成共識，家事調解便成立。

5.調解結果及其效力

(1)家事調解不成立

家事調解委員行家事調解時，如認無成立之望、當事人陳明無調解意願者或有事實足認當事人無調解之意願時，應於調解紀錄表記錄調解不成立並報請法官或司法事務官處理。書記官應製作家事調解程序筆錄或由家事調解委員填調解(協議)紀錄表，並請當事人填服務問卷表。此案若自始即進入家事調解程序，則調解不成立時送至審理庭依一般規則分案，由家事庭法官辦理；若此案為審理中移付調解之案，則送回原審理庭續行訴訟。調解逾四個月仍未能成立調解者，除經兩造書面同意續行調解外，調解程序亦自此終結。

(2)家事調解成立

家事調解成立時，法院必須給付家事調解委員報酬，並退費予當事人，家事調解委員須填調解紀錄表，當事人填服務問卷表，最後由書記官填具處理紀錄表後報結與歸檔。

(四) 家事調解制度之效果

研究顯示家事調解制度之實施有其成效，例如莊子瑩(2011)之研究針對某法院在2005年至2009年這五年期間，參與家事調解之當事人在第一次調解後所填寫之滿意度調查問卷，進行資料分析與處理，研究結果顯示，當事人普遍滿意家事調解制度，並願意推薦此制度給有相同處境之人。

周志昌(2011)對雲林地方法院實施家事調解制度的研究則顯示，家事調解制度不但改變法院處理家事事件的方式，更改變了人民對於法院處理家事事件的觀感，並在實質上能在「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此一議題著墨更深，創造家庭的最大利益，然而本研究亦點出家事調解制度的隱憂，除了因無調查事實之權利因而可能出現無法掌握雙方當事人地位是否平等外，更重要者為在家事調解流程中評估

工作之闕如，僅僅以卷宗之起訴狀內容作為判斷是否進行家事調解依據的結果，將使得在當事人地位不對等、當事人有精神上的疾病需接受治療，或有家庭暴力情形之案件進入家事調解制度時，會因不存在審慎的評估工作，而於後續流程中出現問題，無法達成家事調解制度之目的。

第三節 我國調解制度與修復式司法方案之比較

一、制度目的之比較

鄉鎮市調解制度之主要目的在於疏減訟源、減輕法院負擔，能使當事人復歸社會，不必因此而受到刑法處罰或矯治方面的處遇手段，並令當事人免於訴訟之苦，由當事人雙方自主解決糾紛；家事調解的目的是使家庭成員能透過曾接受專業訓練的中立第三人居間協助，雙方得以在非敵對之氛圍下，自主地協商出解決方案，發展令雙方滿意的調解糾紛方案，作出分居或離婚子女生活安排、監護權、探視、居住及財產分配等各種妥適安排。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則以 VOM 為主要模式，希望透過修復促進者居間協助加、被害人在適當時間展開對話，希望可以透過對話促進加、被害人相互之瞭解，使雙方的關係及情感修復，使加害人知道自己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據以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並補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以認錯、道歉並承擔責任和賠償的方式使被害人復原。三個制度的主要目的各自有異，然而其共通之處在於令當事人能夠在中立第三人的協助下自主地協商、討論出針對系爭案件的解決方案。

二、達成制度目的流程之比較

雖然修復式司法追求的確切目標確切為何人言言殊，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問題解決」並非制度首要目標，因此作為其主要模式的 VOM 之實踐自有異於傳統調解之方式。對傳統家事調解制度而言，關係的修復固然為工作目標之一，其主要關切仍是「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此一問題。對傳統鄉鎮式調解制度而言，當事人之所以展開對話進行溝通，主要目的是能夠盡速解決問題，不要進入訴訟程序。

以理想層面來說，修復式司法方案必須透過使當事人在具體流程當中達到復原、轉變想法等等「轉化面向」的層次，達成如何回復、填補傷害的協議固然也是其中目標之一，但終究並非最重要、亦非唯一要追求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雖謂傳統調解方式因此有別於修復式司法，但反過來說，如果在調解制度之中能夠重視當事人心理層面的傷害與需求，那麼調解制度其實也存在實踐修復式司法理念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有些觀點認為調解也是修復式司法形式之一的原因，制度之間是否在本質上如此截然不同，恐怕仍有探討的空間。

三、制度使用階段之比較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基本上在案件進行中的任何階段都可以運用，實務上則依各個地檢署規劃之不同而各有差異；鄉鎮式調解制度所處理案件的階段則為起訴前的偵查階段；家事調解制度則是於案件起訴後，在法官審理前先交由家事調解委員會來處理。

四、居間第三者資格要求之比較

鄉鎮市調解制度中，調解委員的資格規定係由「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所組成，除了一些消極面的資格限制外，基本上別無要求；在家事調解制度中，因其所處理者為家事案件此一特殊性質，因此在中立第三人的選取方面多了專業之考量，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始得擔任家事調解委員：心理師、社會工作師、醫師、律師、具有心理諮詢或心理諮商之學經歷、具有家事調解專業經驗或曾任法官；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對作為中立第三人的修復促進者亦有專業上之考量，因此要求修復促進者需有參與被害人或加害人或其他助人工作之經驗，或具備法律、心理、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知識、技能及經驗。

五、參與者及其定位之比較

由於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目標重在問題之解決，因此凡就調解事件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調解委員會之許可均得參加調解程式，調解委員會也可以逕行通知利害相關人參加。在鄉鎮市調解制度中，無論在原先偵查程序中誰是被告，只要是聲請調解者即為聲請人，對造則為相對人，調解程序中不定調誰是加害人或被被害人，在與有過失之情形更是如此；家事調解制度中，參與者基本上便是系爭家事案件所牽涉之當事人，亦無加、被害人之別；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加、被害人之定位是基本前提，非此不足以執行加害人需願意認錯、道歉、承擔責任之原則。

六、準備工作多寡之比較

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由於強調加、被害人之間情感或關係的修復，因此與傳統鄉鎮市調解和家事調解制度相較之下，在準備程序上最為長久，顯著的不同在於，於此三制度之中的中立第三人，只有修復促進者會在雙方當事人見面之前，先經歷各自與雙方當事人單獨會面並評估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階段；家事調解委員原則上在進行家事調解當日才會首次見到家事案件當事人雙方，和傳統鄉鎮市調解沒有不同，但由於家事事件的當事人雙方本就相識，並且為了制度目標「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仍有維持關係的必要，因此在家事調解委員居間為雙方當事人找尋追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方法時，仍必須顧及當事人間關係和情感某種程度的「修復」（儘管此時修復意義之「質」和「量」都有別於修復式司法）。

在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中，當事人對話聚焦於問題之解決，金錢賠償之多寡往往是重點所在，由於制度目標是紓減訟源，因此能越快結束調解程序並獲得賠償結果當然是越好，在這樣的制度目標下，整個傳統鄉鎮市調解程序自然是以盡速解決系爭案件為核心，關係和情感的修復需要一定的時間，自然並非傳統鄉鎮市調解的主要目標所在，因此，調解委員於調解當天才會首次接觸雙方當事人，而問題解決是對話核心，縱然有關係或情感修復的成分，也被視為是問題解決的附帶好處，這不但見於過往研究之中，也是國人甚至法務部對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的一般印象。

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家事調解制度、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在制度目的、居間第三者之資格要求、參與程序之當事人及其定位、準備工作之多寡之比較如表2-3-1

表2-3-1 傳統鄉鎮市調解、家事調解、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比較

	制度目的	居間第三者之資格要求	參與程序之當事人及其定位	居間第三人準備工作 多寡之比較
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	紓減訟源、解決問題、達成賠償	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者	調解期日當天才見到雙方當事人
家事調解制度	追求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有專門職業背景者	家事事件相關當事人	調解期日當天才見到雙方當事人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關係、情感修復，加、被害人、社區三方傷害之復原	有專門職業背景或幫助加、被害者經歷者	需要明確將當事人定位為加、被害者	加、被害人對話前須經單獨會面階段作為評估之用

第四節 調解實務有無修復式正義內涵

此次法務部推動的修復式司法試行計畫是台灣官方首次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刑事司法制度，在此之前，修復式正義的倡導者、研究者除了理論上之探討外，也透過台灣各種現行制度探索是否某些制度的某些面向蘊含修復式正義的精神，例如修復式正義是否可處理我國少年相關事件？修復式正義可否運用於校園？有些研究則以修復式正義的觀點看台灣的更生保護、緩起訴等制度，其中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刑案調解制度是否蘊含修復式正義精神之研究是很重要的部分(郭元宏，2005；夏化祥，2006；黃政達，2006)，以下將逐一討論；此外，在我國

家事調解制度之部分，雖然尚未有專門針對家事調解制度是否蘊含修復式正義精神的研究，但李浩然(2007)從修復式正義觀點出發對鄉鎮市調解委員婚姻暴力調解策略所作之探討，則因婚姻暴力亦涵蓋在家事事件的範圍之內，是故可能有助於討論家事事件與修復式正義之關聯，因此本文亦將此研究納入討論。

一、郭元宏(2005)從修復式正義探討調解委員會刑案調解之效能

郭元宏(2005)對於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刑案調解(以下簡稱調解)效能之研究，是針對台北市三個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秘書和調解委員進行訪談，並佐以數次對調解過程的非介入參與觀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研究結果發現，於出發點方面，受訪者都同意調解與法院判案不同，是以「情」、「理」為主，以「法」為輔，解決紛爭與問題是其重點所在，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角色是擔任居中協調的第三者，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此層面而言，調解的確和傳統刑事司法系統如何看待犯罪並據以處理犯罪的方式有所不同；在結果的層面，本研究指出，多數受訪者均肯定在調解成功時會在調解現場進行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儀式，例如宣讀調解結果、雙方握手、一方當場道歉等等。就修復式正義精神係以當事人討論過程以達情感面修補的觀點來看，儀式的存在有助於加害人表達歉意以撫慰被害人的心情，以此而言，實踐上與修復式正義之精神有相符之處。

然而本研究亦指出，國內調解實務太過注重賠償，而不注重釐清事實與分享情感，因此，強調「迅速」且「經濟」地解決問題，已成為實務操作調解者普遍的共識，甚至求助者(包括加、被害人)本身也未必對真相釐清存有過度的期待，在這種氛圍下自然會欠缺對爭議事件進行充分討論與對話的空間。

二、夏化祥(2006)研究具修復式正義內涵之刑案調解

本研究亦是針對刑案調解之修復式正義內涵作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訪談法、參與式觀察法和資料分析法，研究結果除了進一步呼應郭元宏(2005)之研究，顯示調解是以解決問題為重心而法律並非首要重點之外，亦發現受訪者多認為刑案調解的主要目的是在回復各種損害，此點亦與支持修補面向的修復式正義者所主張者相符。在參與觀察兩個調解過程個案時，研究發現在調解成立之案例中，加害人不爭執自己毆傷對方的過失，而且願意承擔賠償的責任，在調解結束後雙方關係亦重新復合，因此，就加害人承擔責任、雙方關係修復的部分，與修復式正義所主張者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本研究之受訪者亦指出，我國調解實務工作者對於使被害人積極參與調解、充分發抒看法、感情並透過直接參與討論發展協議的方式使被害人得以復原之概念並不清楚，在實務上著重如何能使雙方各退一步以達成協議，以致於調解結束後「被害人往往仍感委屈，加害人亦存僥倖之心」，調解委員既然是朝向一個純粹物質性的目標來進行整個調解過程，被害人情感面的需求未獲得處理也就

不令人意外，這種情況下的調解很難稱得上是一個修復式的過程；夏化祥(2006)之研究亦訪問了其參與觀察調解過程之加、被害人，結果發現，調解不成立一案之當事人對事件責任仍有爭執，而調解委員並未審究事實，最後雖然達成協議但卻無法確保協議之履行，最後調解破局，調解成立一案之調解委員對於事件發生之始末及事實真相也未曾確實探討；而不管是調解成立與否，兩案之調解委員於調解過程均未注意提升當事人之寬容心與同理心，亦未促進雙方關係復合，而只是對賠償金額加以協商，凡此種種皆與修復式正義之精神有別。

三、黃政達(2006)對我國修復式正義與刑案調解機能之實證研究

此研究透過深入訪談調解委員會之主席、秘書以及參與調解之當事人，並針對曾參與調解程序之當事人作問卷調查，以研究刑案調解是否蘊含修復式正義之精神。對於調解委員會成員之訪問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我國調解制度的基本理念並非只有疏減訟源，而尚包括緩和或修復彼此的關係，亦指出在調解中調解委員會給予當事人抒發情緒和充分陳述的機會；以社會而非法律的觀點來看待調解之事件，並認為刑案調解之目的在於填補、回復損害而非懲罰加害人。以上發現皆與修復式正義之精神有相通之處。

訪問參與刑案調解當事人之結果，則發現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溝通和協商，來完成彼此願意達成的協議，也使衝突關係和情感可以在調解中透過對話以及協調獲得抒發；針對曾參與調解程序之當事人作問卷調查之結果亦顯示，加、被害人間充分的對話與協商，對於當事人間關係的修復具有提昇效果，亦能提昇當事人對於調解程序及結果的滿意度。以此看來，加、被害者的對話對於鄉鎮市調解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理解放在修復式正義的脈絡之下亦然。

四、李浩然(2007)從修復式正義探討鄉鎮市調解委員之婚姻暴力調解策略

此研究認為在探討以調解介入處理婚姻暴力事件之時，不可忽略對修復式正義之認識及探究其與調解之關聯，作者認為調解是實踐修復式正義重要的路徑之一，也在修復式會議的主要型態之中，因此探討目標為鄉鎮市調解委員之婚姻暴力調解策略，以及這些策略和修復式正義的關聯。本研究深度訪談了十位有婚姻暴力調解經驗的調解委員或調解委員會秘書。

研究結果發現，鄉鎮市調解委員認為在婚姻暴力之調解程序中雖以務實態度強調「問題解決」，然而亦重視雙方當事人間的「關係修復」，而且修復關係之地位要比疏減訟源來得重要；鄉鎮市調解委員對婚姻暴力的調解策略亦或多或少實踐或滿足下列修復式正義原則：「面對面」、「說實話」、「權利保障」、「協議結果」、「安全評估」、「意願確認」、「情緒抒發」、「充分對話」、「權力平衡」，而「事實陳述」則是程序之始，調解委員會確立「使用暴力就是不對」此一原則。

五、綜合討論

(一) 刑案調解是否具修復式正義內涵與是否重視案件真相息息相關

以上研究均認為刑案調解不同於傳統之刑事司法，並非以法律的觀點來看待調解事件；在調解結果方面，損害之回復亦是各研究所確認之目標，而非懲罰加害人。然而在郭元宏(2005)和夏化祥(2006)的研究中，系爭案件之真相對調解委員而言似乎並非必要，而在調解過程中，被害人情感面的需求也並不受到重視，欠缺抒發情緒和充分陳述的機會；但黃政達(2006)的研究卻從訪談及問卷調查中一再確認調解中加、被害者對話之重要性，其研究中之調解委員亦認為加、被害者關係的修復是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這些研究結果的差異原因有很多，但一個可能的切入點是，每個調解委員心中的信念及基於此信念的調解方式本來就會有所差異，沒有辦法一概而論，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其去區分這些不同結果的出現原因何在，倒不如探究這些結果是否符合調解過程所欲達成之目的。然而，這三個研究之差異顯示了一個很根本、因此也很適合以此出發的探討點為：「真相」在每個調解參與者的心中份量為何？

本文認為，如果事件本身真相並未釐清，便無所謂「充分討論與對話」的空間；「情感分享」如果沒有事實作為基礎又要如何訴說？如果欠缺這個部分，還能稱作「充分討論與對話」嗎？加害人的道歉若不以相當程度的事實為基礎，那我們怎麼知道他是針對什麼事情表示悔意？受害人又是「寬恕」了什麼事情？道歉與寬恕如果只是欲使事件告一段落的手段，出於當事人真心的程度令人質疑。

在情感面之需求沒有事實支撐的情況下，整個調解討論過程的核心是「解決問題」就不難理解，問題是，一個問題可能帶來的影響包含了實質影響以及精神面的影響，但在事實不明的基礎上，精神面的處理事實上是闕如的，也就是說此時所謂的「解決問題」其實並不精確，因為它跳過了當事人情感面的需求。然而不應忽略一種可能性：無論事實真相如何，當事人間其實欠缺、或只有一點點情感上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無論如何都要追究真相就值得商榷，因為也許那些情感面的需求在物質面的需求受到填補後便會消弭無形。因此仔細思考後問題變成：哪些事件本身的性質需要相當程度情感面的關照？

這些研究所針對的案件為交付鄉鎮委員會調解之刑案，依法律規定俱為告訴乃論之罪，所謂告訴乃論之罪，是指非經被害人或有告訴權之人合法提起告訴，檢察官不得提起公訴，法官亦不能判決之罪。實務上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所處理之刑案以傷害罪占大多數，而這些傷害罪中又多半是因車禍而起，因此在刑案調解的部分，車禍案件實是佔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因此以下暫時將重心放在車禍案件性質之討論。

以車禍案件而言，在法律上其實就是過失傷害，那麼問題是：在加害人並非出於故意傷害被害人之情況，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情感需求會強烈到什麼程度？更根本的問題是，這時候的加、被害人應如何認定？一場車禍發生，傷亡重的一方不見得就沒有過失，有時候甚至應負完全責任，更複雜也並不少見的情況是雙方都有某種程度的過失，如果真有所謂的「真相」，或許也是一個難以確實定位加、被害者的真相。也許就是因為這樣，除非有明確的事實而為雙方所不爭，否則所謂的「真相」在調解中只能存而不論，聚焦於問題的解決之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情感的修補某種程度取決於物質賠償之多寡，價錢的高低代表了彼此的誠意。若車禍案件之調解的本質確是如此，那麼有無所謂「情感修復」之必要便值得深思。

回到整體刑案調解來看，即使認為調解程序中真相追究有其必要，但鄉鎮市調解的制度設計是否有助於探討事實？夏化祥(2006)的研究指出，調解委員會是在調解當日才分派案件給調解委員，在這種情況下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審究事實真相。除此之外，若調解委員在調解日前並不存在「準備工作」(尚未分派案件因此無從準備)，那麼在調解當日其實不一定能夠「會面」，一則在於調解不具強制力，當事人沒有參與之義務；二方面是在調解程序進行之前都無法得知雙方調解的意願及態度如何，這個態度當然包括對於「事實」的看重程度，但這些都無法在調解委員無法事前準備的情況下得知。

就上述程序看來，這種實踐方式與調解之疏減訟源目的尚無違背，而是否適於達到情感方面的目標則有待商榷。本文認為，如果調解所處理的案件性質中，情感面的需求沒有多到一定要以明確的事實為基礎，而可以在調解程序中因為賠償等共識之達成而解決，那麼此時便沒有必要對於事實念茲在茲；但若調解程序因事實之忽略而無法妥善處理情感議題，逕自以協議達成與否為指標宣稱當事人的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則無疑是有其盲點存在，若有這種情況，便必須認真看待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21 項第 1 條：「調解應審究事實真相及兩造爭議之所在，並得為必要之調查。」本次法務部實施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亦有地檢署將可移付調解之案件送交修復式司法方案處理，正可對此議題進行比較、分析。

(二) 婚姻暴力調解之修復式正義內涵與關係修復之目標息息相關

李浩然(2007)的研究顯示鄉鎮市調解委員以婚姻暴力調解策略所進行之調解程序在許多方面都與修復式正義之精神相契合，本文認為，這樣的結果必須回到這個研究之受訪者對婚姻暴力案件性質之理解。此研究顯示，受訪者認為婚姻暴力調解有別於一般調解之處在於：雙方當事人並非陌生而是有情感基礎，而且由於此研究當時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不能處理離婚案件⁴，這代表當事人未來仍要

⁴ 2009年5月1日起民法第一零五二條之一生效：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者，婚姻關係消

繼續共同生活，因此，婚姻暴力之調解目標除了預防暴力再度發生外，修補兩造關係亦為重點所在，而不是以物質補償為基礎。

為了修補兩造關係，受訪者亦認為有必要先行了解雙方當事人背景、暴力發生之原因及嚴重性，因此在申請婚姻暴力調解之當事人進入正式調解之前，調解會之秘書或委員會先與當事人進行簡單的初步會談，在這種預備會談中，最重要的是對當事人進行初步之認識及瞭解各方面之狀況，此舉能讓當事人瞭解未來會遭遇哪些情況、需要面臨或承擔什麼事情，並了解當事人是否有維繫婚姻關係及參與調解之意願；若確定要處理婚姻暴力之調解，受訪者除了會先行詳閱調解案件申請書外，也會針對自己對婚姻暴力性質不熟悉之處事先做功課，以幫助其對案件更能進入狀況。

從以上種種正式調解前的前置準備工作看來，這都與前述討論的刑案調解程序大不相同，而這是因為此時雙方當事人彼此認識，而且出於未來繼續共同生活的必要，「修補關係」被視為首要前提、目標。問題是，此時所謂的「修補關係」，與 Huang(2011)的研究中處理家暴問題的修復促進者視為首要目標的「修補關係」指的是同一件事嗎？

在 Huang(2011)的研究中，受訪之修復促進者皆強調透過關係倫理的原則來修補關係，其關注焦點在「家庭」而非加、受害者「個人」，展現在具體實踐上便使得個人之權利可以因家庭之利益而犧牲，例如「個人與家庭之密不可分性」之原則使得修復促進者相當重視加、受害者之家庭的角色和意見，有時甚至會凌駕於加、受害者個人的感覺及想法之上；然而在李浩然(2007)對處理婚姻暴力之鄉鎮市調解委員的訪談卻顯示，即使引入雙方當事人之相關支持者(家人、朋友)共同參與調解，其角色只是發揮對當事人支持、陪伴之功能，正式調解的過程仍以當事人為主，調解委員會適度地提醒雙方支持者不要干擾調解之進行。亦即，儘管目標都是「修補關係」，但前者的主體單位是「家庭」，而後者是「個人」。

這種差異設定了調解程序進行的基調，以「事實陳述」部分為例，同樣一個家庭暴力、婚姻暴力的問題，在以「家庭」作為主體的修復式司法方案過程中，修復促進者認為強迫人們承認錯誤或試圖揭露事實會威脅到參與者想保留的面子；但在以「個人」為主體的鄉鎮市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會以各項談話技術瞭解雙方當事人衝突發生原因以及雙方當事人對於調解之需求為何，更重要的是，調解委員會在調解當中宣示「使用暴力就是不對」的基本理念，這與曾出現「為顧全加害人面子而要被害人隱忍」情況的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實踐有本質上差異。

(三) 調解程序可能實現修復式正義之價值

減，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

以上這些研究顯示揭示了一個重點：針對同樣性質的案件，修復式司法方案不一定就能全然踐行修復式正義的理念，而修復式正義理念的精神也未必不能在調解過程中實現，主持程序者的信念及其對於案件、當事人關係、目標、關鍵角色的認知會大大影響實踐所呈現之面貌。這些研究發現對於本文的啟示在於，即使修復促進者明確認知自己在實踐修復式司法，他們的作法亦可能被過往經驗或文化脈絡所掣肘，致使偏離自己理想中的軌道，從而無法實現修復式司法之價值；反過來看，即便受限於制度目標和傳統調解作法，但在一些要素及適當的理解之下，調解委員甚至可能突破以往的窠臼，採取與以往及一般程序有所不同的創新作法，從而使調解程序(可能在無意之中)達到修復式司法所崇尚之精神。本研究希望以此啟示出發，探討修復促進者是否認為調解和修復式司法有所不同，如果認為有所不同，其實踐又是否能夠全然遵照其想法，而不至於出現與傳統調解相類似的情形？反過來說，又是在何等情形之下，鄉鎮市調解制度和家事調解制度可能會有納入修復式司法精神的必要與可能？這都是本文亟欲探索之處。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文旨在探討於各地檢署實際執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過程中，兼具(或曾經具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調解委員或家事法院之調解委員身分與經驗之修復促進者，對於調解與修復式正義理念之詮釋及理解為何？而這些詮釋或理解又對其實踐有何影響？因此本文以質性方法進行研究。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文之研究問題在於調解或家事調解制度與修復式司法方案之異同，而修復促進者對於這些制度的理解又如何影響其實踐，及其對各制度間是否可互相配合之看法如何。確定研究問題之後便以文獻探討之方式回顧鄉鎮市調解、家事調解及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制度原貌及所從出理念之原型，分析國內研究鄉鎮市調解制度、家事事件之處理及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實踐是否蘊含修復式正義元素之文獻，從而勾勒出各制度間或許有其共通之處的面貌，作為訪談修復促進者之基礎，發展訪談之大綱，並佐以各制度相關之文件；在確定訪談對象後便進行訪談及文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並根據整理、分析結果撰寫研究報告。研究流程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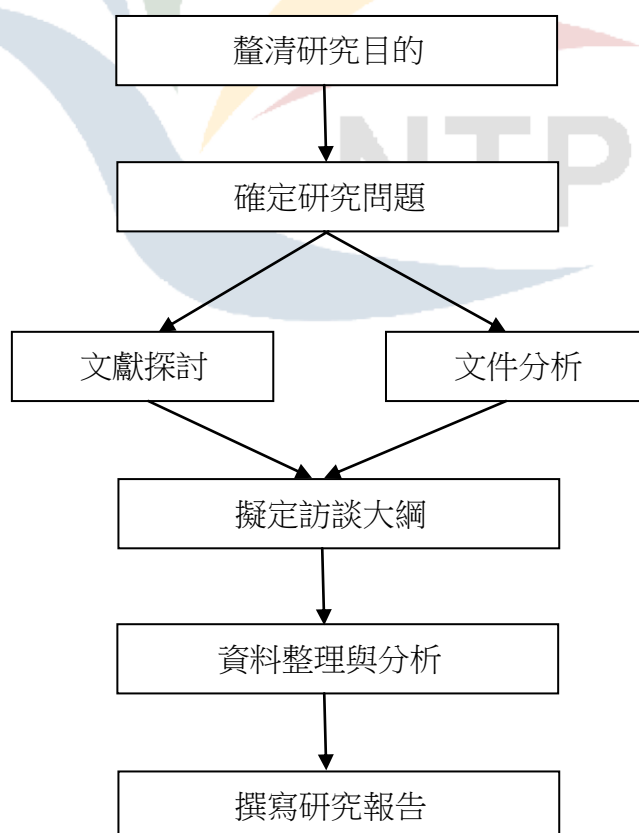


圖 3-1-1 研究流程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文認為，制度本身的理念、宗旨固然會對制度之實踐產生影響，但參與者對於制度的理解與詮釋亦至關重要，因此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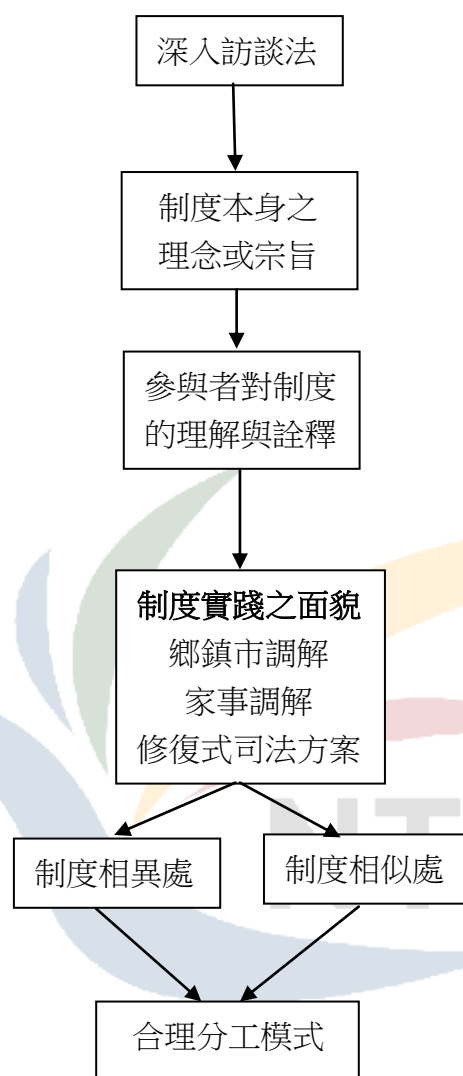


圖 3-1-2 研究架構

第三節 資料蒐集

一、研究方法：深入訪談法

本文欲了解修復促進者對於調解與修復式正義理念之詮釋及理解以及這些詮釋及理解對實踐有何影響，因此選擇以深入訪談作為研究方法。訪談是一種研

究性交談，為研究者藉由口頭談話的方式，由被研究者處蒐集、建構第一手資料的研究方法(陳向明，2002)；深入訪談法強調在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透過雙向溝通的互動過程，收集有關口語與非口語的訊息，以便深入式的全面理解研究的現象(潘淑滿，2003)。

此次為我國首次在正式司法機關引進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整個試行方案中實際操作修復式司法者對於相關概念或實作不那麼熟悉、甚至出現前後不一致的狀況是很正常的，本文試圖討論這些不一致的部分並非為了批判，而是試圖進一步了解到底是什麼因素致使促進者在思考或操作上出現這種不一致，而這些不一致的地方又會帶來什麼困難或矛盾；另外一個層面是，各個修復促進者基於對修復式司法的不同看法而導致的不同作法，如何互相交融成不同的案例實況，而各自的優缺點何在？這些案例不一定能呈現孰優孰劣，但探討其何以有所不同卻能讓我們更全面的探討修復式司法在我國的運作情形，作為未來更全面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刑事司法系統的參考。

二、訪談大綱

深入訪談法最常見的分類方式為依對訪談內容結構的控制程度分類，而區分為「結構式」(封閉式)、「半結構式」(半開放式)及「無結構式」(開放式)等三類訪談法(陳向明，2002)。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意即事先準備一些主題和主要問題，以事先擬好的訪談大綱設定訪談方向，但訪問時不一定要照設定之順序進行訪談，可視情況讓受訪者有自由發揮的空間。訪談大綱分為四個部分：

- (一) 參與修復式司法方案的動機及理念
- (二) 對修復式司法方案程序之認知與對話前之準備工作
- (三) 調解(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方案之比較
- (四) 對於調解(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方案未來應否修法配合之展望與建議

三、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設定為同時兼具(或曾經具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調解委員或家事法院之調解委員的身分與經驗之修復促進者。最後於全台八個實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地檢署中，研究者選擇選擇其中兩個地檢署中共六名具備此等條件的修復促進者，選擇此二地檢署的原因是此二地檢署皆未將修復式司法之辦理委託給民間組織，而自行負責實施修復式司法，且在各地檢署中開案數量及進行加、被害人調解(VOM)的次數名列前茅，累積的案件量與經驗相對來說都比其它地檢署豐富。訪談資料如表 3-3-1：

表 3-3-1 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代號	性別	調解經歷	訪談日期	訪談長度(分鐘)
A	男	現任家事調解委員	100 年 7 月 19 日	77
			100 年 7 月 29 日	37
B	女	現任家事調解委員	100 年 5 月 13 日	55
			100 年 7 月 21 日	84
C	女	現任家事調解委員	100 年 7 月 21 日	77
D	男	曾任家事調解委員	100 年 7 月 22 日	68
E	男	現任鄉鎮市調解委員	100 年 7 月 26 日	93
F	男	現任鄉鎮市調解委員	100 年 7 月 27 日	71

四、研究案例

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的認知與其所處理案件之實踐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為求討論方便之故，本文先從各個修復促進者所處理之案件中挑選出代表性案例，將其背景與後續討論重點作一簡單的介紹：

(一) 受訪者 A

A 實際處理的案子僅只一件，加、被害人雙方有血緣關係，檢察官係以殺人未遂處理，而後案件轉至修復式司法程序之中。A 是所有受訪者中唯一有與陪伴者合作經驗之人，在進入對話前的評估工作係由陪伴者負責，而在本文作者曾全程參與之對話過程中，A 和該位陪伴者呈現的分工狀態比較近似雙主持人，而非由 A 獨挑大樑，因此在這個案例中，A 和陪伴者之分工、搭配是重點所在。以下將此案稱為「殺人未遂案」。

(二) 受訪者 B

B 所處理之案件共有四件，其中一件實際上是由該里里長居中週旋便解決，其他三案中有兩案為車禍，其中之一最後成功達成協議，本文稱作「眉開眼笑案」；而本文作者曾參與另一車禍案件之對話，此次對話雙方最後不歡而散，被告憤而離開對話現場，最後以破局結案，本案重點為對話前準備與評估的工作是否充足及修復促進者間的分工、搭配問題，以下將此案稱為「拂袖而去案」；另外一案 B 是和 F 相互搭配，本案係為一過失致死的案子，然而加害方係以機構負責人之身分被告，雙方在對話眼看即將要達成協議而結案之前意外地破局，本案重點除了修復促進者間的搭配外，尚包括到達什麼程度才足以稱為「修復」的問題，以下稱為「機構被告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帶出的後面這個議題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其實也不斷縈繞在各個修復促進者的心中，促使修復促進者一再反思修復式司法乃至於修復式正義的真正意義。

(三) 受訪者 C

C 所處理的案子共有四件，其中一件剛到手上，另一件則為監所內之案子，礙於現實問題尚未進行對話，因此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C 所處理且經對話之案子俱已結案並達成協議，第一案為女告男的同居傷害案件，本案凸顯了修復式司法達成協議後之執行問題，本文稱為「同居傷害案」；另一案為車禍案件，此案的準備工作呈現出完全不同於「拂袖而去案」的面貌，適於討論對話前準備與評估的工作，本文稱為「有備而來案」。

(四) 受訪者 D

D 處理的案件包括一個與 E 共同主持的背信案件與三個車禍案件，本文討論背信案件與由 D 和 E 共同主持的車禍案件，此案重點在於責任歸屬與承擔的問題，本文稱做「誰有責任案」。

(五) 受訪者 E

E 處理之案件除了與 D 共同主持的背信案和「誰有責任案」外尚包括兩個車禍案件，本文討論其中一個年輕人撞死人之案例，此案重點亦為責任歸屬與承擔，和「誰有責任案」皆為討論所謂「道歉」意義之適例，本文稱為「年輕人案」。

(六) 受訪者 F

F 所處理者共有三案，本文選取「機構被告案」討論之。

本文討論受訪之修復促進者所處理之代表性案理整理如表 3-3-2：

表 3-3-2 修復促進者處理之代表性案例

	A	B	C	D	E	F
代表 案 例	殺人未遂案	眉開眼笑案 拂袖而去案 機構被告案	同居傷害案 有備而來案	背信案 誰有責任案	背信案 誰有責任案 年輕人案	機構被告案

註：案名相同者代表係兩位受訪之修復促進者搭配處理之同一案件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研究信、效度

一、資料分析：研究者

訪談資料蒐集完畢後即由研究者進行訪談資料分析。研究者自99年6月起即以工讀生身分參與法務部委託台北大學之「修復式正義理念應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研究案，負責資料之蒐集，並於八月成為本研究案之研究助理。研究案期間，研究者參與法務部舉辦之修復式司法方案說明會、修復促進者之教育訓練並協辦北、中、南三場焦點團體座談，亦曾於99年11月至台中女子監獄訪談參與「將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加、被害者團體實驗」的受刑人；100年5月開始參與觀察修復促進者主持會議對話之情況，並曾多次訪問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並在會議中對話、甚至已達成協議之當事人。研究者在參與各項教育訓練、會議、訪談後會寫下當日之心得日誌，自己訪談之錄音檔皆自行轉騰為逐字稿，而非自己訪談之錄音檔在轉騰為逐字稿後亦由研究者校稿，以上經驗皆有助於研究者問題意識之形成，以及對相關議題之敏感度。

於本研究中，研究者在資料蒐集結束後即開始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訪談結束後先寫下當日之訪談日誌，以求更能掌握訪談當時之情境、氣氛、狀況；訪談日誌完成後便盡快將錄音筆所錄下之訪談資料轉騰為逐字稿，如此便可於字句不清楚之處憑藉記憶並視前後文脈絡將錯漏補足；受訪者言詞中所指涉部分非一看逐字稿即可辨識之特定人、事、物或肢體動作等等，研究者會用括弧標出。逐字稿的編碼部分，本文將受訪者六人分別編為 A、B、C、D、E、F，除了 A、B 各訪問兩次外，其他人皆訪問一次，訪問中受訪者的回答是針對研究者的第幾個問題即為編號幾，而 A、B 的部分則在英文字母之後標示阿拉伯數字，代表該回答是出自第幾次訪問。因此假設該回答是針對研究者第二次訪問 B 時的第十七個問題，編碼即為(B2-017)。研究者分析逐字稿的過程以範例置於附錄七。

二、研究信、效度

在如何增加質化研究中信度與效度的部分，Lincoln和Guba(1985)提出下列指標與方法，內容如下(簡春安，1998)：

(一) 確實性(Credibility)

此即所謂的內在效度，也就是資料真實的程度。對此部份，Lincoln和Guba提出五個方法來強化：一、採用一些可增加資料真實性機率的方法，如持續與長期的充分研究觀察、研究情境的控制、資料來源的多元性等；二、同儕討論團體；三、相異個案的分析；四、適當的輔助工具，如錄音機、錄音帶等；五、成員的再確認，就是將現有或初步分析結果向研究者再求證，以修正錯誤的資料，真正

了解研究對象真實的想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於修復式司法試行的一年期間皆擔任研究此一試行方案的研究助理，從旁觀察過多場對話，亦有訪問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當事人之經驗，並全程參與北、中、南三場修復式司法操作者的焦點座談，並頻繁與研究案之主持人、研究助理等人交換意見，於訪問過程中亦以錄音筆將訪談內容錄下，以求增加確實性。

(二) 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可轉換性有如外在效度或推論性，意指在相似的情況下是否有相同的結果情境轉移，雖然有學者認為質性研究不具有將研究結果推論到樣本外的能力(陳向明，2002)，但是若能將研究結果向外推論，將會增加研究的意義。因此需經由將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做有效的資料性描述與轉換成為一種文字陳述，而此陳述增加資料可轉換性，深厚且深入描述使他人能產生身歷其境之感，可以瞭解訪問情境下受訪者的行為脈絡及意義，即可產生向外推論的外在效度效果。本研究於訪問修復促進者後即立即撰寫訪談日誌，以求掌握訪談當時的氛圍以及訪談者於談及各類問題時之心情和態度，以求增加可轉換性。

(三) 可信賴性(Dependability)

所謂的「可信賴性」即是實證主義中的研究信度，也就是如何證明研究可以一再被重複的問題。雖然質性研究具有獨特且唯一的特性，不可能產生在同一時間下對同一地區的同一群人進行同一問題的研究，而其研究結果勢必因研究者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透過詳實地記錄研究過程，並說明其如何決策、如何詮釋，使研究過程有跡可尋，並提供資料可使讀者能判斷資料的可信賴性。透過詳盡地紀錄研究的方法與過程，使其他研究者能夠查核整個研究過程。本文自將受訪者之訪談資料轉騰為逐字稿開始即逐步記錄研究過程，從編碼、分類、進一步分類乃至分析等步驟皆一一記下，以求增加可信賴性。

第五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倫理

一、研究限制

此次法務部推動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是我國第一次將修復式正義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系統，對此所做的研究應為探索性質，因此若要以之作概推至整體的宣稱已是力有未逮，而若說對六位兼具或曾具(家事)調解經驗的修復促進者之訪談可以囊括所有相似身分者的想法更是天方夜譚。本研究毋寧是作為一個前導性的研究，探討修復式司法方案在實務上是否會依修復式正義和(家事)調解在修復促進者心中的定位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而這些相似或相異之處又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從這些兼具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經驗的修復促進者的角度

看來，修復式司法和鄉鎮市調解及家事調解制度有沒有可以相互配合或截長補短之處？

本研究的一大限制在於：本文雖欲藉由訪談得知受訪者的理念及本於其理念的實踐狀況，但是這些所謂「實踐」事實上是由受訪者口中說出，研究者無從得知事實上發生的狀況是否與其所言一致，例如有沒有這種可能：修復促進者可能認為雙方關係修復良好，但加、被害人心中卻認為彼此只是在虛以委蛇？在修復促進者認知與當事人實際感受之間所存在的鴻溝是本研究所未能處理的；另外，受訪者本身如何在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程序中主持之經驗，並不一定和其他不在受訪之列的工作者相同，例如李浩然(2007)的研究即顯示了一個迥異於大部分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工作模式。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作出一個全稱式的命題或將各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工作模式視為均質的存在皆有危險，而應保留一些迴旋空間以作更深入的探討，也希望有後續研究能夠補足這些缺憾。

二、研究倫理

本研究進行之時間與法務部委託研究案之期間有所重疊，研究者在當面或以電話聯絡修復促進者的過程中，均先詢問其受訪意願，並在此連絡初期即告知訪談所得不但可能在研究報告中呈現，亦將作為研究者論文研究之用，並告知研究報告和論文均會保密並隱匿其名；在實地訪談進行時，研究者再次告知受訪者本次訪談將作為研究案及研究者論文之研究材料，亦重申保密及匿名原則，並請求其同意訪談之錄音，告訴受訪者在言談不想被錄下來的情況可以主動告知停止錄音，最後請受訪者在訪談同意書上簽名。在參與觀察個案進行對話之前，研究者皆先請主持對話之修復促進者說明研究者將從旁進行不涉入之參與觀察，並說明觀察之所獲將純粹作為研究之用並強調匿名性、隱密性，並在得到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始進行參與觀察。

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受訪者對修復式司法之理解

一、推動修復式司法之目的

修復式司法是台灣首次將修復式正義之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上，而正如「試行方案」四字所示，這種先天限制所帶來的不確定感在整個試行方案的每個環節之中都有可能出現。這種不確定感首先顯現於修復促進者對於修復式司法目的理解之差異。

檢視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實施計畫中的六大宗旨(詳閱附錄四)，應可將其分為「促進當事人間互相了解」、「加害人認錯、道歉、承擔責任以修復當事人間關係並復歸社會」、「防止再犯」、「被害人自決」、「被害人復原」以及「達成修復情感及填補實質損害之協議」。由這些目的可以看出，法務部透過這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想要達成的目標相當多元，其中也不乏進一步劃分的可能，例如以第二項宗旨而言，加害人認錯、道歉、承擔責任、關係修復、復歸社會是否必須同時存在仍有討論的空間；而以最後一項宗旨而言，修復式司法透過對話達成的協議應同時具備修復情感及填補實質損害之效果。

如此多元紛陳的目的固然看得出計畫的野心，但可以想見的是，每個修復促進者對於修復式司法的思考必然有所差異，這些差異即使在修復促進者參與數次法務部所辦修復式司法之教育訓練(見表 4-1-2)後依舊清晰可見。各個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目的之理解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之六大宗旨相符者，計有「促進當事人間互相了解」、「關係修復」、「防止再犯」、「被害人復原」、「情感修復」五項，以下將分別討論。而在法務部所擬的修復式司法六大宗旨與修復促進者心中修復式司法目標明顯地有所落差，例如在「加害人認錯、道歉、承擔責任以修復當事人間關係並復歸社會」一項便無任何受訪者提及；達成「修復情感」之目的確實包含其中，但未見有修復促進者將「填補實質損害之協議」與其並列。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加、被害者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是此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主要模式，因此加、被害者與修復促進者齊聚一堂展開的對話會議(conference)實是重點所在，在這種情況下，於某些修復促進者的心中，修復式司法的目的有時與加、被害者在會議中「對話」的目的其實難以區分；另一方面也存在另一種情況：受訪者認知的修復式司法之目的和對話之目的不完全一致。這兩者的區別會影響到修復促進者對於準備工作階段時應完成的工作為何之認知，而當修復促進者所認知之「修復式司法」目標和「對話」目標有落差時，這代表的意義為何及其可能帶來之影響也是本文要探討的議題之一。

表 4-1-1 修復促進者所受之教育訓練

日期	名稱	性質	內容
99.10.13	方案推動人員暨修復促進者 基礎教育訓練	基礎訓練	我國推動修復式司法之目的及策略、認識 VOM 當事人法律關係的處理方向及協議履行追蹤、VOM 會談基本原則與技巧
99.11.30	修復促進者培訓工作坊(一)	進階訓練	介紹復和會議、講解促成復和會議的技巧、影帶示範如何促進會議、角色演練
99.12.01	修復促進者培訓工作坊(二)	進階訓練	講解調解實務的準備工作、影帶示範會議前的準備、講解會議前的面談技巧、角色演練

(一) 當事人復原

受訪者 D 認為修復式司法的目的在於加、被害人在受苦過程當中的心理復原歷程，而透過修復式司法程序中加、被害人的充分對話，當事人能夠表達自己的情緒，逐步邁向復原的目標；受訪者 A 則認為，修復式司法的真正核心在於被害人之復原，因為被害人受到的傷害往往已經無法回復，然而他如果要在往後的人生繼續走下去就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修復式司法的意義便在於透過加、被害人見面和對話的過程，使得被害人能夠了解事情為何發生；並於加、被害人合意達成的協議中透過加害人的賠償求得被害人的原諒，使得被害人能夠在原諒對方之後得到復原：

因為他放過你，他不再去恨你，他不再用恨你的方式來讓自己繼續活下去，這是一個被害者更深層的那種力量。(A1-037)

在 A 的理解下，修復式司法並不是「加、被害人及社區三者都要修復」的司法，而是「以被害人之復原為核心」的司法。而根據此中心思想，在 A 心中「對話」的目的其實是服務於整個修復式司法所欲達成的目標：「被害者復原」。因此，如果對話不能達成這個目標，他認為就沒有對話的必要。A 自認他這種以被害人為修復式司法核心的理解或許與國外文獻有所出入，但仍認為由於被害人長期被刑事司法系統所忽略，因此修復式司法應將重心置於被害人及其家屬、遺屬，而非修復加、被害者彼此之間的關係。

(二) 關係修復

B、C 皆認為「關係修補」是修復式司法非常重要的目標之一，這個理解放在 B、C 對於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應如何配合之看法的脈絡下會更為清晰：她們都認為在家事調解時若能先修復雙方的關係，對問題的解決會有很大的幫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與家事調解兩程序之觀點本文稍後會再論及，此處應先強調的是，B、C 之所以認為現行的家事調解制度不同於修復式司法，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認為兩制度對於關係修補必要性看法之不同。除了關係修復之外，B 認為情緒面的修復也是雙方當事人解決問題前的關鍵要素：

他們今天來到法院，就是因為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所以那個關係其實是很重要的，那你如果沒有辦法先讓他們的关系能夠...先去接他們的情緒或者讓他們的情緒得到一個適時的一個抒發的話，你怎麼去讓他們解決問題？(B2-047)

循著相似的脈絡，E 認為修復式司法可以降低雙方的敵對關係，F 指出透過修復式司法雙方的仇恨不會那麼深，兩人據此認為在鄉鎮市調解進行前若能先以修復式司法修復雙方關係，會大大有助於雙方協議之達成。關係修復對他們而言不但是修復式司法的目標也是對話的目標。

(三) 情感修復

A 所理解的修復式司法是以被害人復原為核心，「情感修復」在其理解也是以被害人中心的思考方式存在，認為必須在尊重被害人意願的前提下，透過對話的過程使被害人得以宣洩情感；D 則認為在會議中對話之目的是情感的復原，但與 A 不同的是，D 所指涉的復原並不僅指被害人，而是連同加害人的復原也包含在內。

B 延續其認為修復式司法之前置有助於家事調解之立場，認為「情感修復」和「關係修復」同為修復式司法的重要目標。仔細檢視後可以發現，無論在談及修復式司法之目的或對話之目的時，受訪者 B 都再三肯認「關係修復」及「情感修復」的重要性，顯然在她心中修復式司法的核心就是加、被害者的對話，而此兩者的目標相同，她在陳述修復式司法的理念時直接以會議中的對話目標做為回答：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平台啦！能夠透過這樣子，就是能夠用一個接納的，用一個溫暖的、同理的，讓兩造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能夠透過這個對話，能夠達成所謂的一個修復，不管他們在情感上面，或者是關係上面。(B2-001)

受訪者 E 與 B 抱持相同看法，認為修復式司法的目標之一在於情感修復，基於此一目的因而亦將對話之目的設定為感受之表達，但我們稍後會看到此一目標事實上是為了更上位的目標「預防加害人再犯」而存在；F 則在論述鄉鎮市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不同時，認為「修復式司法是先談感情」，當加害人道歉，雙方表現出誠意時，才開始談賠償的問題，而這會使協議更容易達成。本文認為 F 的想法應可解釋為情感修復同時是修復式司法及對話之目的；受訪者 C 雖和 B 一樣皆認同關係修復和情緒修復都是修復式司法的目標，但與 B 不同的是，當談及對話目的時，她並未和 B 一樣提及「情緒修復」此一目標。這是因為受訪者 C 認為於修復式司法中，在對話會議之前的準備階段就應該萬事俱備，最後的對話會議只是將雙方心裡都有底的情形付諸實行，在這樣的理解下，C 自然不會認為最後的對話會議除了簽署協議之外還有什麼特別重要的目標要達成。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情感修復」有與「情感宣洩」混淆之虞，本文認為，確切釐清兩者不同的關鍵在於，「情感修復」之目標基本上應是透過加、被害人雙方的互動、對話、相互了解之過程而達成，例如被害人透過對話了解加害人的動機而化解「為什麼是我受害？」的怨懟、疑惑心結；而「情感宣洩」則是當事人與修復促進者進行單獨會談時的情感表達，例如述說自己因此案件而受到的生活、心理各方面的影響等等。

(四) 促進當事人互相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C 的看法並不代表她認為雙方的見面在萬事俱備以前是不必要的，而是說明其對準備工作要進行至何種程度的嚴格要求。C 會在非見面不可的情況下召集雙方對話，此時對話的目的便在「促進當事人之互相了解」：

一定要先會個面，叫他了解雙方的狀況的時候我會給他重點提示，我說：第一個，不要不好意思，家裡有多困苦實際講出來；第二個，誠意表達出來，因為對方在乎的是這個。我就把 key point 講給他聽，你重點那天要講什麼，你把那個表達出來，還有就是說你不能給錢的原因是什麼，你把它表達出來。(C-029)

在 C 的理解中，「促進雙方互相了解」不但是會面對話之目的，同時本身就是修復式司法之目標；然而在受訪的其他修復促進者心中，促進當事人互相了解是被理解為對話之目的，而沒有於問及修復式司法之目的時被提及：A 認為除了被害者可以透過對話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之外，雙方也可以透過對話的過程將誤會澄清，加害者亦可了解自己對別人造成的傷害和痛苦；受訪者 F 亦認為修復式司法的對話能使雙方了解事情始末、化解心中誤會或更了解彼此見解不同之處；受訪者 D 強調雙方當事人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對話過程有別於在法庭之中，因為在法庭中雙方當事人訴說的對象都是法官，雙方都只是間接聽到對方

的說詞，而不像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加、被害者可以直接對話；受訪者 B 則認為雙方可以透過對話來看見對方非實質的、心理上的傷害，而且這種傷害不僅限於被害人的身心創傷，也可能出現在加害人之上：

受害人也可以去理解，至少是可以去理解加害人他們的一個心情，跟他們其實在事件發生，也造成他們好像覺得很懊惱，或者是覺得很懊悔這樣子的情勢。(B2-003)

受訪者 E 一樣將「促進當事人互相了解」同時視為修復式司法之目的及對話目的，他認為修復式司法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對話平台，使被害人能夠更容易諒解加害人，而加害人也能夠明白被害人的痛苦。E 主張在對話過程之中徒有形式的「加害人道歉」其實並不足夠，因為更重要的是被害者要如何去「接受道歉」：

你做錯你跟人家道歉，可是那個道歉的意涵是什麼？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當事人接收到道歉的時候他要說出「我原諒你」，我原諒你這件事更重要……可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理解你這麼做，我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做，我理解，所以我接受你的道歉。你知道這句話說出來意義又不同。(E-074)

如前所述，「促進了解」是所有受訪的修復促進者都曾提到的目標，但除了 C 明確認定其同時為修復式司法及對話會議的目標之外，其他受訪者皆傾向認定其為對話會議之目標。本文認為，這代表大多數人認為對話本身是達成修復式司法目的之手段，只有 C 將對話本身視為關鍵性的目的，這種理解會影響促進者們對於舉行對話會議嚴謹程度之看法，留待修復促進者實踐之部分討論。

(五) 預防再犯

受訪者 A 認為透過修復式司法，加害人應該去理解他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傷害與痛苦，進而「約束自己的行為去符合國家的法律規定」，達到日後不再傷害其他人的目標；E 則認為加害者再犯與否取決於是否對其犯罪行為產生羞恥感，這種羞恥感累積起來會產生壓力，壓力太大時加害者便會拋開羞恥感，進而有再犯的可能。E 認為能夠將羞恥感轉化為正面力量的關鍵正在於被害人的原諒：

我說這(指修復式司法)是一個新的政策，那主要的目的是預防犯罪……他(指加害人)是不是對這個事情真實的內疚，他對他的行為是不是能產生一個真實的羞恥感，然後這個羞恥感才有辦法驅動他歸正，那我說那這個羞恥感通常有一個很重要東西是他必須要被被害人原諒……其實那是一個羞恥感的一個重建。如果他的羞恥感如果一直壓在這裡，我說人性是這樣子，人性就是說這個羞恥感壓力太大，那我就要開始合理化，那透過合理化，他就可以把他的這個羞恥感消滅掉，那所以下次他再去

做，ok 啊！……我想雙方當事人如果有一個平台讓他們去交流，我說或許對於受害的這一方就更容易諒解加害的那一方，那加害那方也更能夠明白受害的痛苦(E-047)

由以上這段話可以看出，「促進當事人互相了解」雖為受訪者 E 心中修復式司法的目標之一，但此目標應可被理解成是為了其心中最主要的目標「預防再犯」而存在，當事人透過修復式司法的平台展開對話，進而相互理解彼此，使加害人能夠感受被害人的痛苦、被害人能諒解甚至原諒加害人，藉此產生「真實的羞恥感」來防止加害人未來再次犯下罪行；前述 E 認為修復式司法的另一目的「情感修復」也是循著相同脈絡而服務於「預防再犯」此一最高目的。修復促進者們對於修復式司法及會議中對話目的之看法整理如表 4-1-2：

表 4-1-2 受訪之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及對話目的之看法

受訪者	A		B		C		D		E		F	
目的	修復式司法	會議對話	修復式司法	會議對話	修復式司法	會議對話	修復式司法	會議對話	修復式司法	會議對話	修復式司法	會議對話
當事人復原	1	1					1					
關係修復			1	1	1	1			2	1	1	1
情感修復		1	1	1	1	1			2	1	1	1
促進了解		1		1	1	1		1		1		1
預防再犯	2								1			

註：數字 1、2 表示目標重要性之排序

(六) 討論：修復促進者背景與修復式司法目的認知之關聯

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如果促進者們接受了大致相同的教育訓練、依照同一套腳本來操作修復式司法，那麼何以在最開頭的理念端就有如此大的差異？本文認為這與修復促進者們的專業背景息息相關。

本文所訪談之六位修復促進者均兼具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之經驗，A、B、C 三位修復促進者在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前即開始擔任家事調解委員；D 則是於民國 94 年念博士班時參與家事調解之試行，擔任家事調解委員一年有餘；E 於擔任鄉鎮市調解委員一個多月後即接到通知，因而參與地檢署所辦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說明會；而 F 則是先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後約半年始成為鄉鎮市調解委員。

受訪者中 A 為社工師，民國九十八年進入法律研究所進修；D 是諮商心理師；E 則曾任十年以上軍法官，均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中對法律、心理、諮商輔導和社會工作之專業要求不謀而合。有趣的是，這些專業背景並不總是能反映受訪者於助人工作的中心思想，例如當被問及鄉鎮市調解經驗是否有助於其主持修復式司法或參與修復式司法的經驗是否對主持調解有所助益時，學法律出身的受訪者 E 出乎意料地回答道：

那我現在等於是修復式司法跟調解是同時並進在走，那我會覺得其實重點喔不是這兩個東西，這兩個都是、對我來講都是在操作結果，我覺得是跟我的那個有一些、有一些 background 的訓練有關，尤其在什麼傾聽啦、專注啦、所謂的價值觀啦、不評判啦，跟這些訓練有關係，焦點解決啦還有一些...反正是心理諮商方面的東西幫助我。(E-108)

受訪者 E 所提到的背景訓練，其實是在教會中學習而來，在他的心中，此一「經歷」對於從事助人工作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這點我們從非法律、心理、諮商輔導或社會工作出身之受訪者 B、C、F 身上也許可以看得更清楚：B 本來是公務員，在做政府會計，但因對輔導很有興趣，所以就在婦女協會做了二十幾年婚姻輔導，也有在教會作事工，退休後被推薦給法院，經過面試後成為家事調解委員；C 則是藥師，從民國九十七年開始擔任家事調解委員；F 亦為退休之公務員，然而在擔任修復促進者前便已擔任觀護志工三年有餘。他們雖非相關領域出身，仍因具有助人工作之豐富經驗而獲選為修復促進者。受訪者 C 認為：

其實出社會喔，那個背景只是教你瞭解我的專業在哪裡而已，我覺得出社會以後其實很多東西是你的經歷跟你的再教育.....所以從那時候，譬如說包括易經的東西我有興趣，包括同理心的課我也會去上，包括那種、那種溝通那種的，我這種課我一路上非常的多。(C-021)

受訪的修復促進者之專業背景與經歷整理如下表 4-1-3：

表 4-1-3 受訪的修復促進者之專業背景、經歷與調解經驗

	A	B	C	D	E	F
專業	社工師	公務員	藥師	諮商心理師	軍法官	公務員
經歷	家事調委 法研所	家事調委 婚姻輔導 教會事工	家事調委 婚姻輔導	家事調委 輔導老師 張老師志工	鄉鎮市調委 教會事工 coaching 訓練	鄉鎮市調委 市民代表會秘書 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調解 經驗	現任家事 調委	現任家事 調委	現任家事 調委	曾任家事 調委	現任鄉鎮市 調委	現任鄉鎮市 調委

專業背景的不同，再加上各自經歷的差異，使得每個受訪者對於修復式司法的理解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這些理解影響了修復促進者如何實踐修復式司法，又如何透過實踐的過程反思其對修復式司法的看法。

1.具專業背景之修復促進者

選擇「當事人復原」作為修復式司法目標者為 A 和 D，而他們的專業分別為社工師及諮商心理師，換言之他們同為專業助人工作者，將其本身專業訓練之中心思想帶入修復式司法之結果，便是在修復式司法之眾多目的之中側重「當事人復原」。受訪者 A 在訪談中自陳社工專業乃是一門針對弱勢、扶助弱勢的專業。這可以解釋為何他所謂的「當事人復原」其實是專指「被害人復原」，而修復促進者站在被害者這端為其發聲；身為諮商輔導心理師的 D 則認為加、被害人的復原歷程同為修復式司法所關注。

提出「預防再犯」作為修復式司法目標者為 A 和 E，這兩位促進者的共通點是都有法律背景：A 於民國 98 年開始攻讀法律研究所，E 則是學法律出身，擔任軍法官長達十年以上。對 A 而言，預防再犯這個目標是針對加害人而來，然而被害人復原仍是修復式司法的最高宗旨，兩個目標是有等級高下之分的，因為在 A 的心中，要預防加害人再犯必須透過對話使他了解被害人的痛苦、傷害，但是進入對話的先決條件是被害人的同意，而這個同意是代表被害人希望藉由修復式司法的對話程序得到復原，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預防加害人再犯這個目標才成為可能，整體而言，A 的專業背景雖然社工、法律摻雜，但仍以社工為主體，這也反映在其對修復式司法的思考之中；E 的專業背景就是法律，預防再犯是他心中修復式司法的主要目標，然而「情感修復」亦為重要目標之一，這份理解似乎亦與其法律背景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我、我自己是一個學法的人，我覺得真正的正義其實不在於說是不是誰得到懲罰，而是在於那個、那個當事人的那個情感受傷害得到修復、得到修補。(E-001)

2.不具專業背景之修復促進者

另一方面，不具法律、社工、諮商心理專業背景的修復促進者 B、C、F 儘管對修復式司法及對話目的之認知各有差異，但共同特點是都未包含「當事人復原」和「預防再犯」這兩個目標，而是集中在「關係修復」、「情感修復」和「促進了解」這三個目標之中。

這些修復促進者是如何理解修復式司法呢？他們雖然沒有專業背景，但都在助人工作上有相當深厚的經歷，在她們一路走來的歷程中，從對某種知識或觀念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開始學習絕非第一次，在接觸與了解修復式司法的過程中，相

較於專業背景出身的修復促進者而言，這些受訪者雖然可能比較沒有系統性的理念支撐，卻能更開放地接受修復式司法所帶來的觀念。受訪者 B 便是以其在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中所學習的觀念來向當事人解釋修復式司法：

我當然還是強調、我覺得很強調就是說，因為我接受的教育就是、就是修復式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在你關係上面吼，不希望再擴張你們的撕裂一個那種關係，那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會議，能夠讓你們的關係和情感達到修復。(B1-058)

這就是為什麼她們的回答會集中在「關係修復」、「情感修復」和「促進了解」：這些目標正是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的重點所在。值得注意的是，E 雖然認為「預防再犯」是修復式司法最主要的目標，但與 A、D 不同的是，他也將「關係修復」和「情感修復」視為修復式司法的目標，本文認為原因在於，E 在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前，就已經在無意中接觸過修復式正義的概念，加上教會「經歷」對他有相當大的影響，連帶使得「專業」對其理念之影響有所折衷。

回顧表 4-1-2 可以發現，修復促進者所認知的修復式司法目的未必會和對話目的畫上等號，這種差異在本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係以加、被害人對話為計畫核心的情況下更加值得討論：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落差？這種落差又會對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的實踐有什麼影響？本文認為，這種落差反映出修復促進者對於「對話會議」必要性之看法，待行文至「評估標準」時再行討論。在修復促進者評估加、被害人是否適於進行對話之前，尚待討論者係為促進者對哪些特徵的案件適合以修復式司法處理的「開案標準」問題，以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目的之認知而言，修復促進者心中的開案標準深受其對「當事人復原」和「關係修復」兩大目標的認知所影響。

二、開案標準

(一) 當事人有意願

以「當事人復原」作為修復式司法目標的 A 和 D 於開案標準方面也以當事人之意願為依歸：對受訪者 A 而言，修復式司法既是以被害人為核心，因此開案標準單純以被害人的意願來決定便不令人意外，只要被害人有參與修復式司法的意願就可以開案，A 更認為只要被害人有意願，加害人就沒有拒絕的理由，如果不願意參與的話就應列入記錄，表示此加害人沒有悔意，進而影響判刑結果；D 則認為若加害人不願意道歉就無法啟動修復式司法，而被害人則必須在某種契機出現以後才適合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與犯罪者進行對話：

那個契機大概就是...我們我做心理諮商，我們會講說開始要變成一個心理復原的歷程吼，就是說，剛剛我的講法就是說，他要開始從另外一個

觀點來看待這個受創的事實，他要開始有不同的觀點去看待，如果他一直覺得說我就是受害者，那他也不可能去原諒。(D-013)

F 雖未將「當事人復原」列為修復式司法的目標，但亦從當事人復原的角度出發，認為時間過了太久的案子最好不要以修復式司法處理，以免當事人想起過往不愉快的事情；即使並非年代久遠的案件，也要特別注意被害人在修復式司法中因回憶往事而可能造成的二次創傷。

(二) 當事人間是否熟識

B、C、E、F 都將「關係修復」列為修復式司法的目標之一，認為這項目標有助於問題之解決或協議之達成，但仔細觀察其受訪內容會發現，他們認為修復式司法在雙方當事人本就認識、往後仍要繼續相處的情況下會更有意義。據此，A、D 則根本未將「關係修復」列為修復式司法目標，A 雖然主張開案與否應以被害人意願為準，但仍認為加、被害人之間若沒有一定的關係，道歉便沒有意義：

我們想的想法應該是，修補是你們...比如說彼此中間親人、家人的關係，或者是說對某一些東西原來很好的朋友，或者是說這一件事情我們就原諒你。(A1-014)

(三) 案件類型之嚴重程度

此一標準是由受訪者 A 所提出，延續其對修復式司法應以被害人復原為核心目標之思考，他認為某些案件類型並不適合以修復式司法處理，例如性侵害案件和殺人案件，理由是被害人不會「平復」。但他也認為「案件類型」這個標準可能受其他標準影響而不可一概而論，例如加、被害人彼此為親屬關係的殺人(未遂)案件，他認為就有修復的價值；他提出的另一個值得討論的類型是車禍案件，這是牽涉到加害者犯行時主觀心態的部分。

(四) 加害人犯行是基於故意或過失

對 A 而言，較為嚴重且加害人係出於故意而犯下罪行的案件需要更嚴謹地審查其進入修復式司法的可能性，單純出於過失的案件嚴謹度雖然可以比較寬鬆，但若此一過失造成重大傷害甚至死亡就不盡然如此，他對於修復式司法應否納入車禍案件的看法如下：

車禍到底要不要得到一個原諒？嘖...這個恐怕...如果是當事人重傷害可能啦，那如果當事人是往生就是變成遺族，遺族恐怕真的會想要瞭解一下：你為什麼要撞到我們家的誰誰誰？我們要來確定嘛，如果真的是

天意...老天爺就這樣子，那真的是...可能就要選擇原諒。(A1-041)

受訪者 E 則認為在故意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或其家屬比較可能需要了解加害人之所以犯下罪行的動機及背後的意義。修復促進者心中對於故意與過失案件性質的界定對於其實踐修復式司法的過程影響甚大，原因除了程度輕微與否的分別之外，更重要的是事實認定、責任分擔的問題，對於事實認定、責任分擔之看法則進一步影響修復促進者對於認錯、道歉必要性之認知，這些要素牽涉促進者們對於何時「應該」且「能夠」召開對話會議的「評估標準」之看法。然而在討論評估標準之前，本文必須先討論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的「分工」問題，因為修復促進者們不見得認為「評估」的部分該由他們自己來負責。

三、分工方式

除了 F 沒有對是否應配置陪伴者表態之外，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希望有陪伴者的存在。D 雖然沒有明確的意見，但認為自己這個修復促進者在身兼一方當事人陪伴者的情況下，於主持對話會議時要特別注意不能有偏袒的情形，本文認為這顯示他覺得身兼促進者和陪伴者時會有出現偏頗的可能性：

我自己會切割喔，就是說我就是做一個主持人，那雖然我先前我聯絡的、我的是受害者有講案子，但是我這個時候我就要看清楚我自己的位置，我不要去偏袒受害人或者是偏袒加害人，那這個大概是...如果我清楚我是主持人的時候，我就要提醒自己。(D-039)

至於陪伴者的數量，有人認為應該加、被害人雙方各配置一個陪伴者；也有受訪者雖未對陪伴者的數量有所偏好，卻明確指出應設置陪伴者來做評估的工作：C 指出原先的設計是有一個陪伴者(其確切說法是「社工」或「志工」)，其角色是了解雙方狀況和背景後，再轉達給修復促進者；B 也認為若促進者在主持對話會議之外還得身兼陪伴者會有所混淆，因此也期待能有專職陪伴者存在。

受訪者 A 認為，陪伴者應該在修復式司法開案之初便開始陪伴當事人，消除他的不安全感，並了解當事人進行對話會議的意願。他認為陪伴加害人或被害人的性質是大大不同，有專業性的考量，因此有雙方當事人各分配一個陪伴者的必要，是否能夠召開對話會議是由陪伴者去評估；促進者的工作是主持對話會議，在對話會議召開之前沒有必要接觸雙方當事人；E 也贊成雙陪伴者搭配一個修復促進者的方式，他認為若修復式司法處理的是重大案件，則修復促進者身兼陪伴者的情況會造成「情感依附」的問題，影響到修復促進者應扮演的中立角色，而單一陪伴者穿梭在加、被害人之間也會造成其角色混淆。

四、評估標準

如前所述，受訪之修復促進者雖然多認為應由陪伴者來評估當事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但事實上在此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除了 A 有與陪伴者合作的經驗之外，其他受訪者都是身兼修復促進者與陪伴者之職，也因此評估工作實際上都是由其負責。

整體而言，修復促進者的看法可分為兩類：雙方當事人有意願即可進入對談、雙方當事人在有意願之外尚必須具備某些要件始可進入對談。前者包括 B 和 E，後者則以 C 和 F 為代表，A 和 D 雖以當事人意願為最高指導原則，但其所謂的「意願」對加害人而言不只是「參與對話」這麼簡單，而是還包括加害人「道歉」的意願，因此是有其他要素作為意願之內容，嚴格來說亦屬於後面這類。

（一）以當事人意願為依歸

B、E 都認為在評估當事人是否適合進入對話會議時，重點是雙方當事人的「意願」：對 B 而言，能否進入對話完全繫諸雙方當事人的意願，只要有對話的意願就可以展開對話會議，與加害人是否願意認錯、道歉無關；E 也不認為加害人必須先有認錯、道歉的意願才能夠進行對話，在他的認知裡，認錯、道歉是透過對話機制達成的結果，而不是進行對話的先決條件，對話的先決條件無它，只要雙方都同意即可。

（二）非單以當事人意願為依歸

在 A 的想法中，如果陪伴者在匯整了當事人雙方的意見後發現有交集、共識存在，就可以交由修復促進者舉行對話會議；如果在對話會議之前雙方就沒有意願，那在進入對話會議後還是不可能達成共識。對 A 而言，由於「被害人復原」同時作為修復式司法以及對話之目的，因此尊重被害人的意願乃屬最高指導原則，而為防止加害人於會議中造成被害人二次傷害，則於對話前的階段就必須確認加害人的意願亦為必然之事，在這種思考下自然是以當事人意願為是否舉行對話的指導原則，而且此處的「意願」是涵蓋加害人認錯、道歉的意願，而不單指當事人進行對話的意願；促進者 C 亦認為，加害人願意認錯是進行對話會議的「非常先決條件」，如果加害人沒有認錯就不能舉行對話會議。

D 所持立場乃為被害人若還未到達能從被害者觀點看待被害事實的階段時，便不適合進入修復式司法，當然更遑論參與跟加害人的對話，而「加害人道歉」作為修復式司法啟動之先決要件自然也同時是對話的先決要件，這個取徑和 A 非常類似，考量到兩者皆以「當事人復原」為修復式司法核心之看法，這種取向的相似度其實不足為奇；F 則主張雙方當事人如果有「仇恨心理」時則不適合進行雙方對談，另外也要評估當事人所說的話是否出自真心誠意。

（三）討論

前述分類方式其實反映出修復促進者心中對於「加、被害人對話」之於「修復式司法」意義何在的看法，涉及「對話必要性」的問題，實際上會影響到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司法開案之後到對話會議展開之前「準備工作」的多寡。而以當事人意願為依歸的這個分類方式，其實從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及加、被害人對話目的之思考方式便有脈絡可循。

觀察表 4-1-2 可以發現，B、E、F 所設定的修復式司法目標以及加、被害人對話目的極其相似，差別只在於 E 將預防再犯設定為修復式司法的最高目標，而 B、F 則都沒提到。對 E 而言，透過其餘設定目標的達成，便自然而然可以達到防止再犯的目的，這樣看來，他透過修復式司法和對話要追求的目的便與 B、F 無異，都認為加、被害人對話目的之一在於促進加、被害人雙方了解，而情感修復以及關係修復這兩個目的則既為修復式司法及加、被害人對話之目的，此時修復式司法和加、被害人對話便被理解為一體，於是我們看到 B、E 主張當事人有意願即可進入對話，在這個標準外別無其它，因為越快進入對話越好本就是將加、被害人對話視為修復式司法核心之思考下的必然產物；F 在評估標準上看似未與 B、E 一樣單純以當事人意願為依歸，實則由於其設定的其它評估標準太過抽象、模糊，因而根本難以成為具體操作的標準，導致最後用來評估加、被害人是否適合對話的標準亦只剩下當事人意願，而與 B、E 沒有不同。本文在本章第二節末段會更深入詳述 F 的評估標準問題；另一方面，A、C、D 則呈現另一番面貌：加、被害人對話之目的是為了修復式司法之目的存在。

對 A、C、D 而言，加、被害人對話只是達成修復式司法目的之手段，如果對話在修復促進者看來無法達成修復式司法目的，就沒有召開對話的必要，在這種思考下，評估標準便不僅止於當事人意願，而涵蓋基於其修復式司法目標而來的其它標準。對 A、D 來說，修復式司法目標在於被害者、當事人雙方復原，可能傷及此目標之對話便無須進行，甚至在開案階段就該篩出修復式司法之外；對 C 而言，最顯著的特點是，在認定「關係修復」和「促進瞭解」同時作為修復式司法目標和對話目標的同時，她並沒有將其認定的修復式司法目標「情感修復」當成對話目標，因而對話在這種理解下亦是手段而非目的，若加、被害人對話無法達到她希望達成的修復式司法目的也就沒有召開的必要。C 認為對話會議其實只是一個最後的形式，在對話會議進行之前就必須把幾乎所有事情準備妥當：

老師的意思是說你會前的準備非常重要，你跟這個講、跟那個講，撮合，都是你在溝通嘛對不對？你溝通、你中間溝通，你最瞭解他的問題。他說其實那個會議吼，就很像在簽署的一個東西，就是說其實你已經有點把握，這兩個來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其實大概有點知道。(C-022)

在「當事人意願」之外判斷當事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標準之中，加害人是否已然認錯、道歉是一個重要的指標，而這個指標又牽涉到當事人在個案中所應

負的責任問題，責任問題又與修復促進者對於案件真相、事實之看法息息相關。責任歸屬的問題其實亦屬於修復促進者心中「評估標準」的一部分，只是本文將其獨立出來討論。

五、責任歸屬

由促進者是否認為雙方當事人的責任歸屬能夠釐清可分為兩類：受訪者 C 和 E 認為雙方對於事件的責任歸屬是可以釐清的；而其他受訪者則不這麼認為：

(一) 責任歸屬可以釐清

如前所述，受訪者 C 主張認錯、道歉是進行對話會議的先決條件，如果加害人不同意認錯，讓雙方當事人進入對話會議也只會帶來爭執，不應貿然進入對話，而應由修復促進者慢慢引導，等到加害人願意認錯的時候，雙方始可進入對話會議，在 C 的思考中，責任釐清的部分不是藉由加、被害人對話達成，而是由修復促進者與當事人溝通而來，C 的這個立場與其對話會議先決條件的想像大致相符。如果加害人在進行對話會議之前已經認錯、道歉，那麼理論上在對話時加害人「應該」不會再對事件的責任歸屬有所爭執。另一方面，E 認為加、被害人直接對話始可使加害人了解自己有沒有犯錯，這個立場也充分說明他為什麼認為只要雙方有意願即可進入對話，就此一立場而言，對 E 而言沒有必要在對話前就釐清責任歸屬或確認加害人是否願意道歉，因為對話便能達到這個功能：

認錯、道歉是結果，而是說在這個、透過這個對話機制上面，我覺得可以讓當事人去了解到你有沒有犯錯，你覺得你有沒有過錯。(E-087)

(二) 不必探討責任歸屬

B 雖然和 E 同樣認為只要雙方當事人有意願即可進入修復式司法，因而同樣非以認錯及道歉作為對話的先決條件，然而 B 並未與 E 同樣抱持「對話可以釐清責任歸屬」的看法，而是認為在對話會議中當雙方當事人對於事件本身的認知有所出入時，應該盡量避免將討論圍繞在事件本身，而是該把焦點放在關係及情感的修復：

我覺得一個主持會談的修復促進者，我覺得很重要的不能夠聚焦在事件上，因為我覺得我受到的一個教育還有受到的司法是...修復式司法其實最重要的是告訴我們，重要是那個關係還有那個情感，讓他們透過這樣子願意來、然後讓他們去抒發它。(B1-026)

對 A 而言，他認為作為一個修復促進者應不過問對錯、不談論過程、不談論是非，因為修復促進者並非司法人員，有罪、無罪不是也不該由促進者來判斷，

F 對此也和 A 抱持相同看法，認為在修復式司法中有罪、無罪都仍在未定之天。

(三) 討論

如果徹底貫徹上述 A 和 F 的這種「修復促進者不應判斷有罪、無罪」立場，實際上就不存在加、被害人之別，如果不存在這種區別，那麼要如何實行 A 所謂「以被害人為核心的修復式司法」？相同的問題也出現在 D 的部分，他認為即使雙方當事人在對話之前針對責任歸屬的認知存在差異，但這個差異可以經由對話得到澄清，本文懷疑，如果在對話前這種歧異依舊存在，那麼 D 所謂的「加害人道歉是修復式司法和對話啟動之先決要件」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加害人道歉的基礎是「尚未澄清的事實」，那我們還能說這是「真誠」的道歉嗎？如果被害人是認為加害人已經願意道歉的前提下才同意進行對話，那麼在對話中才來「澄清」彼此對事件看法之歧異會不會使被害人產生 A 口中的「二次傷害」？如前所述，A、D、F 的評估標準皆非獨為「當事人意願」，而尚包含諸如加害人道歉等前提要件，但以他們對責任釐清議題的觀點看來，這些要件又變得難以掌握，在此情況下，是否加、被害人對話又成了相對容易的選項？加上 B、E 也抱持著越快對話越好的看法，也就是說，大部分受訪之修復促進者，對於是否展開對話的要件把關整體而言呈現較為寬鬆的標準。

誠然本次法務部推動的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是以加、被害人調解(VOM)為核心，幾次教育訓練的內容和現場演練也都以此為基調，如此看來，B、E 會認為當事人越快進行對話越好並非毫無道理，但明顯地 A、C、D 都對是否要盡快召開對話持保留態度(儘管 A、D 的看法有可能因現實上之困難而遭遇矛盾)；F 設定的其它評估標準雖然抽象，但仍非認為只要當事人願意就可以召開對話。本文認為，評估標準有此歧異的原因還是要從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之理想開始看起。

在法務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中，進入修復式司法之案件及由專案小組負責初步評估案件適合性的開案標準皆敘明：「加害人必須先有認錯及承擔責任之意」，這個標準基本上也為受訪之修復促進者所屬之地檢署所遵循。以此看來，所謂以「加、被害人調解(VOM)」為主要模式的修復式司法方案，其實是在先確定責任歸屬的情況下，以加害人願意認錯及承擔責任為前提才能展開。如果能夠確實遵守這個原則，可以想見的是，在修復促進者正式開始處理案件之前，責任歸屬的問題就已經被澄清、解決，而還有責任歸屬問題或加害人不願意道歉的案件應該不會進入修復式司法，更遑論到達修復促進者的手上，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不管修復促進者彼此對於「責任歸屬問題應該在對話前即確定」此一前提同意與否，這在實踐上都不會成為問題，因為此一歧異早在程序前端就該解決。

這些都只是理想，能否在現實中實踐，決定於相關操作人員是否貫徹原則，但從開案之後才開始接觸案件的修復促進者無法決定前端的程序運作，這會對其理念與實踐造成什麼影響？另一方面，透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在理念的部分，修復促進者間的差異固不待言，而在修復促進者自身理念的一致性上，有時候也會出現矛盾之處，這些理念的差異和矛盾會如何顯現在修復促進者實踐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過程中？而修復促進者在操作修復式司法的過程中，是否都能依循其本身之理念？如若不能又是哪些因素使然？透過修復促進者們講述其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實際處理案件之過程，也許我們可以一窺端倪。

六、小結

大多數修復促進者都是初次接觸修復式司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具備修復式司法所要求的法律、心理諮商、社工專業背景之修復促進者，傾向於以其所學來理解修復式司法，從而具法律背景者認為修復式司法之目標在於「預防再犯」，具心理諮商背景者將修復式司法之目標設定為「當事人復原」，具社工專業背景者則認為「被害人復原」才是修復式司法的主要焦點所在；另一方面，不具修復式司法方案所要求之專業背景，但符合方案要求助人經歷之修復促進者，則傾向遵循其於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中所接受的觀念，對修復式司法目標之理解集中於「關係修復」、「情感修復」和「促進了解」。

對於將「當事人復原」視為修復式司法目標的修復促進者而言，案件是否適於進入修復式司法方案流程也純粹繫於當事人意願，其餘影響修復促進者開案標準之因素則包括當事人間是否熟識、案件類型之嚴重程度和加害人犯行是基於故意或過失。對於多數修復促進者而言，若當事人間互相認識且往後會繼續往來，則案件的修復意義較高，然而也有修復促進者認為即使雙方互不相識之案件仍有修復價值、意義存在。

法務部推動之修復式司法方案係以「加、被害人調解(VOM)」為主，因此修復促進者對於「修復式司法」和「加、被害人對話」二者目的理解之落差是值得探討之處，這會顯現在他們評估案件是否適合召開對話會議的「評估標準」之上：將二者之目的視為同一之修復促進者，傾向將評估標準單純繫於「當事人意願」，從而只要當事人願意便越快進行對話越好，別無其它評估標準；認為二者目的實有不同之修復促進者則是將對話視為達成修復式司法目標之手段，因此會設定其它評估標準，其中最重要者為「加害人是否願意認錯、道歉並承擔責任」。

雖然大多數別有其它評估標準者都認為加害人願意認錯、道歉並承擔責任是修復式司法之前提，然而對於召開加、被害人對話前是否就應釐清這個前提卻莫衷一是，因而可能出現自相矛盾之處，這些矛盾必須放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踐的脈絡下，才可能進一步看清其源頭所在和影響所及。

修復促進者的專業背景或經歷會影響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目標之理解，而對修復式司法和對話目標理解之落差則會呈現在修復促進者的評估標準之上，這些相互影響的關係呈現於圖 4-1-1；責任歸屬應否或應於何時釐清的議題為評估標準中最重要的一環，本文將修復促進者的看法整理如表 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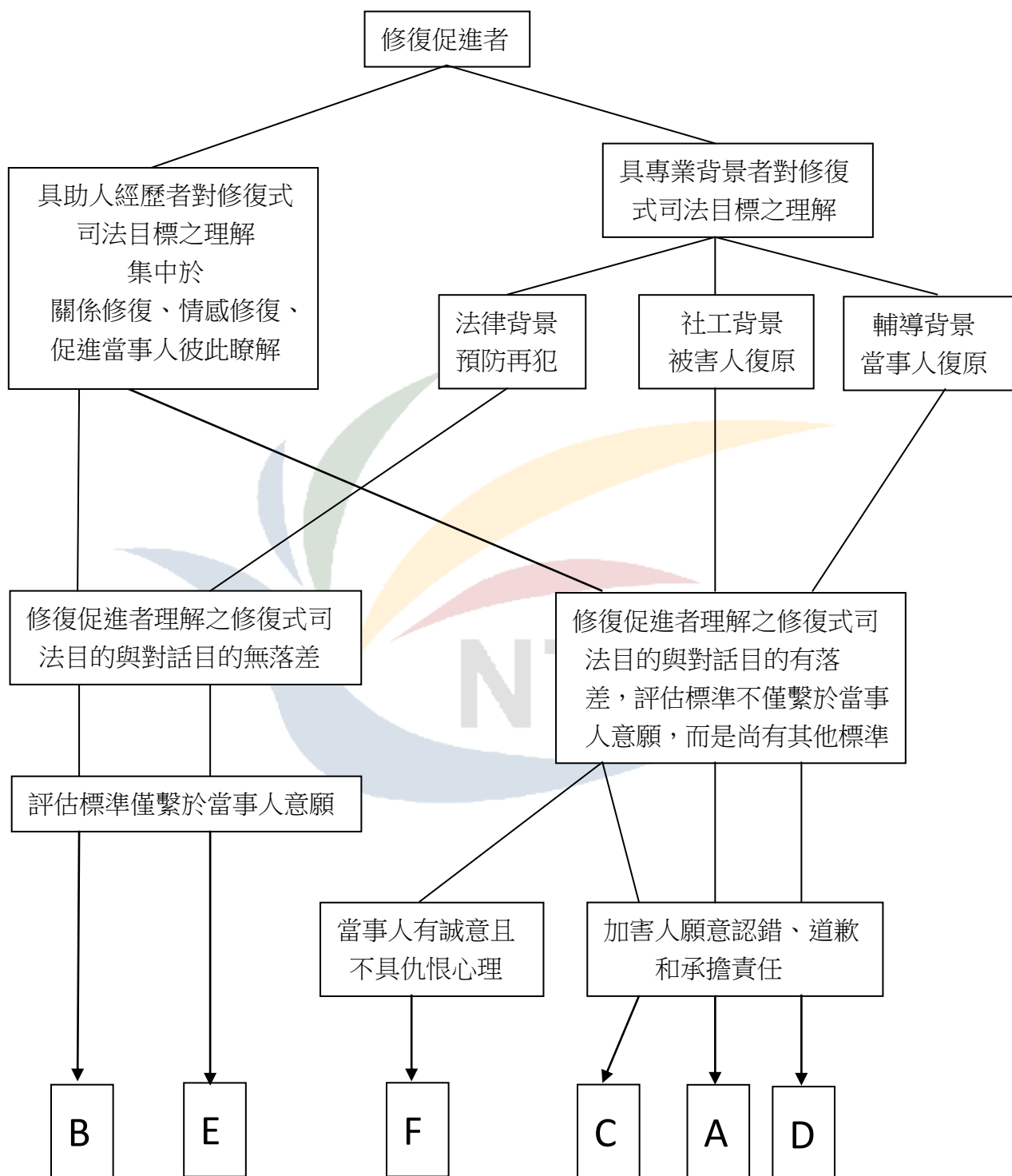


圖 4-1-1 修復促進者之學經歷背景、其認知的修復式司法目標、對話目標和評估標準之關係

表 4-1-4 修復促進者對於對話前或對話時應否釐清責任歸屬之看法

責任歸屬	對話前應釐清	對話時應釐清	以加害人願意道歉 為修復式司法前提
A	X	X	√(?)
B	X	X	
C	√		√
D	X	√(且可釐清)	√(?)
E	X	√(且可釐清)	
F	X	X	

註：？代表該修復促進者對責任釐清的看法使加害人道歉之前提難以確立

第二節 受訪者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實踐

根據法務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實施計畫，修復式司法的實施流程為申請或轉介、開案、二階段評估、對話前準備、對話、後續追蹤及轉向措施、結案。本文原則上將依循這樣的順序探討修復促進者於修復式司法的過程中如何實踐其理念，而制度與其抱持之理念又是如何互動。然而本文將開案及第一階段評估的順序對調，理由是在實務上，經過當事人申請或其它單位轉介案件之後，會先經過主管修復式司法之司法人員初步評估案件進行修復式司法的合宜性，經此評估通過後始將案件轉移給修復促進者，本文認為將此初步評估後確定轉交給修復促進者的案子稱為開案較具討論價值。另外，本文不討論案件後續追蹤及轉向措施，原因在於在本次訪談完成時大多數受訪者處理的案子都未有此一步驟存在。

必須強調的是，與其說受訪的修復促進者之實踐完全受其理念所形塑，倒不如說他們的理念和實踐實際上是不斷地交互影響：促進者帶著對修復式正義最原初的理解進入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並在和當事人接觸及主持對話等實踐過程中重新反思修復式司法的意義，以這種反思再投入下一個過程或案例。受訪者 A 對於修復式司法的理念便受其實際參與之「殺人未遂案」影響甚深：

我是好不容易這一次我才：不對啊，這個是調解啊，那修復是應該是修復誰？修復被害人，那怎麼會這樣子...？(A2-027)

此一案件的處理過程使 A 重新反思修復式司法的意涵，可謂實踐回過頭來影響理念的代表之人。當修復促進者正式被分配到案件之後，理念、實踐、反思、實踐的循環往復便正式開始，修復促進者對修復式司法的認知與其所處理案件之實踐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為求討論方便之故，本文從各個修復促進者所處理之代表性案例出發(見表 3-3-2)，討論受訪者在過程中之實踐情形：

一、案件來源：當事人自行申請或由其它機關轉介

加、被害人得自行申請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檢察官、法院、監所、觀護人、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及更生保護等機構亦可轉介案件至修復式司法流程。由於修復式司法是由外國引入的新概念，一般人幾乎是聞所未聞，因此實際上進入修復式司法的案件幾乎皆是由其它機關轉介，而非由當事人自行申請。

本研究所訪問之修復促進者處理的所有案件皆為偵查中的案件，而由檢察官轉介而來，然後再由觀護人分配案件給兩位修復促進者，此時修復促進者便正式開始處理案件。這些案件所經之流程為修復促進者之實踐帶來的影響不一，值得討論的問題有三：首先，最重要的問題是雙方當事人是否自願參與修復式司法？再者，不管願與不願，加、被害人為何參與修復式司法？最後，加害人於修復式司法中的表現及其所獲致之結果是否應與司法程序中的量刑部分脫鉤？

（一）當事人自主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度有限

根據法務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實施計畫中實施原則第四點，修復式司法之實施應尊重當事人之自主意願，如當事人一方無參與意願，絕不可強制其參與。然而透過訪談我們可以發現，當事人的自主意願是否受到尊重其實相當可疑。依照轉介流程，檢察官會詢問當事人是否願意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在雙方當事人皆同意的情況下始可為之，但大多數修復促進者指出，在與當事人連絡之初，他們並不認為對方已經了解修復式司法，除了受訪者 C 認為當事人都在被告知並了解修復式司法為何的情況下才自願進入修復式司法外，其他受訪者都不認為當事人是在充分了解且自願的情況下進入修復式司法。

本文認為，如果當事人不了解他們即將進入的程序，那麼所謂的「同意」事實上是空洞的，「自願」二字也會大打折扣。即使檢察官在加、被害者皆同意後留下雙方的簽名為證，也絕非代表沒有問題：在 B 和 F 共同搭檔處理的「機構被告案」中，加、被害人雙方在 B、F 與其連絡之初便矢口否認曾經簽下這樣的一份同意書，在修復促進者遞出他們當初簽名的文件時才改口：

他們才會自圓其說的說，這我們什麼時候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啊！他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得這樣做！（B2-027）

受訪者口中的「自圓其說」，也許正是當事人內心深處想法的真實流露。「他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得這樣做」顯示的是當事人內心的憂慮：由於這些當事人的案件都在偵查階段，因此害怕一旦不同意進入修復式司法便是不合作，會被視為配合度不高，而在原先的司法程序中吃虧，導致「同意」成為一個不得不為的選項，D 便明確指出雙方當事人這種潛在焦慮；E 則認為修復式司法對被害者一方而言或許是一種樂於嘗試的新方式，但對加害人而言卻容易因畏懼而同意進入修

復式司法；而這種畏懼對 A 而言則是逼使加害人在被害人願意的前提下進入修復式司法進行對談的有效武器：

今天你要加害者要促談，你不來那就列入記錄，你根本沒有誠意嘛！那就移回去，檢察官有資料「顯無悔意」嘛，那既然沒悔意就是量刑最大嘛！（中略）這個受害者願意了，那後面一切就很順利，因為那個加害者沒有拒絕的理由，你在法律上根本不應該，你就直接發個公文給他：你就給我到！不到沒關係啊，給你記錄起來，對不對？(A2-025)

(二) 加、被害人為何參與修復式司法

1. 達成賠償

儘管不見得具備完全自主性，但當事人亦非全然被動地進入程序任人擺佈，他們毋寧是帶著各自的想法與期盼來參與修復式司法，而由於案件皆屬偵查中階段的性質始然，B、C、D 皆認為當事人之所以願意進入修復式司法，心中抱持的想法便是希望能透過此一途徑獲得賠償，B 便認為所謂情感、關係的修復並不是當事人最初始的關心重點所在，C 則指出雙方不想在法庭繼續見面，而希望以另一途徑達成賠償的初衷；D 認為加、被害人雙方對於司法運作的恐懼使其有和解之共同目標，因而較願意接受修復式司法。

2. 了解受傷害之原因

A 認為只要被害者沒有意願進行修復式司法便沒有必要開案，如若開案必須以其同意為前提，而被害者之所以會想參加修復式司法並與加害人對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希望「得到一個答案」，：

他們有時候需要得到一個答案：你為什麼要傷害我？那我來選擇要不要原諒你，因為你真的不是故意的，對不對？那我可能心裡頭比較自在一點；那如果你真的是故意的，我幹嘛原諒你？對啊，就是這樣子啊，就是說你要讓當事人知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傷害我。(A1-034)

(二) 加害人於修復式司法中的表現與獲致之結果應否與量刑脫鉤——莫衷一是

考量 A「以被害人復原為核心的修復式司法」之思考方式，他對於當事人自願性以及被害人何以願意參與修復式司法之立場其實並不意外，不過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際上並未如其理想般規劃的同時，他又是怎麼看待加害者進入修復式司法的動機呢？此時便牽涉到修復式司法運作之結果應否與加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量刑部分脫鉤的問題。

法務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的實施原則第七條寫道：「當事人於參

與過程之陳述、協議及履行情形，該案件承辦檢察官或公訴檢察官得自行衡酌的是否列入偵查終結處分或提供法院作為量刑之參考。」據此，加害人於修復式司法中的表現、雙方是否達成協議以及協議的執行狀況都有可能影響其量刑，端視檢察官的考量。面對修復式司法進行之結果是否應該與加害人之量刑脫鉤之問題，B 不認為會對公平性造成影響；C 認為若加害人在修復式司法中表現正面，則量刑方面無可避免地一定會受到影響而減輕；A 則認為，加害人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的正式道歉或金錢補償，如果是為了讓他減輕未來的刑責，那就失去了修復的意義，而如果加害人被以這樣的方式引導，便會產生錯誤觀念，以為道歉和賠償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罪刑。

二、開案與否之評估標準

(一) 當事人間之關係原為熟識與否

在受訪者所參與的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流程中，開案與否並非由修復促進者決定，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所接收的案子不見得符合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開案標準，例如在受訪者實際處理的案件中，車禍案件佔了很大的比重，但是不只一位受訪者都談到以修復式司法處理車禍案件的適宜性問題，這種疑慮反映了修復促進者心中最主要的開案標準判斷因素之一：當事人間的關係原為熟識與否？

A 雖然在處理「殺人未遂案」後出於促進者、陪伴者人身安全問題的考量對重罪案件是否應進入修復式司法有所疑慮，但由於此案中加、被害者雙方有親屬關係，而且在案發後仍然必須生活在一起，因此肯定此案有其修復價值，顯示當事人間之關係原為熟識與否對其判斷至關重要。儘管除了 A 和 D 之外的受訪者都將關係修復視為修復式司法的目標之一，但這些修復促進者也認為當事人若為陌生且往後不會繼續往來的案子比較沒有修復價值，例如 B 和 C 便提及車禍案件之所以進入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是由於在試行之初案源不多，加上修復促進者也是第一次接觸修復式司法，因此將車禍案件納入作為擴展修復促進者的經驗之用，實質上的修復意義沒那麼大，C 指出：

我們的目的是修復感情，你撞了我我被撞，這種中間的感情、實際的感情沒有那麼特別需要修復。(C-018)

(二) 佐以其它標準之綜合判斷

儘管修復促進者認為一般而言車禍案件以修復式司法處理的意義較小，但仍有其它因素可能左右修復促進者的看法，例如被害人所受傷害的類型以及嚴重程度：E 雖然認為過失案件只涉及錢的損失，比較沒有情感傷害的問題，但車禍案件若傷及皮肉就比較有修復意義；A 也認為車禍案件若造成當事人重傷害甚至往生，則當事人或其遺族可能就有了解事發原因的需求。

觀察各修復促進者的心中理想與其實際處理案件，可簡單地分為兩類：符合其理想之開案標準與不符合其理想之開案標準。基本上除了 A 和 F 之外，其餘修復促進者或多或少都曾處理不符心中開案標準之案件，這種狀況會對修復促進者在實務上的作法造成什麼影響是值得討論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不符合修復促進者的標準並不代表他便會據以認為案件之處理沒有修復效果，以 B、C 為例，雖然並不那麼贊成以修復式司法來處理車禍案件，但他們仍認為其處理之案件最後仍獲得一定程度的修復效果。事實上大部分修復促進者都認為，不管案件最後有沒有成功達成協議，皆可能出現不見得在預期之內的修復效果。這點留待後面討論。

三、對話前準備與評估

在所有受訪者中，只有 A 有與陪伴者合作之經驗，其他修復促進者基本上皆是以兩人一組的方式搭配，這種雙促進者模式係為加、被害人雙方各配置一個修復促進者，由其了解一方當事人之情況並在相互聯繫、溝通後決定是否適合進行對話，這種模式除了在「有備而來案」中由於 C 的搭檔太忙而由 C 一人分飾二角之外，基本上便是 B、C、D、E、F 的工作模式。A 與其他人的區別，在於實際負責對話前準備與評估工作者為陪伴者而非其本身。

由於除了 A 之外的受訪者皆有另一修復促進者作為搭檔，而且兩人事實上皆身兼陪伴者之角色，因此討論其評估對話與否的標準時，如能納入另一搭檔之標準或觀點應更為周延，礙於每個受訪者的搭檔不一定皆為本文訪問之對象，有些案例難以同時呈現兩位修復促進者的看法。

(一) 加害人有道歉之意願：A、C、D

1.A：心口不一？認為加害人並非真誠道歉

在 A 處理的「殺人未遂案」中，由於對話前的準備與評估工作係由陪伴者負責，本文無從得知陪伴者之準備與評估標準何在，只能由 A 實際主持本案對話的情形出發來討論，而此次對話本文作者亦有在旁參與觀察。如前所述，A 的理想「以被害人為核心的修復式司法」是因「殺人未遂案」的處理過程而成形，這種轉變實與修復促進者、陪伴者在此案之搭配有很大的關聯。

在這次對話會議中，首先由 A 開場陳詞，講述該日大家共聚一堂的原因以及本次對話之目的等等，接著在加、被害人雙方各自表述本身看法後，陪伴者便拿出預先擬好的協議書，尋求加害人之同意，而加害人雖然已向被害人道歉，但對於賠償金額有強烈意見，態度相當強硬，他拒絕賠償的同時也使 A 醒覺被害人可能遭受二次傷害的問題：

你把人家找來了，人家是希望說你真的會道歉，結果你說我沒錢啦！講錢！（台語）那就是第二次傷害。所以其實那一次以後，我覺得我就不想促成第二次，因為你這種樣子讓人家看在心裡面，這叫道歉嗎？如果你發生加害人是這樣的狀況，你覺得你把被害人找來不是第二次、二次創傷嗎？(A2-021)

本案係為故意殺人未遂案，責任歸屬非常明確，由上述文字看來，A 認為加害者的態度有問題，因此雖然加害者已經道歉，但 A 仍不認為這樣能被視為真正的道歉，認為加害人的態度會造成被害者二次傷害，這個案件也促使 A 反省修復式司法的重點所在。以 A 理想的分工模式看來，加、被害人雙方都應設置陪伴者之角色，陪伴者要評估雙方是否適合對話，而被害人與加害人對話的意願既為開案前就該確定的絕對前提，因此在開案後、對話前的評估工作重心其實是在加害人是否願意真誠道歉，若其不願，則基於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傷害的想法，就沒有進行對話會議的可能。

然而所處理案件係屬偵查階段此一性質，卻也使得 A 的看法在此似乎出現自我矛盾，正如本文前面提到，A 認為修復促進者不宜過問對錯，也不能如司法人員一般決定當事人有罪、無罪，但是若真的採取此一立場，那麼在修復式司法這個流程之中，似乎就沒有辦法先行論定誰是加、被害人，從而便沒有遵循「修復式司法之啟動應以加害人願意向被害人道歉為前提」的可能。

本文認為，基於 A 對於「殺人未遂案」的強烈感受，以及強調修復式司法應以被害人為核心的頻率看來，他對於開案後雙方在何種條件下始得進行對話的標準上，應該還是以加害人道歉為前提無誤，而以加害人道歉為進行對話的前提也代表了案件的責任歸屬應該要在對話前就釐清，而非在對話時還有讓雙方當事人爭執的空間，因為一旦爭執，代表被害人就有可能受到二次傷害，而這是 A 所無法接受的，以下這段話可以看出，在對話中 A 不願將對話重點著重於案發事件本身，而是聚焦於其他部分：

我們不去談論過程嘛，因為過程的部分是偵查的部分，那偵查不是不公開，而是偵查本來就不能碰，而且當事人並沒有想重覆...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從來沒有講，我們就說那你哪一塊你想要了解？我...你會發現跟、跟那一件事還是沒有關係，就是你之前怎麼樣？你媽媽怎麼樣(台語)？就、就是以前早期的問題嘛。(A1-039)

「不去談論過程」其實背後隱含的前提是「過程已經無須談論」，還想爭執事件過程的加害者在開案階段便會被拒於對話會議之外。本文認為，導致 A 出現自我矛盾的「不應預先判定誰是誰非」之主張，其實來自於其對修復促進者應扮演中立角色的自我期許，在他的理想中，陪伴者負責評估，而促進者負責主持

對話，在對話會議召開前促進者不需要接觸當事人雙方，以求能夠盡可能保持中立，這種維持中立的期許最後和責任歸屬的問題產生了連結：

你雖然是被害人，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的滿足你，因為在判決沒有確定之前可能都是「與有過失」，但是就絕對中立嘛。家暴與有過失，車禍與有過失，只是歸屬不一樣而已。(A1-042)

問題是「主持會議者能不能保持中立」和「案件責任屬於當事人何方」這兩個命題真的有必然的連結嗎？如果確定了加、被害者，就一定會妨礙主持會議者的中立性嗎？本文不認為這有邏輯上的必然性，但是為什麼 A 會隱隱然將兩者連結在一起呢？這恐怕還是要回到 A 對於修復式司法的理念：以「被害人」為核心的修復式司法：以被害人復原為修復式司法的首要目標、程序發動也以被害人的意願為依歸、加害人若拒絕可列為沒有悔意的證明等等……凡此種種看法皆顯示，如果明確劃分加、被害者，A 心中修復促進者應具備中立性的自我要求便會受到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認為修復促進者在對話會議中不宜論斷是非便成為一條暫時能夠維持促進者中立性的路。然而這樣的遁辭在其強烈以被害人為核心的修復式司法理念下終究難以自圓其說：A 在第一次訪談時認為，修復促進者的要求和社工不同，社工扶助弱勢者，修復促進者則必須維持中立、客觀；但在第二次訪談的尾聲，A 的看法已經沒有這麼堅定，甚至回過頭來推翻了修復促進者應保持中立的立場：

我們在調解當中就是中立，但是我們在修復式當中還是要以被害人為主，我的認為啦，不見得對啦，可能跟國外的文獻不對啦。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兩、兩造的對談本來就是不對等，因為你、你是加害人，被害人要比你高，而不是突然你怎麼變對等了？沒有人說對話、修復式促進的對話一定要對等，因為它本來就不對等，因為今天被你傷害的人搞不好是手無寸鐵啊，從來就沒有對等過啊，對不對？(A2-021)

至此，A 心中真正的想法才確切呈現出完整的面貌：修復式司法應以被害人為核心，以被害人復原作為目標，在被害人願意進行對話時，加害人便必須參加對話，若不願意則可作為沒有悔意的證明。陪伴者要做的工作便是評估雙方參與對話的意願，在雙方願意對話時便可召開對話會議，會中修復促進者的角色不需要做到中立，而須以被害人的復原作為指導原則，站在被害人這邊。對 A 而言，陪伴者的任務很單純，除了評估加、被害人雙方進行對話的意願之外，還要說服被害人使之願意進行對話，此一說服工作的重點在於，讓被害人了解與加害人進行對話的目的在於使其能在往後的人生「繼續往下走」。在這樣的思考下，由於必須有確定的加、被害人，因此沒有責任釐清與否的問題，責任歸屬確定屬於加害人，或許這種思考無法處理雙方當事人與有過失的案件，但這暫時無法挑戰 A 的思考模式，原因在於他並沒有處理過這種案子的經驗。

2.D：事與願違—不符其開案理想之案件影響評估標準之實踐

D 和 A 同樣認為「加害者願意道歉」是啟動修復式司法之要件，同時也是進行對話會議的先決條件，然而他並未有偏重加、被害人任何一方的傾向，係以「當事人復原」作為修復式司法之目標，D 在接受訪談時指出，在開案後、對話前的這個階段準備工作包括說明修復式司法、與當事人建立關係、了解其身心狀況等等，D 認為這也是修復式司法之所以引入心理諮商專業人才的原因之一，然而他並未將責任釐清納入準備階段時的評估重點，對 D 而言，他認為在對話時雙方的歧見透過溝通將能夠得到澄清，因此沒有必要在準備階段便挑戰加、被害人雙方事實認知的不一致，可是這樣的立場似乎與「以加害者道歉為啟動修復式司法之要件」有所矛盾。

回顧其與 E 共同處理的背信案之性質，我們可以發現以 D 心中的開案標準看來，這並不是一個應以修復式司法處理的案件。對 D 而言，雖然雙方關係非為陌生，但是在案件過後雙方不會繼續相處，因此沒什麼修復的必要；E 則認為自法律觀點而言，被害的一方是公司，而公司是沒有情感可言的，因此 E 也不認為本案有修復的必要。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以修復式司法處理心目中沒有修復必要性的案件，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選擇是逕行結案，另一個選擇則是放寬心中標準，讓案件繼續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開展至下一階段。

對 D 而言，適合進入對話的前提是被害人一方要能夠轉換觀點，不再以被害人的觀點看待自己，願意試著原諒對方、放過自己，有這種契機時才適合進行對話，問題是這種要求在這個背信案件中根本沒有成立的可能，理由正是 E 指出的「公司沒有情感」，如此一來，加害人是否願意道歉也失去意義，不再是雙方當事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評估重點，結果便是雙方只要有意願便可展開對話，而無須先釐清雙方的責任歸屬。

從 D 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修復促進者評估當事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標準之所以未能落實在其實踐中，有時候可能是因開案標準不符其心中理想使然。嚴格來說，D 甚至認為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這個階段，每個案子似乎都進行得太倉促了，他認為其所接觸的被害者實際上都還沒達到能夠改變觀點看待受害事實的這個契機，「誰的責任案」自然也不例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說 D 是不甚幸運的：他處理的案子都不是按其心中理想的方式展開。

3.C：遂其所願—嚴格執行評估標準以解決前一階段遺留之問題

將「加害人道歉」視為加、被害人進行對話之先決要件者還有 C，對 C 而言，此一原則是不能妥協的，就算在源頭讓加害人尚不願認錯、道歉的案件進入修復式司法，C 仍會對加害人循循善誘，使其願意向被害人真誠道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會讓加、被害人進行對話。在「同居傷害案」以及「有備而來案」中，C 都

貫徹了這樣的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備而來案」中，雙方當事人其實已經先走過鄉鎮市調解的途徑，調解不成才轉至修復式司法，在這個過程中，其實雙方對彼此都產生相當不滿的情緒，被害人認為對方沒有誠意賠償，加害人則認為調解委員偏袒被害人。C 於此案中由於其搭檔太忙，因此形同獨挑大樑，加、被害人雙方都由其同時負責，她穿梭於加、被害人之間，轉達各自的意思與境況，在過程中慢慢化解雙方的敵意。在責任歸屬的部分，細觀 C 的想法可以發現，她認為在這個車禍案件中加害人固然要負起大部份的責任，然而被害人一方也並非完全沒過失，只是她告訴加害人在與對方對話的過程中不要再提起，唯有在被害人這方面太過強勢時，C 才可能以此為由介入排解：

我叫他不要講，你就是對不起、就抱歉就好了，那就不需要再講了，對，不要再講，因為對方都、都有點願意要和解的時候，我們不要再弄到一個不舒服的點，除非他一直壓著他下來的時候，我們說了：其實噢，你自己也有一點錯啦，譬如啦！人家都願意接受的時候，都看到一個、有一個好的結果的時候，這種負面的東西都不要提了。(C-043)

對 C 而言，加害人認錯、道歉是至關重要的，但此時的認錯代表必須真的認為自己全然有錯嗎？由此案看來似乎不見得如此，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這是一個車禍案件，本來就可能出現與有過失的情形，從其他受訪之修復促進者處理車禍案件的過程來看，並未有其他人如同 C 一般，堅持在加害人願意認錯、道歉並不爭執案件責任的前提下才能召開對話會議。

(二) 雙方皆有誠意且對彼此已無仇恨心理：F

F 認為雙方當事人如果對彼此還存有仇恨心理時並不適合進行對談，另外也要評估當事人所說的話是否出自真心誠意。本文認為，所謂「仇恨心理」和「真心誠意」都是相當抽象的詞彙，要辨識當事人是否仍有仇恨心裡或其言行是否出於真心誠意並非易事，若要以此作為標準，或許有賴諮商心理輔導專業的介入。在 F 和 B 共同主持的「機構被告案」中，於對話之前兩位修復促進者曾共同與被害人家屬見面，於談話過程中，這位被害人家屬數度嚎啕大哭，F 覺得很感動，但 B 則持保留態度，認為這位被害人家屬內外不一致，有演戲的成分在。舉出這個案例的重點不是在評論 B 和 F 的判斷誰是誰非，而是在於 F 此一評估標準有其難度。以此案例而言，即使兩位修復促進者對於當事人是否真誠的判斷不一，加、被害人還是展開了對話會議，這是因為 F 判斷其為真心，就其標準而言可以進入對話會議，縱使 B 和 F 對當事人的看法南轅北轍，但由於她認為只要雙方有意願就可以進行對話，因此逕行展開對話也沒有違背她的標準。

(三) 當事人有意願即可：B、E

由於 B、E 都認為雙方當事人只要有意願即可展開對話，因此在評估的部分便全然在於當事人的意願，別無其他標準。觀察 B、E 所負責之案件，基本上皆基於此一想法展開，在準備階段確認雙方有會面的意願之後便召開對話會議。

從前述討論可以看出，即便心中存在周延的評估標準，也未必能在準備階段徹底執行，造成的結果便與相對而言較寬鬆的評估標準一樣，在前階段懸而未決的問題將對後一階段的實務操作產生巨大的影響。本文接著要討論的便是，這些基於評估階段所遵循(或未遵循)之標準進入對話會議的案件，會因為這些前階段所未解決或仍有疑慮的問題而產生什麼影響？

四、對話與對話結果

(一) 對話走向

1. 責任歸屬已然釐清：C、A

(1)C：可將對話走向聚焦於關係之修復

首先必須澄清的是，對 C 而言，所謂的「對話」應於所有參與者心裡對將產生的協議結果都有心理準備時才能展開，功能只是將雙方心裡都有底的協議付諸文字而已，因此在做成協議的會議召開前，即使加、被害人雙方會面，對她而言也不稱之為「對話」，而是「會前會」。然而對本文而言，所謂的「會前會」其實就是「對話」，於案件進入修復式司法流程後，加、被害人在「會前會」之前沒碰過面，對彼此態度或立場的認知只是經由修復促進者轉述，「會前會」毫無疑問跳脫了修復促進者與當事人個別會談的階段，是流程中關鍵的轉捩點，而且恰恰可以檢驗 C 對於當事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評估標準有無確實實踐。

以「有備而來案」而言，C 在準備工作階段穿梭於加、被害人之間，轉達彼此的情況以及為此案之付出，而如前所述，雙方因先前調解不成已產生敵意，這也促使她覺得有必要召開會前會，讓雙方面對面瞭解彼此狀況，特別是有必要讓受害人這一方瞭解加害人的家境以及曾為此案付出的努力。

在展開「會前會」之前，由於 C 認為加害者是一個不擅於表達的人，因此於個別會談的階段，C 便提示加害者在和對方會面時應該說些什麼：首先她希望加害者把自己的誠意、自己曾做過什麼事情說出來；再來，針對加害者做不到的事情原因為何也要一五一十陳述；在被害者這方面，C 轉述了加害者的家境及其誠意，並分析此案以司法途徑處理時可能的弊病，此時被害者便以同意將賠償金額降低數十萬，然而 C 認為降低後的金額扣除保險公司願理賠的部分仍非加害者負擔得起，在這樣的考量下，她決定召開會前會：

我認為會面吼，會讓他看到真正的狀態，他們不是騙說拿不出錢：欸，我說借錢我可以騙吧？我明明自己有錢我說我要借錢。看到了那個整個情境，噢我覺得那個就很重要。(C-033)

在此次會前會的對話中，加害人的母親亦做為支持者出席，在 C 看來，支持者出席的功能除了安定加害人的情緒之外，亦可使對方更瞭解彼此狀況。在會議中，加害者本人一如 C 所建議並未爭執事件的責任，在賠償部分，加害者則說自己會向朋友借錢償還，但並未提及家境的部分，C 認為這是因為加害人身為男性不肯說得太明白所致，而此一部分便是由其母親補上，她以一件生活中的小事，說明了家庭生活上的困窘，促進者 C 認為這的確會讓對方感到心酸，進而產生同理心，而這也反映在雙方於最後一次對話達成的協議之上，被害者願意在原先已同意降低賠償金的基礎之上，再將金額減至加害人負擔得起的程度。

回顧 C 的評估標準可以發現，由於堅持加害者必須先有認錯、道歉之意並有願意承擔責任的誠意始可展開對話，且儘管她對「對話」的定義限於最後達成協議的那次「會面」，然而加、被害人展開「會前會」直接面對面討論解決方案的前提仍是加害人對於責任的全面承擔，可以說加害人有認錯、道歉之意的原則並未有絲毫折衷，也因此在其主持之會議中不會出現當事人對事件責任爭執不休的場面，可以專注在雙方關係、情感之修復及解決方案之討論。

(2)A：受陪伴者影響而使對話走向偏為操作調解式的合意

在 A 心中，責任歸屬必須先行釐清以確實定位加、被害人已如上述，於「殺人未遂案」中，由於系爭案件為故意殺人未遂，此一基礎事實基本上也為參與對話的當事人所肯認而不爭。

然而此案中的對話與 C 所處理案件的對話差別在於：「殺人未遂案」中的加、被害人彼此認識，而「有備而來案」中的當事人雙方在案發前則素未謀面，也因此當 C 在個別會談中已經降低雙方敵意並說服加害人不爭執責任歸屬之後，在對話時所剩餘的事情就極為單純，只要設法讓被害人瞭解加害人的家境和誠意即可；但對 A 而言，在「殺人未遂案」中如果要像 C 一樣化解雙方敵意，勢必得處理在本案發生之前雙方就已經存在的矛盾，而此時所牽扯出的前塵往事就有可能脫離修復促進者的掌握，當被問及主持對話前所設定達成的目標時 A 便自承：

我覺得說訂的目標就是...去對話啦，那但是這個對話到底目的是什麼...嘖，很不明確，因為你要看兩造當下願不願意一直往下面走，我們引導得好他就走越多，引導不好他就走比較...一句話兩個人一弄不好，兩個人又吵開了也有可能，所以變成互相指責。(A1-041)

對 A 而言，在「殺人未遂案」中的評估工作一如其理想是由陪伴者負責(儘

管並非雙陪伴者)，而對話會議中的主持工作則由 A 擔綱。然而，經過評估之後所展開的對話局面卻是 A 所始料未及的：他很快地發現，對話的走向並不是他可以控制，理應作為輔助角色的陪伴者很快地將場面導往非 A 所願的方向。

對 A 而言，加、被害人雙方第一次見面的目的應為「對話」，尤其是讓被害人這一方能夠宣洩情緒、表達意見甚至對加害人發脾氣，以作為修復式司法目標「被害人復原」之起步；在加害人這一方，A 認為第一次對話時加害人就應該要道歉，並且仔細聽被害人之表達，他認為此時對話的主控權應完全掌握在被害人一方，被害人有疑問希望加害人解答時他才能夠說話，否則便只能聆聽被害人。

在實際的對話會議中，加、被害人才初步表達完自己的看法，陪伴者便拿出事先擬好的協議書，要求加害人同意，當加害人不同意賠償金額時，A 認為就破壞了被害人的感情，造成他的二次傷害。在他看來，該案中陪伴者的做法形同是在充分對話之前便直接操作雙方的「合意」，而這並非修復式司法該有的方式：

他(按:指被害人)必須選擇用他的方式來原諒，所以對話第一次是起步，第二步才有合意的問題，那這個合意絕對不是這種...那現在是反向操作，先操作合意，那不對，要先對話，對話到兩者的話講完了，那讓加害者釋出一個善意說那我願意賠償多少錢，那時候才有錢的問題，那時候才有合意的問題。(A2-006)

儘管 A 曾試圖補救，但這次對話最後的結果仍是破局，而雖然近乎在對話前完全沒掌握到加、被害人的態度與意向，A 也不認為這是因為自己沒有在對話前便接觸雙方當事人，相反地，他還是認為對話前的評估準備工作應由陪伴者負責，只是陪伴者必須依照 A 心中以被害人為核心的修復式司法之藍圖來執行評估工作，而陪伴者掌握到的情況必須充分讓促進者瞭解，為其主持會議做準備。

2. 責任歸屬尚未釐清：B、D、E、F

(1) D：加、被害人對話淪為各說各話

對 D 而言，由於修復式司法應以加害人道歉為前提，先行釐清責任歸屬似乎有其必要，然而因其抱持著責任歸屬可以在對話中獲得釐清的想法，因此對於加害人是否需在對話前的評估階段便有認錯、道歉及承擔責任之意的標準便相對持較為寬鬆的態度，這也反映在 D 與 E 共同主持的「誰有責任案」：在本文作者參與該案首次對話時，加、被害人雙方對於事實的認定並不一致，而在對話結束後這樣的歧異也未如 D 預想般獲得澄清，最後未能達成協議而結案；在 D 和 E 搭檔處理的背信案件中，本文作者亦曾參與觀察該案的首次對話，被害方某公司派了一位職員作為代表與加害人對談，對談過程中雙方仍就事件責任爭執不下，更遑論有何道歉可言，最後仍以未能達成協議結案。這兩個案子顯示，沒有在準

備、評估階段解決的責任歸屬問題，到了對談時仍舊找不到共識，顯示將責任歸屬問題留至對話階段的作法有其侷限；對 E 而言，能進入對話之案件評估標準更為寬鬆，會發生此一問題自然更不令人意外。

(2)B：對話情形殊難逆料、難以掌控

加、被害者在對話當中就責任歸屬各說各話，造成的問題除了浪費時間以外，更嚴重者係為雙方敵意在爭執過程中會慢慢上升，本來是希望修復雙方的感情或關係，最後局面卻越演越烈，在各個修復促進者中，B 就親身面臨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在「拂袖而去案」中，由於 B 和 E 同樣採取只要當事人有意願即可進行對話的評估標準，因此為對話埋下了雙方可能爭執責任的不定時炸彈。

在 B 的認知當中，雖然兩個修復促進者是各自負責當事人一方，但對話進行時的主持人角色會先行約定好由其中之一擔任，另一人則專心記錄會議進行狀況，在該案首次對話時，並非由 B 擔任主持人，而是由另一位不在本次訪談之列的修復促進者 G 擔綱，本文作者在此次對話中扮演從旁參與觀察的角色。

G 先請雙方當事人陳述自己所認知的事實經過，並提醒雙方不要打斷對方發言，就雙方的認知而言，加害者認為自己完全沒有責任，被害人則認為自己雖有過失但對方也有，加上自己有受到皮肉傷而對方沒有，因此要求賠償。在雙方各持己見之後，G 便開始主持對話，然而 B 認為 G 過度聚焦於車禍事件本身，而非著眼在 B 所認知的修復式司法目標——情感及關係修復，在這樣的情況下，B 不再固守單純記錄的角色，轉而逕自試圖向雙方拋出問題以求扭轉對話形勢，將其帶回情感、關係修復之層面，但此時雙方敵意已然升高，尤其自認毫無過失可言的被告方更是怒火中燒，在個別單獨會談之後，G 宣布雙方希望達成的協議底線，被告在聽到對方要求賠償時便拂袖而去，對談當場宣告破裂。

在「拂袖而去案」對話之前，B 原本對於雙方能夠達成共識頗具信心，因此出現破局的結果是其始料未及，這種樂觀的態度或許來自於前一個 B 處理的車禍案件「眉開眼笑案」之成功：在此案件中，B 和另一位非本研究受訪之修復促進者搭檔合作，但在對話會議中是由 B 來擔任主持人，因此可以貫徹其理念於實踐之上，亦即不談事件本身，而聚焦於當事人的情感部分，她認為在第一次對話的時候雙方的情感就已然修復，此時被害人求償的金額也降低了近百萬，然而 B 認為這仍非加害人能力所及，因此擇期再開第二次對話會議，在第二次對話中，B 認為雙方的關係已經十分融洽，加、被害人達成協議，賠償金額再降二十幾萬，被害人並同意讓加害人採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B 受訪時指出，不應該將對話焦點放在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之上，也不該強調雙方當事人彼此的分歧，而應將重心擺在彼此的情緒因事件所受之傷害及尋求彼此的共識。本文以為，B 之看法固然是堅守以修復情感、關係為宗旨而出發，

但重點不在於對話會議產生的爭執「不應該」發生，而在於應該全力在前階段使這些爭執「不可能」發生：只要加、被害者存在對案件事實的爭執空間及可能性，那麼如何能在僅憑對話意願評估對話可行性的標準下奢求雙方當事人能在面對對話時避談案件本身而直接訴諸情感？這種希冀在當事人不爭執責任歸屬的「眉開眼笑案」或許可以成立，但在「拂袖而去案」便可看出其脆弱性。

再比較「拂袖而去案」和「眉開眼笑案」可以發現，同樣以「對話意願」作為判斷當事人適合進入對話的標準，同樣是透過修復式司法的對話程序，但加、被害人雙方所建立的關係卻有天壤之別：前者敵意絲毫未減甚至增加，後者則修復彼此的關係也達成實質賠償之協議。除了案件責任歸屬是否釐清的問題外，對話會議由哪位修復促進者主導而其理念為何也至關重要，若兩人的理念不同，便涉及修復促進者之間溝通及默契的問題，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 B 和 F 搭檔的「機構被告案」之中。

(3)F：過於模糊的評估標準被後續對話走向狠狠賞一巴掌

F 認為評估雙方是否適合進入對話的標準在於當事人間不能有仇恨心理、當事人要有誠意，本文認為這樣的標準是難以掌控的，這也顯示在 B 和 F 對被害者家屬舉動的不同認知之上，而由於 F 是認定被害者家屬具有誠意的一方，而是否有誠意又非 B 的評估標準，因而「機構被告案」得以進入對話階段。在對話過程中，機構的相關人員盡皆出席，包括與被害者家屬為舊識的高階主管、犯下過失的職員、事發現場的督導等等，在對話過程中，F 表示場面一度相當火爆，該名高階主管在對話一開始說話就很衝，和被害人家屬差點吵得不可開交，被害人家屬甚至還想打高階主管。以此看來，當事人雙方的仇恨心理其實尚未消弭，本案就進入了對話階段，這若非出於 F 的判斷失誤，便是直接違背了他的評估準則，而 F 於訪談時亦曾指出，他認為在修復促進者與當事人的個別會談階段，可以透過讓當事人盡情傾訴、宣洩情緒的方式減低其對他方的仇恨心理，因此本文認為對話場面之火爆應是肇因於促進者對於「仇恨心理之有無」此一標準的判斷失誤，而這種失誤則是由於操作標準太過抽象、模糊所致；「當事人是否有誠意」此一標準的問題則留待「對話結果」討論。

(4)E：評估標準階段遺留之未爆彈深埋對話階段隱而不顯

E 和 B 同樣認為只要雙方當事人都有意願即可進入對話階段，因此懸而未決的責任歸屬問題自然亦會對其主持對話造成影響。就 E 所參與的三個案件而言，所有案例中的對話階段皆牽涉當事人彼此責任之澄清，其中與 D 共同主持的「背信案」和「誰有責任案」產生的問題已如前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輕人案」中，此一車禍案件實際上也存在責任歸屬的問題，加害人其實認為自己沒有過失，確定自己沒有違規，只是他並沒有在這一個部分多加著墨，E 指出此案的加害人

雖然認為自己沒有過失或認為對方與有過失甚至應負較多的責任，但對於對方的傷亡結果也願意坦承自己的過失：

以這個車禍來看的話就是這兩個案子，那我會覺得他們都坦承自己的過失，即便他們不認為自己有過錯，但是他們都同意，認為說我造成了這種傷亡就是不對的嘛，他們也覺得是遺憾嘛。(E-089)

E 對於當事人是否適於進行對話的評估標準是相當寬鬆的，因為他認為很多事情在雙方真的面對面談話之前是無法真正確知或釐清的，因此在對話前，舉凡雙方對事實之認知、期望等各方面的落差或歧異，在他看來都不成問題，不妨礙加、被害人對話的進行。以「年輕人案」看來，加害人雖對責任問題另有想法，但他願意承認自己的過失，使得可能出現的爭執場面不致於發生。

本文延續對 B 評估標準之看法認為，此案既然存在爭執空間，那麼年輕人願意認錯對於會議走向可謂是正面的發展，但標準的良窳、制度的優劣不能寄望於偶然的幸運，更何況「遺憾」和「抱歉」並不總是能畫上等號，對此案來說，若是雙方對於後續賠償問題看法差距過大，很難想像年輕人還能將其遺憾之心理轉化為真誠的抱歉，而更可能的是，「遺憾」和「抱歉」兩個字眼本身代表的差異在現實中活生生的呈現為雙方對於協議金額多寡的距離。事實上在 B、F 主持的「機構被告案」中，這個議題就硬生生地在最後階段爆發，詳如後述。

(二) 對話結果

整體看來，在本文訪問之修復促進者所處理的代表性案例中，最後成功達成協議者只有 B 處理的「眉開眼笑案」、C 處理的「同居傷害案」和「有備而來案」，其他案件最後都在未曾達成協議的狀況下破局結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訪的修復促進者心中，修復式司法有效與否並不單純以是否成功達成協議評斷，而需視其是否達成某些修復式司法目標而定。

1. 協議之法律效力問題

在這些於對話中達成協議的案件裡，並非協議甫達成即皆大歡喜，因為在協議簽訂之外或許更重要的是協議之履行。大多數受訪之修復促進者都提到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B 便指出達成協議的當事人會希望此協議具有法律上的效果，但在修復式司法中這種協議只是屬於民間的契約書，如果有一方不履行，另一方還是必須回到法院的程序來提告，C 則提出了一個實務上的變通措施，亦即當雙方達成協議後將此一和解案件以調解的方式作成具法律效力的調解筆錄：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有一個那個怎麼講，有一個措施就是把我們和解的案件喔再拿到調解，拿到調解的那邊去，反正他們都一家的，檢察署跟

地院嘛，就拿到那邊去成一個案。(C-062)

2.加害人履行協議與否之問題

即使成功達成協議且此一協議亦具備法律效力，也不能保證當事人必定會履行協議，在上述三個案例中，只有「有備而來案」的協議在當天即履行：加害人以借來的錢賠償被害人，而加害人為被害人努力爭取的保險費也在當天匯入正式結案；「眉開眼笑案」中加害人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賠償被害人，因此履行狀況仍有待後續追蹤；在「同居傷害案」中，則出現了加害人未履行協議的情況。在「同居傷害案」中，被害人不願再與加害人有所糾葛，而這也成為協議內容之一，但是在達成協議之後，加害人卻又故態復萌。C 在受訪中表示，她與「同居傷害案」中的加害人單獨會談的時候，便隱隱約約覺得加害人是想藉由修復式司法和對方見面，而於加、被害人對談時加害人對於能與被害人見面顯得很高興，被害人提出的條件也照單全收。

本文認為，加害人會違反約定其實有跡可循，因為加害人不過是把修復式司法視為與被害人見面的工具而已，而非想追求什麼修復式司法亟欲達成的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應讓加害人進入對話其實值得商榷，以 C 自己的評估標準「加害人是否願意道歉」而言，此時加害人的道歉意願應該打上問號，因為那不見得是出自真心誠意。

3.未能達成協議之案件亦可能有達成修復式效果

(1)促進當事人互相了解

加、被害人最終未能達成協議的案件，在受訪的修復促進者心中亦未必全然沒有修復效果可言：對 A 來說，雖然在加、被害人第一次對話時由於加害人不願賠償致使造成被害人二次傷害之後，他便不願再促成第二次的對話，但此次對話仍舊達到了「促進當事人互相了解」此一對話目的：

這才是修復的重點，就是說你誤以為的我說給你聽，你接不接受在你，但是我告訴你，就這樣。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因為很多的誤會來自於你都不講，等到看到檢察官起訴判決書：哇，真的！不然就是到了法庭上死不認罪，大家更氣，對不對？(A1-036)

A 在詢問與加、被害人共同居住的親屬之後，亦得知雖然此次對話並未達成協議，但是實際上回到居所後，加、被害人卻都能遵照協議之一「互不干涉對方家庭」辦理，因此認為就互相了解的功能而言對話還是有其效果。

(2)促進當事人情感修復？非透過加、被害人交流則不足稱之

B 和 A 同樣認為對話時不應將焦點置於事件本身，然而由於她較強調加、被害人情感面的修復，因此在其所處理而未能達成協議的「拂袖而去案」中，她認為就被害人而言，B 認為經由對話前、後修復促進者與被害人數度的對談，被害人的態度已經有所軟化：

他最後只是很簡單的、很簡單的只要一個誠意，那這個誠意是多少，甚至於你就是買一個水果或怎麼樣的情形，他都可以接受。(B2-010)

儘管如此，面對被害人態度的軟化，加害人這方仍然堅持認為，只要自己稍微表示心意，就代表自己有認錯的意思，而這是他無法接受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修復促進者也只好結案。然而對本文而言，被害人的情況正好可以做為一個反思修復式司法的機會：被害人單方面立場的軟化是否代表他的情感已然修復？是否被害人的這種狀態，才是 D 口中被害人轉換觀點而適於進入修復式司法的契機？

對照於 C 的觀點和做法可以發現，同樣是車禍案件，但 C 在「有備而來案」中是穿梭於加、被害者之間轉達彼此家境和心意，藉此化消雙方(尤其是被害人對加害人的)敵意；然而在「拂袖而去案」中，很明顯加害人這邊沒有釋出什麼善意，也沒有絲毫認錯、道歉的表示，可以說雖然看似同樣是情感的復原(以 B 的用語是被害人不再那麼「銳利」)，但「拂袖而去案」中被害人情感修復是來自於修復促進者 B 與其之交流、溝通，而與加害人無涉；「有備而來案」中雙方當事人情感之復原則是藉由修復促進者 C 做為中介，居中交流彼此意見與狀況，這也呼應了 C 為何沒有把「情感修復」視為對話階段應達成之目的：因為這在對話前的個別會談階段修復式司法就可以達成。本文認為，在「拂袖而去案」中，單方面的情感修復對一方當事人或許有其意義，但由於欠缺另一方的共同參與，因此不足以作為達成修復式司法目的之基石。

同樣的標準放在 B 和 F 共同處理的「機構傷害案」中，即使認為被害者家屬在促進者面前痛哭失聲是出自真心，也無法據以認為這就是修復式司法欲達到的目標之一「情感修復」，因為這種情感宣洩跟當事人另一方絲毫無涉，進入對話階段後此一標準應該更為明確：當雙方開始爭執責任、甚至像「機構傷害案」中場面火爆到幾乎大打出手時，則要將一方當事人對修復促進者單方面的情感宣洩視為修復式司法目標「情感復原」便顯得更加勉強。

(3)情感已然修復但與協議能否達成毫無關聯

對 D 與 E 而言，由於「背信案」中沒什麼亟待修復的情感存在，加上雙方在對話時就責任歸屬部分又相持不下，因此最後未能達成協議而結案並不意外。值得注意的是，E 所處理之案件除了背信案外俱為車禍案件，對於此等過失案件，他認為縱使存在尚待修復的情感，當加、被害人對話剛開始的時候，被害人的情感就已經修復泰半，因為他只要從加害人的口中得知對方並非故意的就可以了，

回頭來看，這或許也是 E 認為雙方只要有意願即可進入對話的原因之一。E 進一步認為，在他所處理的車禍案件中，事實上情感的部分都已經解決了，雙方之所以未能達成協議的原因並非在於情感的部分，而是出於很實際的金錢賠償問題：

不舒服的情感是錢沒有賠到，是這樣的，你知道是錢沒有賠到位啊，對不對？或者是呃...你不給我就沒有誠意啊，對不對？誠意是錢嘛！

(E-064)

(4)情感修復與否和協議達成與否毫無關聯

如果說上述情況至少還存在有可能透過對話解決的情感，那麼 D 與 E 共同主持的「誰有責任案」則顯示了另一種可能性：當事人其實不在乎情感傷害的問題。於此一車禍案件中，被害人被撞到，陷入昏迷狀態，由其父親代為與加害人對話，E 接受訪談時指出，就他對於事件的認知，過失責任其實是落在昏迷中的被害人身上，是因為她違規才導致事件的發生，而加害人雖然也不認為自己要承擔大部份責任，但認為造成傷亡就是不對而願意道歉，並且願意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負起賠償責任，只是不為被害者家屬所接受。E 認為在此一案件的對話階段中，被害者家屬願意原諒與否其實跟情感上的傷害無關，他並不在乎加害人的態度，而是在意能不能獲得賠償。

4.對話結果徹底受到開案標準、評估標準之影響

循著 E 對於「誠意是錢」的感觸，或許我們對於 B、F 共同處理的「機構傷害案」會有更深的認識。在此案的對話階段中，加害方的機構相關人員都到了現場，而犯下過失的職員亦當面向被害者家屬表示歉意。據 F 指出，被害者家屬於對談過程中一再表示，只要對方展現出誠意，賠償對他而言只是次要的問題。然而就在對話結束之後、簽訂協議之前，被害者家屬卻出乎在場眾人意料地表示不願簽名！F 對此感到相當生氣，本文作者在訪問時也能感受到他的憤怒，問題是被害者家屬為何會做出這種舉動？

F 指出，對話結束之後加害方包了一個紅包表示誠意，被害者家屬也收下了，據 F 推測，他應是在看了紅包的確切數額之後才做下拒絕簽字的決定。以此結局看來，F 原本認為雙方都有誠意解決問題，但在被害者家屬改變心意之後，他轉而認為他「把大家當白痴在耍」。本文認為，簽訂協議與否本就是當事人的權利，即使旁人看起來他似乎出爾反爾，但接受他的決定才符合修復式司法要讓當事人自行決定切身相關的問題解決方案之宗旨，因此本文認為 F 對當事人的評論可能有失公允，顯而易見的事實是，F 對被害者家屬意向的判斷是有誤差的，這個偏差追本溯源，還是要回到 F 對前階段的評估標準「雙方是否仍具仇恨心理」及「雙方是否有誠意」來討論。

在對話走向的討論中，本文已然論及 F 的評估標準之一「雙方是否仍具仇恨心理」由於太過模糊、抽象以致於難以成為操作準則，由「機構傷害案」中雙方當事人在對話時的火爆場面也可作證這點；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另一個評估標準「雙方是否有誠意」上，從此案的最後結果可以發現，一直被 F 視為有誠意、也不斷聲稱只要對方表現誠意即可的被害人家屬，據 F 推測似乎在看到紅包金額時就改變心意，F 並據以轉而認為他「沒有誠意」。如此看來，F 在「是否真心誠意」此一標準的判斷上一如判斷「雙方是否具有仍有仇恨心理」之標準般再次有所閃失，也再次佐證了這兩個標準的抽象性、模糊性，而被害者家屬改變心意的原因在於賠償金額的這種推測也呼應了 E 所謂的「誠意是錢」。

「仇恨心理」和「誠意」難以成為具體操作的評估標準已如上述，我們可以說，拿掉這兩個評估標準，F 的評估標準事實上只剩下當事人意願，據此可以再度佐證本文前述對於 B、E 所下之推論：將對話之目標等同於修復式司法目標者，會認為願快進入對話越好，因而在評估標準部分僅觀當事人意願並不令人意外。

F 的評估標準之中未包含「釐清責任歸屬」此一標準也對本案造成了關鍵性的影響。如果真如 F 推測，被害者家屬是在看過賠償金額之後才斷然改變心意，那麼究竟加、被害者雙方的期待是出現了多大的落差？必須牢記在心的是，這起案件的被告方事實上是「機構」而非「個人」，即使本案中犯下過失的職員向被害者家屬道歉，但要付出賠償金額的仍是「機構」，事實上決定權是掌握於機構的負責人之手，而矛盾便產生於此，因為負責人認為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機構其實沒有過失，在這樣的認知下，那個紅包對加害方而言，代表的其實充其量是「慰問金」，而非如被害方所預想的「賠償」，如此一來雙方所預設的金額自然有一定的落差，「機構被告案」最後的結局，其實在開案階段和評估階段就已埋下伏筆。

(三) 討論

1. 修復促進者之理念與實踐和修復式正義三面向

(1) 受訪者認知之修復式司法目標符合修補面向及會面面向

Johnstone and Van Ness 將各個定義修復式正義的方式分為三個面向：會面面向、修補面向和轉化面向。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的六大宗旨主要集中於前兩個面向，並未訴諸於如轉化面向支持者所言「在社會中更徹底、全面的觀念翻轉」；受訪之修復促進者認知之修復式司法目標似乎集中於「修補面向」，因為修補面向強調的是填補受害者所受的傷害及損害的關係，故「當事人復原」、「關係修復」、「情感修復」、「促進了解」這四個目標應屬於修補面向，而「預防再犯」則比較像是加害人在走完修復式司法程序後，對其個人產生的轉化作用足以促使其降低再犯性的一種樂觀期待，而這在 E 的思考脈絡(透過修復式司法使加害者產生有用的羞恥感以降低再犯可能性)中也非常清楚；「會面面向」

看似未出現於受訪者的修復式司法目標中，但不代表「會面面向」在修復促進者心中是無足輕重，它的重要性其實便在於修復促進者心中對「加、被害人對話」份量的看重程度，與他們設定的對話目標有關，涉及此等對話目標與修復式司法目標之間落差的問題。

(2)未設定前提便將會面面向設定為達成修補面向之必然途徑有其危險

Zehr(1990)認為被害者傷害之修補必須透過會面程序，使其能於加害人面前表達情緒及對犯罪事件之想法，重新找到能自我掌控的感覺，重拾個人自主性(personal autonomy)；Burnside and Baker(1994)也指出加害者所受的傷害在於犯下罪行可能使其受社區孤立，而重新融入社區的關鍵在於和被害者會面，展現真誠悔悟和承擔彌補措施。這兩種取徑皆是認為在修復式正義的概念下所謂的「修補」必須透過「會面」。在受訪之修復促進者中，抱持此一想法者為B、E，他們認為越快進入對話越好，其實呼應了「會面」為「修補」必要條件的想法。問題是，在Zehr和Burnside、Baker的說法中，加、被害人彼此間的角色是很確定的，而且這個定位是在對話前就已經確立。但在B、E所處理的一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案件相關當事人的角色定位並不明確，原因在於責任歸屬並未釐清，在這樣的情況下貿然進入對話的結果，使得在對話中若要達到修補效果，勢必要先確定加、被害人的角色定位，但前階段開案標準的限制卻又使得這個目標要達成有其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說「會面」有助於達成「修補」是難以成立的。

(3)會面面向作為達成修補面向之手段須以特定要件作為前提

反過來說，如果在進入對話之前便能夠確立彼此的角色關係，便能夠在對話中專注於修補目標，而這恰恰也是C將評估標準設定為「加害人道歉」的優勢所在，在對話前的階段釐清了責任歸屬，確定加害人不會於對話中再行爭執責任之後，出於讓雙方更加瞭解彼此之需求，C才召開了她口中的「會前會」，讓加、被害人見面，此時對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為了達成修復式司法目標之手段。C的理念與實踐體現了在一定要件下，「會面」是有助於「修補」目標之達成。而從實踐中亦可以看出，A、D、F雖然各自設定了一些要件，但這些標準要嘛就是困於前階段非其所能掌控的因素所留下的缺失，要嘛就是形同虛設，導致本來在其心中「會面」並非必然之事，但基於現實之考量或限制，使會面在條件仍不充分的情況下便展開，致使對話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前階段未解決的待決事項，當這些事項其實正是決定「會面」與否的關鍵前提時，所謂的「修補」目標就根本不可能達成，甚至可能加劇傷害。

2.修復促進者之實踐與修復式對話六大型態之比較

(1)修復促進者之角色扮演積極程度決定對話走向之呈現型態

Raye and Roberts(2007)以「參與者」、「決策權」、「討論範圍」為指標將加、被害者調解之對話形式分為六種。由於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的對話並無政府官員或社區成員參與，而最終決定權亦從未操於修復促進者之手，因此「受促進之所有相關者對話」(facilitated all-party dialogue)和「指示性對話」(directed dialogue)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基本上在受訪之修復促進者處理之案件中，參與中除了修復促進者與加、被害人之外，有時亦加入當事人支持者之參與，基本上形式不脫「受促進之加、被害者對話」(facilitated victim-offender dialogue)和「受促進之加、被害者、支持者對話」(facilitated victim-offender-supporter dialogue)；而「間接對話」(indirect dialogue)是由促進者居間代為轉達雙方意思，將一方訊息傳達另一方的方式。

間接對話於試行方案中其實近似修復促進者在個別會談階段的工作，因為除了 A 之外，其他受訪者都必須在對話前便與當事人聯繫，並以和搭檔之修復促進者密切溝通之方式居中傳達雙方意見，在受訪者中，C 便在這個階段居間穿梭轉達雙方面對彼此的誠意與境況，她經由這個作法成功地使雙方的情感都得到某種程度的修復，於她認為非對話無足進一步達成修復式司法目標時才使雙方見面召開對話；「指示性對話」(guided dialogue)指的是促進者的角色較為積極主動但決策權仍在當事人身上的模式，在此模式中，修復促進者會向當事人拋出問題、評論、摘要及其觀察所得，與典型 VOM 的關鍵差異在於修復促進者的角色。

(2)修復促進者不見得能於案件操作過程中扮演其理想中之角色

除了 A 認為修復促進者在對話中應站在弱勢的一方(亦即被害者)為其發聲之外，其餘受訪者都認為修復促進者主持對話時應保持中立，維持客觀的立場，營造雙方對話的空間，盡量扮演傾聽者的角色，F 便表示：

做一個修復式司法者傾聽，當一個傾聽者很重要。傾聽者我要聽任何一方的講話，我們還是少講，照那個演練，其實我們沒有什麼話在講，都是全部在聽。(F-085)

以此看來，大部分修復促進者對於其角色的認知，比較貼近於典型 VOM「受促進之加、被害者對話」：促進者只有在出於必要時才幫助加、被害人與彼此對話。然而實踐上並不一定都能依此理想進行，首先，本文曾提及修復促進者多半指出案件屬於偵查階段的當事人往往是在並不瞭解修復式司法而自願程度可疑的狀況下進入修復式司法，其參與動機往往是達成賠償和避開繁瑣、冗長、令人望之生懼的正式刑事司法程序，在這樣的前提下可以想見的是，如果任由加、被害人完全依其所願進行對話，很難想像這樣的對話可以往修復促進者理想中的對話目標發展。針對這一點，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對策是發展一套腳本，腳本基本上規劃了一套對話模式，將加、被害者所扮演的角色、應承擔的責任都規定於

其中，並有一個制式的流程，E 認為依據腳本所產生的框架有助於修復式司法目標之追求：

我覺得應該要有框架，如果沒有框架的話會失焦，因為目的是在情感修復嘛，那情感在修復的時候、在讓他對方表達嘛，那表達他的感受嘛，我覺得表達感受比較重要。(E-084)

(3)對話走向是否逸出腳本之外決定修復促進者之角色扮演積極程度

由 Liebmann(2007)整理的常見加、被害人調解程序亦可發現，在加、被害人雙方對話的聯合會議(joint meeting)中，通常也有一套基本上的形式在跑，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中，這便呈現在所謂的「腳本」。腳本的存在使得修復促進者在對話中的角色比起純粹傾聽者的角色還要吃重，因為這時他必須將對話走向控制在腳本預設之中，問題是，若當事人在對話現場不願照表操課怎麼辦？D 在談及其主持的另一個車禍案件時表示，在第一次對話的時候，才於加害人開始談及其認知的事件始末時，作為被害人支持者的家長便出言打斷，並指責對方根本是在胡說八道，致使修復促進者不得不出言提醒雙方先聽完對方完整的陳述，但 D 認為此時加害人的情緒已經大受影響。此案問題仍是先前多次提到的責任歸屬問題，顯然被害者的家長認為加害者的陳述與其認知的責任歸屬有所出入。也許在 D 的這個案例中他可以制止雙方打斷對方的陳述時間，但如果出現對話走向逸出腳本之外且在修復促進者出面制止後仍舊難以挽回的情況呢？

在 B 與 F 共同主持的「機構傷害案」中，對話當時的場面一度火爆到雙方作勢要打起來，而就在雙方持續「討論」的過程中，F 於受訪時指出，B 向當事人說明，對話會議是要聽修復促進者主持，不是讓雙方當事人來此爭執不休，結果被害者家屬聽到之後便憤而離席；在 B 參與的另一案「拂袖而去案」中，本非主持的 B 在對話中直接指出其搭檔的缺失，她認為另一促進者(同時亦為該次對話之主持人)過度聚焦於事件本身並凸顯雙方立場、協議不同之處，因而試圖插手主持以求改變對話走向。她的努力並未獲得成效，最後加害人一方還是拂袖而去。在這兩個案件中，面對不符合其設定對話走向之情形，B 同樣都挺身而出，同樣重申其「情感、關係修復為先」的立場，對於對話走向的影響卻有天壤之別：在「機構傷害案」中直接觸怒當事人，在「拂袖而去案」中若真有照她的作法走則結果可能不致如此。誠然，諸如「殺人未遂案」中陪伴者喧賓奪主並為當事人預先擬好協議書的作法絕對是有違當事人自決原則的指引式作法，但以 B 主持的這兩個案子而言浮現的問題是，到底促進者的角色要積極到什麼程度？在「受促進之加、被害人對話」與「指引性對話」之間的份際該如何拿捏？什麼時候該介入加、被害人的對話走向？這可能都需要更多的案件累積與經驗學習才能夠妥善掌握。

五、小結

修復促進者因其專業和經歷的不同對修復式司法產生各自的理解，帶著其原初的理解進入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實踐場域，在實踐過程中反思修復式司法，得到新的理解後再繼續投入接下來的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過程。修復促進者並非從最前端即開始處理案件，案件的來源幾乎都是由檢察官轉介，這會造成當事人自主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度有限的問題，而他們參與修復式司法之原因也往往是為了達成賠償，而鮮少是基於真正瞭解或認同修復式司法的意義。

案件經由轉介之後，開案與否也並非操於修復促進者之手，這會導致修復促進者對開案標準的想法無法確切落實於實踐之上，致使其於真正開始接觸案件的評估階段馬上面臨一個問題：是否要讓未符合其理想但已開案之案件繼續在修復式司法流程中運作？在修復促進者的具體實踐中，答案多半是肯定的，因此問題在於他們如何處理前階段所未能處理而遺留下來的問題。

在開案階段漏未處理的議題之中，最重要者乃為責任歸屬是否釐清的議題，本來根據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規定，未能釐清責任議題者應被拒於修復式司法流程之外，但在實踐上則遠非如此，如此一來，修復促進者對於加、受害者是否適於進行對話的評估標準是否涵蓋責任議題的釐清便至關重要，然而只有少數修復促進者認為應先解決此一議題，而實踐上能貫徹此一原則者就更為稀少。修復促進者除了加害者應認錯、道歉此一評估標準之外，其餘評估標準除了當事人意願此一對修復式司法而言本就理所當然應該貫徹的標準之外，尚有些過於抽象、模糊而形同虛設的評估標準，致使評估標準此一階段的把關過度寬鬆。

評估標準會深深影響加、被害人對話走向，前面開案階段、評估階段所未能處理而遺留下來的問題都有可能在對話的任何時間點爆發，僅有少數案例能確實處理責任議題的現實也反映在鮮少達成協議的對話結果之上。在開案階段未能審慎篩選案件的遠因，也造成修復促進者認為在某些案件之中，情感的修復與否和協議是否能夠達成沒有任何關聯。各個代表性案例之責任議題於各階段的處理情形及最後結果，本文以圖 4-2-1 表示之(見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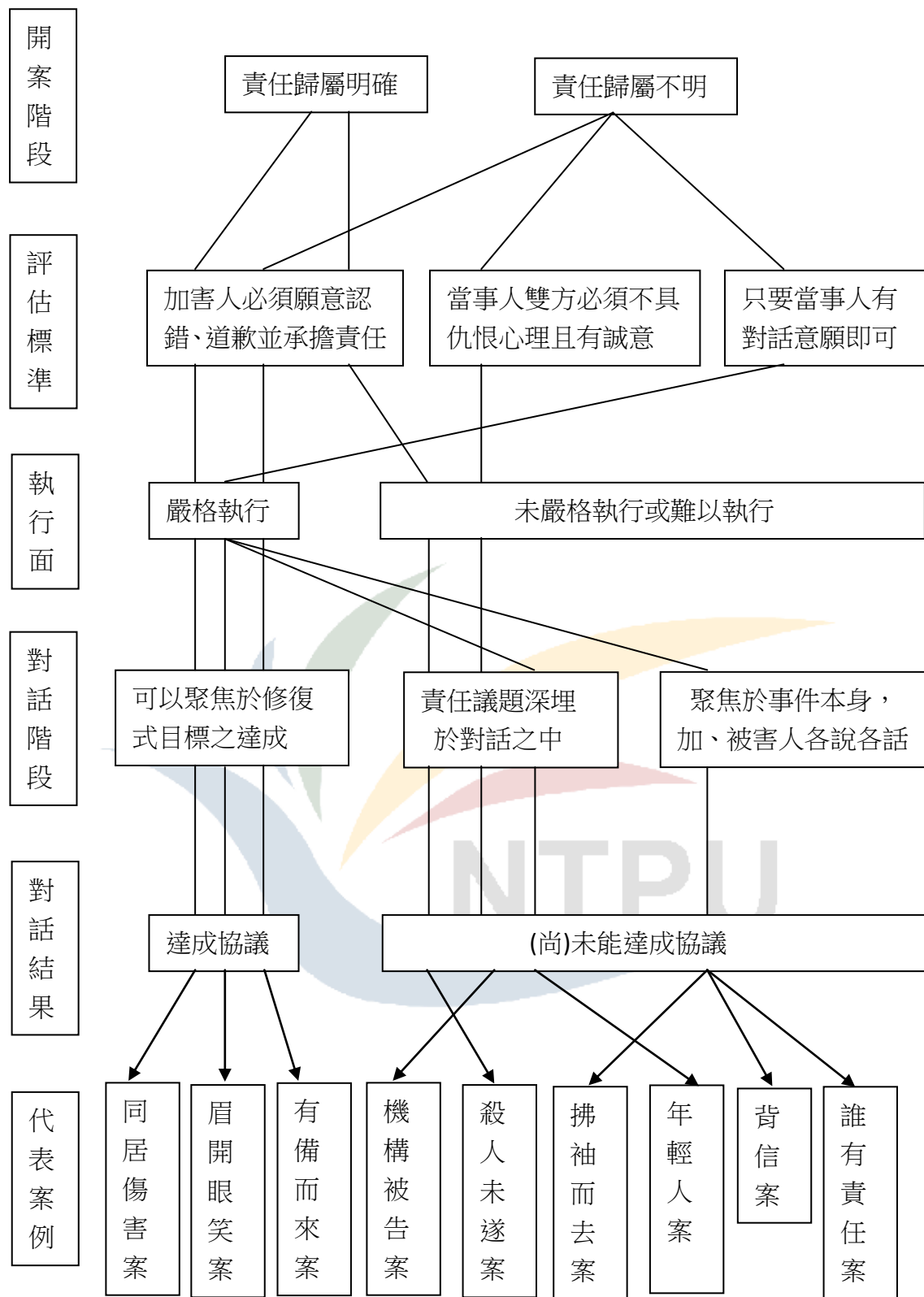


圖 4-2-1 各個代表性案例之責任議題於各階段處理情形及最後結果

第三節 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比較

受訪的修復促進者主持調解制度之背景如下：A、B、C 於受訪時皆身兼修復促進者與家事調解委員之職；D 則是曾於念博班時適逢家事調解要初步試行於台灣之時，因而躬逢其盛擔任家事調解委員一年左右；E 幾乎是同時開始擔任修復促進者與鄉鎮市調解委員；F 則是先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而後才擔任鄉鎮市調解委員。

一、修復促進者對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比較之認知

(一) 修復式司法與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制度之精神是否相通

1. 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精神有相似之處

多數受訪者認為不管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之目的、精神都與修復式司法有所不同，D 和 A 則認為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在某些層面上有其相似之處。D 雖認為鄉鎮市調解和修復式司法截然不同，但他指出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那個、那個現實不太一樣。家事調解會比較擺在說婚姻關係或親子關係、親情關係啦吼，這種家庭式的……它都有一個修復的、或者是找到一個未來怎麼樣去相處的一個模式，它都具備有這種功能。(D-067)

只是儘管認為兩者存在這種相似之處，D 仍然認為在家事調解程序中，修復關係並非其工作所要達成的目標，因為當事人雙方已經要分手了，他們的工作只是要確保雙方在分手後不要繼續糾纏不清，並且依舊能夠盡到彼此應盡的責任即可，D 用「理性分手，和平當父母」來概括家事調解之主軸。

這個主軸恰恰呼應了 A 提出在家事調解中當事人雙方是「合作關係」的概念：A 認為夫妻關係縱或解消，但當事人雙方身為父母的關係依舊存在，而且要繼續維持下去，這一切都是為了家事調解的最高宗旨，亦即「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儘管如此，A 也不認為在家事調解中有必要先修復雙方的關係，理由在於，案件會進入法院的家事調解程序，表示雙方當事人已經用盡各種方法，迫不得已才會走法院途徑，而在此之前，雙方的關係已經難以回復。A 的看法與其說在家事調解中沒有關係修復的「必要性」，倒不如關係修復的「可能性」不大，而非全然否定修復關係的重要性。A 認為修復式司法和家事調解、民事調解皆不相同，但是各吸取了一部份家事調解及民事調解的重點過來：

家事調解恐怕那個概念、精隨跟這個修復式司法當中的那個原諒啦蠻接近，但是不盡然相同；那民事調解的部分，因為它可能透過...我們常講民事的部分是透過金錢的補償嘛，我在金錢的部分補償我，所以這個部分又跟我們在修復式當中有關於金錢補償那一塊很類似，但是他的賠償不代表他原諒。(A2-001)

然而 A 認為修復式司法與家事調解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在家事調解中當事人雙方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未來仍要繼續合作，而在修復式司法中的加、被害人則沒有這層合作關係，除非加、被害人原就相識或甚至有親屬、親等關係，如果加、被害人有此等關係，修復式司法就等於是從家事調解中汲取「修補關係」的成分加上民事調解中「賠償」部分，而這也是 A 認為比較具有修復價值的狀況；如果修復式司法中的當事人互不相識，A 認為便比較傾向於只有民事調解中賠償的這一塊，相對而言較無修復價值。

2.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精神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B、C 則認為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完全不同，而鄉鎮市調解就更不用說了。C 指出修復式司法和家事調解的差距在於前者有顧及「人的情感」，修復促進者可以和當事人聊得很深入，但家事調解則不同，C 認為制度設計目的在於使事情不要跑到已然負擔沉重的法院去，家事調解委員並不在乎當事人間情感修復的問題，理由和 A 一樣，都認為雙方當事人會告上法院，便代表她們之間的關係已然難以修復，因此家事調解的重心是置於「小孩子的最佳利益」之上。

3.鄉鎮市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精神截然不同

兼具鄉鎮市調解經驗的 E 和 F 並未提及其對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異同之認知，而是專注於鄉鎮市調解與修復式司法異同的比較之上。E 認為鄉鎮市調解與修復式司法完全不同，因為前者設定的目標是解決紛爭，讓紛爭能夠在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解決，以減少法院的負擔，而非如修復式司法會談及情感的問題，對 E 而言，他認為修復式司法是針對情感，財產只是附帶；而鄉鎮市調解針對的是財產部分，情感如何與它無關，制度上也是朝這種方向設計；F 也抱持相似的看法，認為鄉鎮市調解的目標就是談錢，而修復式司法則不同：

修復式司法其實錢的賠償是在其次，只要達到雙方誠意、道歉，其實修復式司法就成功了。(F-068)

具有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主持經驗之修復促進者對於制度之間精神是否相通的看法如表 4-3-1：

表 4-3-1 修復促進者對於制度之間精神是否相通的看法

修復促進者	主持調解之經驗	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制度之比較	傳統鄉鎮市調解與修復式司法制度之比較
A	家事調解委員	相似但本質不同	在賠償部分相似
B	家事調解委員	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C	家事調解委員	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D	家事調解委員	相似但本質不同	截然不同
E	鄉鎮市調解委員	未表示意見	截然不同
F	鄉鎮市調解委員	未表示意見	截然不同

(二) 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修法配合之可能性

除了 D 沒有表示意見、A 持反對意見外，大多數修復促進者都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最好在進行家事調解或鄉鎮市調解程序進行前將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

1.沒有配合空間

當被問及調解和修復式司法兩制度是否可能以修法方式相互配合時，A 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沒有辦法，因為你除非在刑訴裡面加一個調解專章，那就不倫不類啊，因為刑訴、刑法是罪刑法定啊，既然是法定的嘛，只有量刑的空間，最低跟最高，你沒有調解的空間啊。(A2-023)

A 在受訪過程中似乎把鄉鎮市調解的範圍理解為僅限於民事調解，而不包含刑案調解在內，因此認為處理刑案的修復式司法和調解沒有相容空間。

2.有配合空間

(1)修復式司法程序可置於家事調解程序之前

B 也認為在家事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是重心所在，在這個考量下，她認為在家事調解過程中，若能改善父母或家庭、家族之間的關係，對於未成年子女的傷害才會減低，因而主張家事調解流程之前應先以修復式司法修復當事人間的關係；C 則認為，現行家事調解的制度設計，使得家事調解委員沒有與當事人私下深入溝通的空間，相較之下修復式司法則不同，修復促進者得以和加、被害人充分溝通，因此她認為應將修復式精神融入家事調解，修復程序前置自然是可行的方案之一，但她認為這可能會受限於現實上人力不足的問題。

本文認為，從 C 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她對於在家事調解程序中家事調解委員揮灑空間不足感到極為苦惱，她認為家事調解制度的設計本身就是在防止家事調委在實際進行調解之外的時間有所接觸，導致她常常產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反觀在修復式司法這個場域就完全不同了，C 在此的活躍程度與其於家事調解中大大不同，她在對話前和對話後都可以與當事人無所顧忌地溝通，甚至在其得意之作「有備而來案」中，她還可以一手包辦與加、被害人雙方的溝通、聯繫，這種如魚得水的感覺或許正是她主張家事調解應融入修復式司法精神的主因；對 B 而言，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的思考則來自於在家事調解實務中所看見的缺失，亦即在尚未修復雙方情感問題前即展開家事調解時，很多案子即使當下雙方達成了協議，最後還是會再回鍋：

我覺得這個都是回到問題的一個層面上面，那就是關係，還有情感，你都沒有去處理他們的這個東西，你就要他們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他們只是說應著，或者是被迫，這樣去處理、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他們事後又很懊悔，又很懊惱、後悔。(B2-056)

(2)修復式司法程序可置於鄉鎮市調解程序之前

兩位具有鄉鎮市調解經驗的修復促進者 E、F 都認同在進行鄉鎮市調解之前，應以修復式司法先行修復雙方關係。E 認為不管是哪種紛爭，在調解裡面最大的不舒服來自於對另一方的猜忌以及防衛心理，因此若能以修復式司法先降低雙方的敵對關係，對於問題的解決會更有幫助；F 也指出修復式司法的前置將有助於在調解過程中雙方協議之達成：

修復式司法，它經過前奏，經過雙方感情的聯繫或者是對談，一段時間的對談或者是情緒的發洩，他仇恨不會那麼深，搞不好就談補償的話，錢也不會那麼高，他也容易降，對方也會比較容易降，然後就誠心誠意來跟我們道歉，對方都已經誠心誠意跟我們道歉了就算了。(F-066)

二、修復促進者主持修復式司法之方式是否近似於傳統調解

由於修復促進者於正式接案之前的轉介、開案階段皆非由其負責，因此本文僅將此等前階段作為背景因素，於可能影響修復促進者之實踐時才提出來討論。以下要聚焦探討的部分在於，修復促進者接案之後便開始接觸雙方當事人，為可能展開的加、被害人對話做準備，並評估雙方進入對話的可能性，此一評估工作是修復式司法和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比較上顯著不同之處；評估雙方適於進行對話之後，修復促進者在對話之中所設定的目標是否和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有所不同？而這個差異又對其主持工作造成什麼影響？受訪者於實踐過程中是否都能如其理想般進行主持對話的過程？這些都是本文接下來要探討的地方：

(一) 實質評估標準欠缺之修復式司法工作模式近乎調解

無論是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制度設計使得鄉鎮市調解委員和家事調解委員接案的方式，都是到了調解當天才能夠看到要處理的案子，無論是文獻亦或受訪者皆指出，於調解當天他們會先到調解場所，那時候才能拿到案件相關卷宗，開始了解案情，而這就是他們「準備工作」之始，根據受訪者指出，準備時間大約在一到二個小時之間。

在鄉鎮市調解和家事調解程序中，對於案件的篩選或評估工作，是由調解秘書或行政團隊來執行，而與調解當天才需要到現場的調解委員無關。以此看來，在修復式司法中，從開案之後到對話之前的所謂「評估階段」，在鄉鎮市調解及家事調解程序中對調解委員來說是不存在的。

但是回過頭來我們要問，是否可能存在一種情況，使得修復促進者在主持修復式司法時，正如鄉鎮市調委和家事調委一樣跳過了「評估階段」呢？固然除了 A 之外，其他未與陪伴者合作的修復促進者，都在進行對話之前便必須和一方甚至雙方當事人接觸，此時的準備工作包含了再次向當事人解釋修復式司法、了解當事人所認知的案情、關心當事人的身心狀況以及其對修復式司法程序的期望、問題、疑惑、擔憂等等，這些準備工作都與鄉鎮市調解和家事調解制度中，調解委員的準備工作只限於調解期日當天開始有所不同。

然而由於除了 F 沒有明確表態之外，大部分修復促進者都認為修設置陪伴者在對話前的階段與雙方當事人接觸，因此可以說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在理想的分工方式中，這些事前準備工作並非由其負責，而是陪伴者的工作，修復促進者的工作應該限於主持對話會議。如果按照受訪者的理想看來，這些事前接觸的工作也非由其負責，那麼這跟所謂「調解秘書」或「行政團隊」負責的工作似乎沒有兩樣，修復促進者如果也是在進行對話當天才需要到場主持，那麼和鄉鎮市調解委員或家事調解委員的工作似乎也如出一轍。

然而事實上受訪者修復促進者實際上多半還是身兼陪伴者的工作，而就算依照其理想設置陪伴者來負責對話前的準備工作，修復促進者亦不認為自己的工作僅限於主持，而是希望陪伴者在了解當事人雙方狀況後能夠詳細回報，建立緊密的連絡關係，換言之，這與調解委員事前不接觸雙方當事人的情況仍有差異；而陪伴者的工作也與調解秘書或行政團隊的工作有所不同，最大的關鍵在於他們要實際且密切地接觸雙方當事人，而且要依其接觸、了解之狀況來評估當事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

也就是說，在雙方當事人面對面進行對話前的階段，修復式司法和鄉鎮市調解及家事調解最大的不同，便在於要通過一個「評估階段」。對於同時身具修復促進者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或家事調解委員經驗的受訪者而言，由於現實上除了 A

之外都必須身兼陪伴者之責，意即評估工作實際上亦由其執行，這一點更是判斷其於不同程序中的實踐方式是否有所不同的關鍵。據此，本文將受訪者依其評估標準及其實踐狀況綜合評估後分析如下：

1.理想中的評估標準純粹繫於當事人對話意願

B、E 的評估標準除了「當事人進行對話的意願」外別無其它，也因此他們認為若此一條件符合則越快進入對話越好，在沒有其它標準的情況下，準備工作便相對較少。本文認為，由於不能強迫當事人進入對話，因此加、被害人展開對話的前提本就以其對話意願為前提，而這在鄉鎮市調解、家事調解中亦然，不管是否為強制調解之案件，當事人還是有可能不出席，而不出席之結果頂多就是調解破局，案件移回原先的司法程序辦理。對話意願既為前提，那麼將評估標準設定為對話意願之評估會使得準備工作的部分除了促進者或陪伴者會與當事人接觸外，和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沒有太大不同。

2.理想中的評估標準不僅止於當事人對話意願

A、C、D、F 理想中的評估標準皆不僅止於當事人對話的意願，對 A、C、F 而言，加害人道歉而不爭執責任歸屬有其必要，F 則認為雙方必須有誠意及不再有仇恨心理始得進入對話。F 的評估標準過於抽象難以操作已如前述，在這樣的情況下，此一空泛的標準所造成的結果便是形同沒有標準，連帶使得 F 的情形與 B、E 相同，都導致在進入對話前的評估、準備階段和調解極為類似；A 所處理的「殺人未遂案」是由陪伴者進行評估，因此無從遂行其理想於實踐之上；C 則貫徹了這個理想，使得「同居傷害案」和「有備而來案」皆在加害者願意道歉的前提下進入對話；D 雖然亦以加害人道歉為進入對話之前提，但是在實踐上，一則由於非其所能控制的開案標準、一則因其認為「責任歸屬可在對話階段澄清」的看法似與以加害人道歉為對話前提的標準矛盾，致使其實踐未能依理想展開。

(二) 對話走向聚焦於爭執案件本身責任者近乎調解

由受訪者對鄉鎮市調解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出，在他們的認知之中，鄉鎮市調解之目的在於「解決問題」，而與當事人情感、關係的修復無涉；本文認為，依照受訪者們的看法，我們也可以將家事調解的目的視為「解決問題」，只不過這時候所謂的「問題」指的多半是孩子的問題，也就是 A 所說的「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而情感或關係的修復對 A、C 而言實質上已經難以做到，B 也認為家事調解根本無法達成這個目標，D 則主張關係修復的功能是希望雙方能夠繼續和平、理性地維持父、母親的關係，但仍非家事調解所必須達成的目標。除了 A 之外，其它受訪者都認為在修復式司法中情感或關係的修復是第一步，再來才能進行類似調解的實質賠償、協議部分，而且情感、關係修復前置的步驟有助於協議之達成。

1. 未能實踐受訪者理想之案例

整體而言，所有受訪者都認為無論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都與修復式司法有別，因此加、被害人對話時的重點也會有所不同，然而在修復促進者的實踐過程中，由於分工搭配、開案標準、評估標準等前階段懸而未決的問題，使得受訪者心中的理想不見得能夠確實在對話中實踐：

(1) 對話與合意

分工搭配方式造成的問題在 A 的案子中特別明顯：對 A 而言，在對話中設定的目標首先是對話，充分對話之後才有合意的問題。然而在「殺人未遂案」中第一次對話時，由於陪伴者突如其來地搶走主導權，拿出協議書要求加害者簽名，導致會議在加、被害人雙方尚未充分對話的情況下即跳到協議的步驟，他認為這完全是調解式的作法，是不該出現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的：

我們要促進的、這邊促進的部分是對話，這邊促進的部分是合意，我們在這邊絕對不會促進他們合意，如果你用調解的方式到這邊來操作修復式，就會促成他們合意，那不對啊！（A2-003）

對 B 來說，由其主持對話的「眉開眼笑案」謹遵其心中理想，在第一次對話時使得雙方修復情感，在第二次對話時達成協議；但在分工方式使其非為主持人的「拂袖而去案」中，她沒有辦法掌控會議的走向，因此當她的搭檔聚焦於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及雙方對協議內容的不同意見時，她便不能實踐使情感修復為優先的原則，致使對話形成雙方的爭執，由於捨棄情感前置的成分，因而使得修復式司法往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解決問題」之導向靠攏。

(2) 開案標準與評估標準出現問題所致

B 與 F 共同主持的「機構傷害案」中爭執情形更甚，如前所述，「當事人是否仍具仇恨心理」及「當事人是否有誠意」不是可供操作的具體評估標準，致使雙方的責任沒有徹底釐清；所謂的「道歉」來自於機構職員，但決定協議內容的卻是機構高階主管（這種落差來自於開案標準的階段），致使 F 認為在本案中修復式司法已經成功：

其實我們已經談成功了，他已經道歉，雙方面也見面，已經握手了，那個慰問金他也收了，我們都拍照了，只是說最後要寫那個協議書他不簽。（F-068）

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本文以為不然：F 的主張是認為雙方當事人的情感已然修復，而立論基礎在於道歉和慰問金二者，但如上所述，道歉的對象已經有

所疑問，且「慰問金」和「賠償」的不同並不單只是文字差異，而是代表雙方對於責任的認知有所落差，是過失責任有無的認定問題，表示雙方仍然沒有在對話過程中釐清爭執或有一方妥協，被害者家屬最後戲劇性的轉變，在這樣的脈絡下其實是當然之事。問題非但在於 F 所認定的評估標準難以操作，更在於其未列入的評估標準「責任釐清」至關重大。如果否定了雙方的情感真有收到修復的效果，而原因在於過程中過多應解決而未解決的事項，則這樣的過程還是比較偏向調解而非修復式司法。

背信案對 D、E 而言皆為開案標準不合其意之案件，對話過程中雙方對責任歸屬也是各說各話，沒有情感修復的空間與可能性也是份屬必然，使得本案實踐亦偏向調解；在「誰有責任案」中，責任歸屬問題未如 D 之預想在過程中釐清，E 甚至認為若真要追究起來過失責任會在被害人一方，雖然加害人願意承擔責任，但被害者家屬仍對賠償金與分期付款的方式有所不滿，E 認為情感的部分在了解對方並非故意時就解決了，剩下的只有錢的問題，以此而言等於對話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協調金額，也很難稱得上屬於其對修復式司法之理想。

2. 徹底實踐受訪者理想之案例

(1) 分工搭配未造成問題

B、D、E 在車禍案件上之處理情形並不代表此類案件一定會演變成調解式的作法，事實上在 B 處理「眉開眼笑案」時，她所參與的對話會議便能做到以情感修復為先、賠償協議在後，之所以能遂其理想的關鍵因素在於 B 在對話中是居於主持人地位，而非單純從旁記錄的角色，因此能將對話走向導向正軌；在 C 這方面，於「有備而來案」中她形同一力承擔加、被害者雙方的陪伴及評估工作，沒有分工可言的情況使其雖需負擔額外的的工作，但無須面對促進者間理念不同可能造成的問題；在「同居傷害案」中分工問題亦未對 C 造成影響。

(2) 開案階段遺留的責任歸屬問題在評估階段或對話階段時解決

「眉開眼笑案」是一個車禍案件，有可能存在責任釐清的問題，但這對 B 在評估當事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判斷無足輕重，因為重點在於當事人對話的意願，進入對話後，加害人承擔了過失責任而不爭執，使得責任釐清的議題在此案中失去重要性；另一方面，觀察 C 處理「有備而來案」的情況便可以發現，只要於修復促進者和當事人單獨會談的階段將責任歸屬釐清，說服並確定加害人在和被害人對話的過程中不再爭執責任問題，那麼修復促進者主持加、被害人對話時就可以專注在當事人情感或關係的修復之上，於確定雙方情感修復後再談論賠償的問題，便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符合修復促進者心中的理想。

(三) 討論

儘管在實踐上不見得如此呈現，但所有受訪之修復促進者都認為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目標有別於修復式司法，這種立場和郭元宏(2005)及夏化祥(2006)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其研究中可以發現，賠償金額之協商才是鄉鎮市調解的首要目標，儘管過程中或可達到諸如「關係修復」、「責任承擔」等具修復式正義色彩的目標，但這些只是在以達成賠償為首要目標前提下的附帶效果而已，以「責任承擔」為例，此二研究皆指出，國內調解實務不重視事實之釐清，而這在當事人不爭執責任的時候或許不重要，但在當事人仍存爭議時，調解委員也並未視事實審究為重要議題，遑論責任承擔。觀諸鄉鎮市調解之目的本即為「疏減訟源」，實務呈現如此面貌應該並不意外，甚至該說這本就是為達此一目的之必然，制度設計方式也在說明此一方向，因此這兩個研究所發現者乃係鄉鎮市調解此一制度的「哪些層面」帶有修復式正義的內涵，但這些層面絕非代表鄉鎮市調解制度追求的首要目標；然而在黃政達(2006)的研究中，調解委員會成員之訪問則顯示「關係的和緩或修復」也是我國調解制度的基本理念，而訪談當事人之結果也發現加、被害人對話有助於當事人間關係的修復。本文認為，「關係修復」是否為鄉鎮市調解之目標見仁見智，但這對本文研究目的而言卻是個關鍵的切入點。

1.修復促進者認為修復式司法應將重點置於修復「熟識者」間的關係

對 B、C、E、F 而言，關係修復是修復式司法追求之目標，但全都認為加、被害人之間如果為親屬或朋友關係，而且以後仍要繼續來往的情況才是修復式司法應著力之所在，而這也是未將關係修復視為修復式司法目標的 A、D 之想法。也就是說，對所有受訪者而言，彼此陌生或未來不會繼續相處的加、被害者並非他們理想中修復式司法應處理的案件當事人，但這卻是他們所處理案件之實況。除了本文所討論的開案標準、評估標準等問題，在最前端的理念面上，修復促進者便面臨了理念與現實不一致的困境，由此展開整個修復式司法程序，並面臨後面的種種問題。

再回顧李浩然(2007)對鄉鎮市調解委員以婚姻暴力調解策略所進行之調解程序之研究可以發現，此研究中受訪者將婚姻調解視為不同於一般調解之存在，而原因就在於雙方當事人本非陌生而且有情感基礎，因此受訪者咸認「修補關係」為與「預防再犯」同等重要之目標，而為了此一目標，受訪者亦會分別先與當事人進行單獨會談，但事實上這並非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中常見的作法，卻令人聯想到修復式司法中評估階段的單獨會談，從這份研究中受訪者對此階段的工作是「當事人是否有維繫婚姻關係及參與調解之意願」亦可印證此一關聯。李浩然(2007)之研究訪問之對象正可與本研究的受訪者作一呼應，只不過後者礙於現實問題必須處理關係陌生之當事人。前面本文討論的是，這種無法符合理想的現實問題對於修復促進者的實踐造成了什麼影響，然而回過頭來本文想問的是，為什麼在關係修復這個議題上，當事人彼此之間是否熟識或未來是否要繼續往來這個問題這麼重要？對於修復促進者而言，關係修復的「關係」二字意謂著什麼？

2. 受訪之修復促進者心中的「關係修復」摻雜了東方儒家文化色彩

Huang(2011)的研究訪問的是以修復式司法處理家暴案件的修復促進者，李浩然(2007)則針對在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中處理婚姻暴力案件調解之調解委員，兩者的研究結果顯示「修補關係」皆為兩研究中受訪者設定的首要目標。但仔細審視其內容卻可以發現，雖然目標同為「修補關係」，但前者的修補主體單位是「家庭」，因此造成某些修復式正義原則大打折扣；在後者則是以「個人」為修補的主體單位，是故比較能體現修復式正義的原則，也令人意外地看見在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序中，竟會出現類似修復式司法的前階段單獨會談準備程序。本文所訪問之修復促進者心中所謂的「修復關係」，比較偏向於以個體為單位還是以家庭為核心？若以 Huang(2011)研究的脈絡來看，這個問題其實正是在問：修復促進者所持的理念是純粹移植西方概念，亦或摻雜了東方式的色彩？

當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在加、被害者雙方彼此認識、以後仍要繼續來往的情況下修復式司法較具意義的時候，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東方人際關係網絡的初步印象，因此我們甚至可以看到 A 認為在修復式司法中若加、被害人雙方沒有親屬、親等的關係，就會偏向單純是民事調解的這一塊，在這種情況下，修復式司法程序結束後雙方就會回到正式司法程序，不會再繼續「合作」，在這樣的思考下，「關係修復」在其對修復式司法的思考中自然沒有容身之地。

另一方面，A 對於家事調解的理解似乎也能進一步佐證上述看法，對他來說，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不同之處，在於當事人雙方彼此認識且有情感基礎，而且在此程序結束之後仍必須繼續來往，有「合作」的必要，如此一來程序目標看似有「關係修復」的需求，但他卻認為情感和關係的修復在家事調解中是不必要的：

其實會走到法院來，就是表示他們已經用盡各種方法，你如果在外面有方法你不需要到法院，到法院來基本上大概心就是涼一半了，那你要修補它什麼？(A2-010)

這顯示 A 對於「修復關係」四字的認知其實是以「家庭」為單位，認為既然工作目標不在於使欲分開的雙方繼續維持婚姻關係，就無所謂「關係修復」可言，是以家庭為本位的思考，摻雜了東方儒家文化的色彩。問題是，修復式正義概念的出現，其實並不以當事人雙方本就認識甚至有親屬關係為前提，或謂其在此等條件之案件特別有功效，但這也只是運用範圍和結果評估的問題，不至於回頭影響修復式正義之定義，因此在西方以個人主義為基底的修復式正義概念中，所謂的關係修復並未限定當事人間熟識與否或往後是否仍要繼續往來等條件。A 對於關係修復理解之歧異與其說是誤解，倒不如以文化脈絡來理解更為恰當。

相較於 A 未將修復關係列為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之目標，C 則認為修復關係是修復式司法追求之目標，但不是家事調解制度所欲，其理由和 A 如出一

轍，亦認為家事調解根本不管當事人要不要離婚，只在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據以認為家事調解並不在乎當事人間關係修復與否。C 同樣將關係修復與婚姻關係之維繫劃上等號，而不將當事人間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合作關係的建立」視為關係修復，這種取徑和 A 相同，都受到東方儒家文化的影響，而將關係修復以家庭化的方式來思考。

3.文化脈絡的不同不盡然代表修復式正義原則必然會受折衷、犧牲：以 C 為例

上述討論呼應了陸振芳(2008)認為由於華人人際衝突處理不同於西方的觀點，因此與修復式司法在西方的理解有所出入，該研究亦指出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模式多屬於華人社會中對於陌生人的「工具性情感關係」，以物質性賠償的金錢調解模式為主，此時當事人間的關係才符合西方式修復式正義強調的雙方當事人平等概念，反過來說，若當事人間非為陌生，華人社會對修復式正義的理解及據以產生的實踐是否還能符合當事人平等的概念就會有變數產生。然而從 C 的實踐我們亦可看出，即便對於關係修復的思考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並不見得會如 Huang(2011)的研究對象一般對其它修復式正義目標妥協，誠然 C 處理的案例不見得都是當事人彼此熟識的情況，但她斬釘截鐵地指出「加害人的道歉」是修復式司法乃至於加、被害人對話的絕對前提，因而能在實踐上避開東、西方文化脈絡不同可能造成的問題，進而確實修復雙方的關係，達成修復式司法的目標，證明只要把握關鍵原則並落實於實踐中，國情不同的問題並非不能克服。

三、小結

大多數修復促進者都認為無論是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或家事調解制度都和修復式司法精神相異，少數認為家事調解和修復式司法制度間有某些相似之處的修復促進者，亦主張它們在本質上仍然不同。具有家事調解主持經驗的修復促進者幾乎全都認為，將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於家事調解程序將有助於改善父母或家庭、家族之間的關係，對於家事調解制度之首要顧念「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會更有幫助；而具有鄉鎮市調解主持經驗的修復促進者也全都認為，將修復式司法前置於鄉鎮市調解以降低雙方敵對關係會更有助於問題之解決。

儘管認為傳統鄉鎮市調解和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精神有異，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司法中遭遇的種種難題卻使得其實踐案例可能偏往調解導向。鄉鎮市調解制度和家事調解制度中，調解委員都是在調解當天才第一次見到當事人，事前不存在似修復式司法之評估階段，反過來說，如果評估一無標準，則修復式司法與調解程序的準備工作便幾無分別，因此，以當事人意願為評估標準者在實務操作上便與傳統調解無甚分別，因為不管是傳統調解或修復式司法本就以當事人自願作為前提，以「當事人意願」作為評估標準便等於沒有標準；另外，過於抽象、模糊的標準由於難以掌控因此也形同沒有標準，實踐上亦偏往傳統調解式作法。

加、被害人進行對話時，若對話走向是聚焦於案件本身則作法亦偏向傳統式調解，而之所以會產生此一問題，原因在於對話前的開案階段、評估階段未曾釐清案件責任歸屬及確立加、被害人，導致對話時無可避免地可能觸及此一尚未解決的問題；另外，若對話中主導程序之操作者並未真正瞭解修復式司法的目標所在，也可能一味操作合意，致使修復式司法程序變得與傳統調解作法無異。

對於修復促進者而言，出於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他們將修復式司法目標之一的「關係修復」理解為「家庭關係的修復」，此一取徑和西方式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有使修復式司法之實踐偏往傳統調解式作法之虞，由修復促進者處理之實例看來，這個顧慮固然有其文化脈絡上的可能性，卻非必然如此，只要修復促進者能堅持在對話之前便貫徹加害者必須認錯、道歉、承擔責任的標準，那麼其它修復式司法原則並不必然會被犧牲。



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不同制度均有當事人對話的過程，但制度目標之不同形塑出歧異的操作方式

鄉鎮市調解制度、家事調解制度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主要模式 VOM 共通點為以當事人雙方為核心，在中立第三人的協助下自行協調出解決方案，然而各制度對居間第三者之 資格要求、參與程序之當事人及其定位、居間第三人準備工作多寡卻各自不同，本文認為這些歧異皆源自於制度目標之不同。

傳統鄉鎮市調解制度強調紓減訟源、解決問題、達成賠償，因此以地方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作為居間之第三人當能最有效而迅速地達到目標，參與程序之當事人若能將所有利害相關人皆納入其中，始能收到一次解決問題之效果，而由於關係、情感的修復需時較長，因此與迅速解決問題的制度目標背道而馳，在程序設計上便無由顧及此一方面，調解委員於調解期日前不與雙方當事人單獨會面，無須經過評估是否進行對話此一階段；家事調解制度中，家事調解委員也是在調解期日當天才初次見到當事人雙方，但由於其制度目標在於透過家事調解制度處理性質特殊的家事案件，針對此一特殊性，居間第三人之資格要求於是多了專業上之考量，希望以其專業來妥善處理當事人間之關係，以追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此一制度目標。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希望透過關係及情感之修復，達成加、被害人、社區三方傷害之復原，其所欲達成的制度目標相當多元，據此，對居間的修復促進者專業上的要求是必然之事，否則亦須具有幫助加、被害者的經驗；以加害人認錯、道歉、承擔責任為開案前提的制度設計，也使得在對話之前便明確定位雙方當事人加、被害人之角色勢不可免；若要達成情感和關係的修復，於加、被害人對話前消除有危於修復式司法目標的可能因素也是必經之路，這便有賴於修復促進者於對話前的評估階段，以盡可能完善的準備工作來達成。

二、修復促進者認為修復式司法異於傳統調解制度但實踐上仍帶有調解的影子

儘管所有受訪者都認為修復式司法和傳統鄉鎮式調解及家事調解本質上有所不同，然而在實踐上他們卻往往無法將理念完全落實。他們心中對於何種案件適合以修復式司法處理各有看法，但不管各自看法為何，開案與否終究不是他們所能決定，也因此接到不符合其理想之案件係屬司空見慣之事，此時他們面臨到的問題是繼續處理此案亦或以不符理想為由結案，現實中他們多半選擇前者，也因此必須被迫處理自源頭即產生的問題。

三、受訪者理想與實踐之差距主要出於所受之訓練有限、評估階段欠缺實質標準以及準備工作不足

修復式司法對於幾乎所有受訪者而言都是新穎的觀念，在接受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次數僅有幾次的情況下，他們以其自身專業及經歷來理解修復式司法也不足為奇，這樣的理解無形中會導至其實踐與修復式司法原初理念甚至其自身理念有所不同，有時將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開案階段並非修復促進者所能控制，致使他們必須在評估階段面對從開案階段流入的問題，此時促進者評估加、被害人雙方是否適合對話的標準便至關重要，評估標準越實際、嚴謹表示此一階段的準備工作將越加完善，而過於模糊、抽象或僅取決於當事人意願的評估標準，則將使問題遺留至後一階段的加、被害人對話，修復促進者在此一階段再無迴避問題的空間，後果便是無法全然將其理想貫徹於實踐之中。

四、修復調解化的主因為未釐清或礙於現實難以釐清案件責任歸屬

修復促進者雖認為修復式司法應有別於傳統之調解，然而於其實踐中卻往往出現修復調解化的傾向，這種情形的主因在於，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雖規定以加害人願意認錯、道歉並承擔責任為開案前提，但實務上卻多半沒有遵循此一原則，甚至有些案件在本質上便難以確定加、被害者，或當事人之一方為機構致使道歉的主客體存疑，致使先天存在的問題到了後階段亦難以挽回；案件由修復促進者接手處理後，如果沒有將責任議題的先行澄清設定為評估加、被害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標準，則這個問題勢必可能成為加、被害人進行對話時的焦點，使雙方聚焦於案件本身，產生修復調解化的傾向。

五、受訪者以傳統儒家文化來理解「關係修復」之意義

在理念面上，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無論傳統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制度都與修復式司法不同，而若能在鄉鎮市調解或家事調解程序之前以修復式司法修復雙方的關係，對於問題的解決會更有幫助，對家事調解委員而言，此時的「問題」即專指「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要修復的並非「夫妻」之間的關係，而是修復「父母」之間的關係，家事調解案件中的雙方當事人未來不見得要一起生活，但得共同負起責任，因此與其說是「修復關係」，毋寧更像是「維持關係」，因為婚姻關係的維繫不在其設定的工作目標之中。這種理解實是以東方儒家文化的概念來理解「關係修復」，以「家庭」為單位主體。在這種思考脈絡下，當事人本身作為「個人」的權益有可能被犧牲，這也是來自於西方的修復式正義理念遠渡重洋到東方後可能產生的本土弊病，然而在本研究中，修復促進者的實踐也為這種橫向移植的限制找到可能出路，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少數成功的案例清楚地告訴我們，只要掌握住責任釐清、承擔的修復式原則，便有可能擺脫所謂「國情不同」產生的問題。

六、「人」的因素對於「制度」之成敗有重大影響

綜合結論二、三、四而言，實施計畫中對於責任釐清議題的規定雖無法自源頭及落實於實踐之上，但從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於後階段彌補源頭錯誤的範例，例如秉持加害人願意認錯、道歉、承擔責任始得進行加、被害人對話原則之修復促進者，以及雖未將此原則設定為評估標準，但能夠主導加、被害人對話之修復促進者，都能夠將對話之走向帶往修復式目標(關係、情感修復)之達成，顯示立意良善的制度雖然可能因人的因素而受到扭曲，但也不是沒有事後挽回的可能，修復促進者的觀念以及貫徹觀念的決心可能左右實踐的成敗。

七、將修復式司法理念導入調解制度有其可能性與必要性

在修復式司法中可能產生修復調解化的情形，反過來說，有沒有可能直接在調解制度中注入修復式司法的理念呢？依照李浩然(2007)的研究看來，如果鄉鎮市調解委員對於其處理之案件以修復式司法的觀念來看待，認為問題之解決有賴於情感或關係的先行修復，那麼即使是在鄉鎮市調解制度中，也有實踐修復式司法的空間與可能，甚至可能因而改變傳統上的程序，直接將修復式司法中單獨會談的概念應用在鄉鎮市調解之上。如果在鄉鎮市調解制度中都存在此一可能性，那麼處理具特殊性質之家事案件的家事調解制度自然更不例外。

從修復促進者之認知與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案件的具體情況是決定問題的解決是否需要情感、關係先行修復的重要關鍵，以車禍案件的討論看來，如果情感、關係的修復與否和協議之達成毫無關聯，即使達到情感和關係的修復，也無助於現實上金錢賠償的協議時，那麼以修復式司法程序先行便顯得多此一舉；但若在車禍案件中責任歸屬明確或被認定為加害人的一方願意承擔責任時，則情感和關係修復先行將有助於協議之達成，從修復促進者的實踐看來，這種方式甚至可能讓協議金額顯著下降，達成使財力困窘之加害人有能力負擔賠償、而被害人亦能得到情感修復的雙贏局面；對家事調解制度而言，或許導入修復式司法之理念及程序更有其必要性，因為就某些修復促進者看來，如果家事調解制度由於其核心關注為「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而疏於妥善處理父母之間的關係，那麼當時所討論出來的解決方案並不會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是會再回到家事調解程序之中，由此看來，家事事件似乎有以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的必要。

總結而言，三種制度雖然目標和其衍生的程序、操作人員皆有差異，但難以據以斷定它們之間就是如此截然不同，即使是同一種案類，具體個案情形的不同也將決定情感修復之於問題解決是否有所幫助，難以一概而論，在創設新的制度之外其實存在另一條路，亦即找出適當的條件，使得新制度的精神能夠融入既有制度之中，兼取二者之長，這種安排也可能更具效率與實益。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對修復式司法方案的建議

(一) 層層把關、嚴格執行各階段審核標準

對修復促進者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以並不熟悉的理念來操作陌生的程序，因此在其實踐過程中處處充滿著不確定感。他們難以避免地以固有的概念來理解修復式司法，胸有成竹的人將其專業領域的思考、操作方式注入修復式司法，而戒慎恐懼的人則小心翼翼地遵循他們從有限的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所得到的新知；帶著對於修復式司法的初步理解，他們也許過快地面臨實地操練的挑戰，而所接收的案子也不見得符合修復促進者心中的開案標準；他們都希望有陪伴者能負擔陪伴當事人與評估加、被害人是否適合進行對話的工作，但除了 A 之外其他人都未能如願；所有受訪者都面臨與其搭檔者默契配合之問題，在彼此理念不同的情況下這個歧異更顯重要；各自對於評估標準理念的不同，使其在搭檔時若未釐清這個環節便會出現問題；開案階段的寬鬆把關致使問題產生，並影響後一階段的評估工作；評估階段懸而未決的責任歸屬議題又會強烈影響加、被害人對話走向；對話走向又直接關聯雙方能否達成協議；達成協議也不代表皆大歡喜，因為還有協議履行之階段仍待追蹤。

對於未來可能繼續擴大實施的修復式司法計劃，本文建議從源頭開始就做好層層把關，首先是教育訓練的部分，要注意欲成為修復促進者之人的專業背景和經歷會不會出現與修復式司法之概念本質上有所扞格之處，要確定教育訓練的內容足以消除可能導致負面結果出現的落差；在開案的部分，沒有必要基於案源不多等理由而讓性質上不該進入修復式司法的案件開案；責任歸屬尚未釐清的案件未必絕對不能開案，但必須在修復促進者與雙方當事人單獨會面的階段便確定一方當事人願意承擔責任，甚至願意於加、被害人對話中認錯、道歉；加、被害人定位必須在對話進行前就確定，否則諸多修復式原則都難以開展，更遑論達成修復式目標；協議達成與否不應作為修復式司法成敗的論斷依據，判斷標準毋寧應是修復式原則在過程中是否確實遵守並實踐，並自案件源頭便妥善地層層把關，慎始方能善終。

(二) 家事調解制度與修復式司法可互相配合

大部分修復促進者認為修復式司法應用於當事人本為熟識、且往後仍要相處的案件上比較適合，而本文主張這個看法是因東方儒家文化以家庭為本位的思考使然，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之下，將修復式司法運用於本就欲針對家事事務當事人關係特殊性家事調解之中應該相當適合，實務上家事調解既屬法院之強制調解，則在原程序上將初次調解代以與修復式司法式的單獨會談，將整個程序由準備程

序的單獨會談開始，將此一準備階段的目標專注於關係和情感的修復應屬可行。將修復式司法制度之精神直接透過教育訓練使得家事調解委員亦能了解修復式司法的目標、價值、工作方向，如此一來便可直接省去在兩制度、兩官方單位間案件轉換之麻煩。以修復式司法方式降低雙方敵意、緩解雙方關係之後，相信對於家事調解之首要目標「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應可找尋更妥善的解決之道。

(三) 鄉鎮市調解制度與修復式司法可互相配合

就修復促進者理想之開案標準看來，熟識與否雖為重要指標，但仍有其它因素可以左右案件值得修復或應該修復的程度，例如案件類型及其嚴重程度、加害人之犯行是出於故意或過失等等，換言之在特定要件下當事人非熟識之案件仍有修復之必要性與可能性，從而鄉鎮市調解和修復式司法自然也存在合作的空間，而這其中的關鍵便在於：何種案件需要以情感及關係的修復先行？本文認為這有待往後的研究累積更多的實例來探討。問題是，在確定某個案件應以修復程序前置後，要如何進程序間的切換？

由受訪之修復促進者處理之案例看來，有些案件事實上已經先經過鄉鎮市調解程序，調解不成之後案件回到檢察官手上，檢察官再將案件轉至修復式司法程序處理，換言之鄉鎮市調解和修復式司法間是以檢察官作為中介，而沒有直接傳遞案件的管道。本文建議往後研究可以探討檢察官或專案小組是以何種標準認定案件適合交給修復式司法程序，進而研擬妥適的判斷機制來判斷案件是否應以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處理，最後將此判斷工作委託一橫跨鄉鎮市調解及修復式司法程序的跨機關組織，直接處理案件應單純交付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或應先行委託修復式司法單位處理；如果在鄉鎮市調解過程中發現有修復之必要亦可由其判斷。

(四) 鄉鎮市調解委員、家事調解委員、修復促進者之聯合教育訓練

工作的要求、學經歷的重疊度、人員的重複性在在提示針對此三程序主持者的聯合教育訓練將有相當程度之效益，如果鄉鎮市調解委員或家事調解委員了解修復式司法之理念和工作方式，則若其負責之案件確有修復先行之必要時，他便具備自行察覺的敏感度及進行修復式司法所需之必要知能，從而甚至無須將案件在不同程序間交互轉換，進而降低司法程序的繁瑣程度，使其運作更有效率。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對於負責開案與否的主事者之研究

以責任歸屬議題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踐的脈絡看來，試行方案實施計畫認為必須加害人先有認錯、道歉、承擔責任之意始得開案，基本上符合修復式正義理論，以確立加、被害人之定位為根本原則。然而在現實中，這個原則卻沒有

被確實地遵循，雙方可能都與有過失的車禍案件層出不窮，當事人為機構的案例也並非單一，此時關鍵的問題便在於，負責評估何等案件可以開案的主事者或專案小組究竟抱持何等開案標準？是在何等因素的評估下，他們認為可以暫時忽略實施計畫對於責任議題的要求？這個議題是因不重要而被忽略，亦或他們認為這個議題可以在後端解決？他們對那些因責任議題而強烈影響後續對話走向案件的看法又是如何？這些問題都有賴探詢負責開案與否之主事者的想法而澄清。

（二）案件應由何種程序處理為佳的更細緻標準及其轉換管道之研究

本文的研究發現認為，在具體實踐上，一個案件應由調解制度亦或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處理的決定標準，並不在於案類、傷害嚴重程度等單一標準可以決定，而是應由各種標準做一綜合研判，粗淺而言，關鍵在於情感或關係的修復是否對於問題的解決確有幫助，如果有，則有必要以修復式司法程序前置，這種判斷需要更細緻的標準來加以操作，也需要有更具效率的轉換管道來處理。

（三）於現行制度中融入修復式司法精神可行性之研究

如同研究結論所示，如果創設一個新制度在現實上有其困難，那麼在現行制度中融入新制度之精神也是一個可能的選擇，如此一來就有必要研究現行制度在何等條件下具有與修復式司法之精神融會貫通的可能。

（四）VOM 以外修復式司法方案的可能性

這次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採用的主要模式是 VOM，所以本研究的發現或結論，事實上都是建立在 VOM 的基礎之上，無論是好是壞，都不可能據以推論至「修復式司法」在台灣實踐的可能性或妥適性。問題在於，當台灣對於修復式司法這個概念尚屬陌生的時候，VOM 是否為修復式司法眾多方案之中最適合台灣推動的方案？修復式司法所亟欲達到的眾多目標，是否皆以 VOM 為最佳解？答案恐怕不盡然如此。在 VOM 和其他方案之間究竟哪一種方案比較適合何等目標之達成，可能有賴後續研究做先行探索，以於進一步擴大應用修復式司法觀念在台灣社會的時候收事半功倍之效。

環環相扣、層層相連，一個小螺絲沒有栓好，整個結構便有可能崩毀，這就是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面臨的挑戰，修復促進者便像是挑戰者，在眼前的是包括前階段遺留的、自己無法決定之因素造成的重重問題，挑戰的對象包括了自己舊有的觀念，包括了加、受害者各自的想法，以及或許更難以撼動的、整個社會對於修復式正義的懷疑。本研究只能於後端點出問題所在，真正在前線執行此一艱鉅任務者，仍是這些屢敗屢戰、越挫越勇的修復促進者。試行方案也許只是一小步，也許走得歪歪扭扭，也許被撞得七暈八素，但終究是往前跨出了一步，本文期待這一步，最後真的能夠開啟修復式正義之路。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泰升，1999，《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

王泰升，2001，《台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元照。

王唯馨，2005，《家事調解員的調解策略與調解經驗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所碩士論文。

王惠美，2008，《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處理地方衝突之功能研究：以彰化縣鹿港鎮為例》，東海大學政治學所碩士論文。

李育儒，1997，《西方犯罪(刑事紛爭)處理程序之演變—以國家權力發展為中心的歷史論述》，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浩然，2007，《從修復式正義探討鄉鎮市調解委員之婚姻暴力調解策略》，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宜芬，2006，《我國修復式正義實踐途徑之研究--以緩起訴處分之酒醉駕車者為探討對象》，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志昌，2011，《強化調解功能用以解決家事紛爭之研究-以雲林地方法院為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端，2002，〈台灣的法律與社會〉，收錄於王振寰主編，《臺灣社會》，頁 345-382。台北：巨流。

林鈺雄，2006，《刑事訴訟法(上)》。台北：元照。

夏化祥，2006，《具修復式正義內涵之刑案調解研究》，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子瑩，2011，《家事調解當事人的滿意度研究》，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

許春金，2002，〈修復式正義的理論與實踐-參與式刑事司法〉，收錄於《甘添貴教授六秩祝壽論文集第四卷：刑事政策與刑事立法論》。台北：學林。

許春金，2010，《人本犯罪學》，修訂二版。台北：三民。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陳珈谷，2002，《論修復式司法》，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祖輝，2004，〈淺談社區司法的理念與實踐〉。《社區發展季刊》107：445-458。
- 陸振芳，2008，〈修復式正義理論在華人文化支可行性探討－以儒家人際特色為例〉，《警學叢刊》38(4)：127-145。
- 郭元宏，2005，《從修復式正義探討調解委員會刑案調解之效能－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淑芬，2008，《在我國建立家事調解委員證照制度暨相關評鑑及投訴機制的可行性》。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97 年度研究報告。
- 黃蘭娒，2011，《修復式正義理念應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法務部委託計畫。
- 黃明陽，2008，《行政調解機制之比較——以消費爭議調解為中心》。台北：秀威資訊。
- 黃政達，2006，《我國修復式正義與刑案調解績能之實證研究》，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翠紋，1998，〈犯罪抗制策略的新典範-復歸性正義模式的社區參與〉。《社區發展季刊》82：58-69。
- 黃翠紋，2001，《婚姻暴力調解措施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翠紋、梁欣丞，2006，〈法院調解委員調解家庭暴力案件能力影響因素之研究〉，《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7(1)：79-104。
- 童淑枝，2009，《民事調解制度與相關調解案例分析－以鄉鎮市調解為中心》，政治大學法學院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彭南元，2008，〈法院家事調解模式之發展－以整合資源為例〉。《月旦法學雜誌》159：39-53。
- 楊利華、于麗英譯，邊克爾·努尼(Michael Noon)著，2006，《法律調解之道(Mediation)》。北京：法律。
- 鄭美里，2008，《遇合》。台北：印刻。

蔡文育，1994，《調解制度之研究－從訴訟外紛爭解決制度的角度出發》，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賴月蜜，2005，《澳洲、香港、日本之家事商談相關制度比較研究－兼論我國家事商談制度之現況與發展》，暨南國際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賴月蜜，2009，〈香港、台灣家事調解制度比較研究-以家庭暴力事件為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2)：247-289。

謝碧莉、黃莉雲、林敏蕙、賴月蜜，2008，《辦理家事調解參考手冊(一)基本概要》。台北市：司法院。

謝靜慧，2005，〈探尋家事調解新方向－以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法院處理家事調解經驗出發〉，《全國律師月刊》9(8)：13-23。

簡春安，1998，《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巨流。

顏厥安，2010，《臺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結果報告書》。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2011/1/3 下載自 <http://tadels.law.ntu.edu.tw/research.php?no=4>)。

羅朝勝，2004，《鄉鎮市調解之研究》，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英文文獻

Bazemore, G. and Walgrave, L. 1999. Restorative juvenile justice: in search of fundamentals and an outline for systemic reform. In *Restorative Juvenile Justice: Repairing the Harm of Youth Crime*, eds. Bazemore, G. and Walgrave, L. , Monsey, NY: Criminal Justice.

Braithwaite, J. 2000. Standards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In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Criminal Justice: Competing or Reconcilable Paradigms*, eds. A. von Hirsch et al, Oxford: Hart.

Braithwaite, J. 2002.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sponsive Reg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Burnside, J. and Baker, N. eds. 1994. *Relational Justice: Repairing the Breach*. Winchester: Waterside.

Christie, N. 1977. Conflicts as property. *British Journal* 17: 1-15.

Folberg, J and Taylor, A. 1984. *Mediation: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Resolving Conflicts without Litig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Huang, Hsiao-Fen, A Contradiction and an Alliance among 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ies, Feminism and Confucianism: From Taiwan Exper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for the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Taipei, Taiwan, December 16-19, 2011.

Johnstone, G. and Van Ness. D. W. 2007. *The meaning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eds. Johnstone. G. and, Van Ness. D. W., Portland: Willan.

Liebmann, M. 2007. *Restorative Justice: How It Works*. Philadelphia: Jessica Kingsley.

Lincoln, Y. S. and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rshall, C. D. 2001. *Beyond Retribution: A New Testament Vision for Justice, Crime and Punish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McCold, P. 2004. Paradigm muddle: the threat to restorative justice posed by its merger with community justice.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7: 13-35.

O'Connell, T., Wachtel, B. and Wachtel, T. 1999. *Conferencing Handbook: The New Real Justice Training Manual*. Pipersville, PA: Piper's.

Raye B. E. and Roberts A. W. 2007. Restorative process. In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eds. Johnstone, G. and Van Ness, D. W, Portland: Willan.

Robinson, P. H. 2003. The virtues of restorative processes, the vic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Utah Law Review* 1: 375-388.

Roche, D. 2001. The evolving defini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4:341-353

Salius J. A. and Mazuro, D.S. 1988. *Mediation of child-custody and visitation disputes in a court setting*. In *Divorce Medi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eds. J. Folberg and A. Milne, New York: The Guilford.

Strang, H. and Braithwaite, J. eds. 2001.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Sullivan, D. and Tifft, L. 2001. *Restorative Justice: Healing the Foundations of Our Everyday Lives*. Monsey, NY: Willow Tree.

Umbreit, M. S., and Coates, R. B. 1992. The impact of mediating of victim offender conflict: An analysis of programs in three states.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ournal* 43 : 21-28.

Young, R. 2003. Just cops doing “shameful” business? Police-led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the lessons of research. In *A Restorative Justice Reader: Texts, Sources, Context*, eds. Johnstone. G, Cullompton: Willan.

Zehr, H. 1990. *Changing Lenses: A New Focus for Crime and Justice*. Scottsdale, PA: Herald.



附錄一 鄉鎮市調解條例

第一條（調解委員會設置及任務）

鄉、鎮、市公所應設調解委員會，辦理下列調解事件：

- 一、民事事件。
- 二、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第二條（組織）

調解委員會由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組織之，並互選一人為主席。

鄉、鎮、市行政區域遼闊、人口眾多或事務較繁者，其委員名額得由縣政府酌增之。但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五人。

第三條（調解委員）

調解委員會委員（以下簡稱調解委員），由鄉、鎮、市長遴選鄉、鎮、市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提出加倍人數後，並將其姓名、學歷及經歷等資料，分別函請管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共同審查，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額，報縣政府備查後聘任之，任期四年。連任續聘時亦同。

調解委員出缺時，得補聘其缺額。但出缺人數達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而所餘任期在一年以上者，應予補聘。

前項補聘之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時為止。

調解委員中婦女名額不得少於四分之一。

第四條（調解委員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調解委員：

- 一、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提起公訴。
- 三、曾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過失犯罪或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 四、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
- 五、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五條（鄉鎮市長及民代不兼任原則）

鄉、鎮、市長及民意代表均不得兼任調解委員。

第六條（備查）

鄉、鎮、市公所應於聘任調解委員並選定主席後十四日內，檢附第二條及第三條有關資料，分別函送縣政府、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備查，並函知當地員警機關。

第七條（開會人數）

調解委員會調解時，應有調解委員三人以上出席。但經兩造當事人之同意，得由調解委員一人逕行調解。

第八條（臨時主席）

調解委員會開會時，主席因故不能出席者，由調解委員互推一人為臨時主席。

第九條（解聘）

調解委員有第四條情形之一，或經通知而不出席調解全年達總次數三分之一以上者，應予解聘。

前項解聘，應送縣政府、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備查，並函知當地員警機關。

第十條（調解聲請程式）

聲請調解，由當事人向調解委員會以書面或言詞為之。言詞聲請者，應製作筆錄；書面聲請者，應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

前項聲請，應表明調解事由及爭議情形。

第一條所定得調解事件已在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者，不得聲請調解。

第十一條（聲請調解之要件）

聲請調解，民事事件應得當事人之同意；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應得被害人同意，始得進行調解。

第十二條（裁定移付調解之事件）

第一審法院得將下列事件，裁定移付調解委員會調解：

- 一、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之事件。
- 二、適宜調解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
- 三、其他適宜調解之民事事件。

前項調解期間，訴訟程式停止進行。但調解委員會於受理移付後二個月內不成立調解者，調解委員會應將該事件函送法院，續行訴訟程式。

第一項裁定不得抗告。

第十三條（調解之管轄）

聲請調解事件之管轄如下：

- 一、兩造均在同一鄉、鎮、市居住者，由該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 二、兩造不在同一鄉、鎮、市居住者，民事事件由他造住、居所、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刑事事件由他造住、居所所在地或犯罪地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 三、經兩造同意，並經接受聲請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同意者，得由該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不受前二款之限制。

第十四條（調解委員會之選定）

法院移付之調解事件，由被告住、居所、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之調解委員會調解。但經兩造同意由其他調解委員會調解，並經該調解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調解期日）

調解委員會接受當事人之聲請或法院之移付後，應即決定調解期日，通知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場。

前項由當事人聲請者，調解委員會並應將聲請書狀或言詞聲請筆錄繕本一併送達他造；法院移付者，法院應將兩造當事人於訴訟進行中之書狀影本移送調解委員會。

第一項調解期日，應自受理聲請或移付之日起，不得逾十五日。但當事人聲請延期者，得延長十日。

第十六條（委員迴避）

調解委員對於調解事項涉及本身或其同居家屬時，經當事人聲請，應行迴避。

第十七條（推舉列席人）

當事人兩造各得推舉一人至三人列席協同調解。

第十八條（參加調解）

就調解事件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調解委員會之許可，得參加調解程式。調解委員會並得逕行通知其參加。

前項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雙方當事人及其本人之同意，得加入為當事人。

第十九條（保守秘密）

調解，由調解委員於當地鄉、鎮、市公所或其他適當之處所行之。

調解程式，不公開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調解委員、列席協同調解人及經辦調解事務之人，對於調解事件，除已公開之事項外，應保守秘密。

第二十條（調解期日不到場）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解期日不到場者，視為調解不成立。但調解委員會認為有成立調解之望者，得另定調解期日。

第二十一條（審究事實及調查證據）

調解應審究事實真相及兩造爭議之所在；並得為必要之調查。

調解委員會依本條例處理調解事件，得商請有關機關協助。

第二十二條（調解態度）

調解委員應本和平、懇切之態度，對當事人兩造為適當之勸導，並徵詢列席協同調解人之意見，就調解事件，酌擬公正合理辦法，力謀雙方之協和。

調解事件，對於當事人不得為任何處罰。

第二十三條（不收費原則）

調解，除勘驗費應由當事人核實開支外，不得徵收任何費用，或以任何名義收受報酬。

第二十四條（違法調解）

調解委員或列席協同調解之人，有以強暴、脅迫或詐術進行調解，阻止起訴、告訴或自訴，或其他涉嫌犯罪之行為，當事人得依法訴究。

第二十五條（調解書之製作）

調解成立時，調解委員會應作成調解書，記載下列事項，並由當事人及出席調解委員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 一、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如有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時，其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
- 二、出席調解委員姓名及列席協同調解人之姓名、職業、住、居所。
- 三、調解事由。
- 四、調解成立之內容。
- 五、調解成立之場所。
- 六、調解成立之年、月、日。

前項調解書，調解委員會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三日內，報知鄉、鎮、市公所。

第二十六條（調解書審核）

鄉、鎮、市公所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轄之法院審核。

前項調解書，法院應儘速審核，認其應予核定者，應由法官簽名並蓋法院印信，除抽存一份外，併調解事件卷證發還鄉、鎮、市公所送達當事人。法院移付調解者，鄉、鎮、市公所應將送達證書影本函送移付之法院。

法院因調解內容牴觸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不能強制執行而未予核定者，應將其理由通知鄉、鎮、市公所。法院移付調解者，並應續行訴訟程式。

調解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送達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法院核定之效力）

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

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第二十八條（法院核定之效力）

民事事件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者，訴訟終結。原告得於送達法院核定調解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請退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

第二十九條（法院核定之效力）

因當事人聲請而成立之民事調解，經法院核定後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

法院移付而成立之民事調解，經核定後，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續行訴訟程式。

前二項規定，當事人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後三十日內為之。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一項、第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三十條（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

調解不成立者，當事人得聲請調解委員會給與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應於聲請後七日內發給之。

法院移付調解之事件，經調解不成立者，調解委員會應即陳報移付之法院，並檢還該事件之全部卷證。

第三十一條（視為告訴）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

第三十二條（半年調解概況之備查）

鄉、鎮、市公所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將前半年辦理調解業務之概況，分別函送縣政府、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備查。

第三十三條（秘書）

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置秘書一人，由鄉、鎮、市長指派鄉、鎮、市公所內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其相關學系畢業或經公務人員法律相關類科考試及格之人員擔任；業務繁重之鄉、鎮、市得置幹事若干人，由鄉、鎮、市長指派鄉、鎮、市公所內適當人員擔任；其設置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三十四條（經費）

調解委員會之經費，應由鄉、鎮、市公所就實際需要，編入鄉、鎮、市自治預算。但法院裁定移付調解事件之經費，由法院負擔。

為加強調解業務之推展，內政部、法務部及縣政府得按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績效，編列預算予以獎勵。

第三十五條（本條例之準用）

區調解委員會委員之聘任、連任或解聘，應由區長報請市政府同意後為之。

本條例除前項規定外，於直轄市、市之區調解委員會準用之。

第三十六條（法院移付調解辦法之訂定）

法院移付調解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三十七條（施行日）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附錄二 地方法院辦理家事事件調解實施要點

- 一、為發揮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功能，並有效結合社會資源，進行家事調解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 二、本要點所稱家事調解事件，指除監護及輔助宣告等相關事件，以及宣告死亡、撤銷死亡宣告事件外之人事訴訟調解事件。
- 三、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除適用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調解委員日費旅費及報酬支給標準及法院設置調解委員辦法外，並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離島法院有礙難情形者，得不適用本要點。
- 四、地方法院應置行政團隊，辦理篩選案件、選任調解委員、指派調解委員先行調解、監督考核調解進度等相關事務。
行政團隊應由院長、家事法庭庭長、院長指定之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暨專辦之法官助理或書記官等組成之。
- 五、家事調解事件繫屬於法院後，應依附件調解作業流程圖所示流程辦理之。
- 六、行政團隊辦理家事調解事件，應注意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三條第七項及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 七、法院應聘任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為調解委員，以供行政團隊選任：
 - (一) 曾任法官。
 - (二) 心理師。
 - (三) 社會工作師。
 - (四) 醫師。
 - (五) 律師。
 - (六) 具有心理諮詢或心理諮商之學經歷。
 - (七) 具有家事調解專業經驗。調解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調解委員受聘任前一年內接受司法院或各法院舉辦之專業講習課程未滿十二小時者，法院不得聘任之。
法院應將第一項調解委員名冊張貼於法院網站，並隨時更新之。
- 八、法院應依所需設置或增設調解室，及提供安全出庭環境與措施。
調解室應依司法院及所屬各機關辦公處所管理作業要點之規定布置，並置警鈴或其他安全設備。
- 九、行政團隊得以言詞、書面或其他方法簡介調解流程，鼓勵當事人進行調解，並促成兩造到場。
寄發第一次調解期日通知書時，並應附具調解相關說明資料。
- 十、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七條第一項規定委由主任調解委員或調解委員定續行調解期日時，宜以書面載明委任之旨。
調解期日不得僅通知當事人之一造到場。

調解期日當事人兩造或一造未到場，且未委任代理人到場時，調解委員應呈報行政團隊另行處理。

十一、調解委員行調解時，如認無成立之望，或當事人陳明無調解意願者，應於調解紀錄表記錄調解不成立並報請法官或司法事務官處理。

十二、調解委員行調解時，應遵守司法院訂頒之法院調解委員倫理規範。

十三、辦理家事調解或行調解時，不得有強令或轉介當事人接受心理諮商、治療或其他類此情事之行為。但提供政府機關或公益法人相關社會福利資訊或文宣供當事人參考者，不在此限。

十四、家事調解事件，自事件繫屬後不得逾四個月。

調解逾四個月仍未能成立調解者，除經兩造書面同意續行調解外，應即終結調解程序。

當事人陳明無調解意願，或有事實足認當事人無調解之意願或調解無成立之望者，應即終結調解程序。

十五、調解委員或其所屬之法人、機構、團體或事務所，已獲政府機關補助其辦理家事調解事件之費用者，不得向法院請求發給日費、旅費及報酬。

十六、調解成立時，已繳納之裁判費依法得退還者，行政團隊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訴訟繫屬中移付調解之事件，適用本要點。

十八、本要點除第十六點及第十七點規定外，於非訟事件法所定得協議之家事非訟事件準用之。

前項事件達成協議時，應將其協議內容記載於非訟程序筆錄。

十九、院長應每年定期召集家事法庭庭長、法官、司法事務官或其他人員辦理家事調解委員評鑑，決定是否予以解任或聘任，必要時得臨時辦理之。

二十、法院進行評鑑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法院設置調解委員辦法第五條各款情形。

（二）調解期日出勤率未達百分之七十五，應出勤日數俱含請假日數在內。

（三）接受專業講習之積極度。

（四）被陳情之次數及內容。

（五）調解態度。

（六）問卷調查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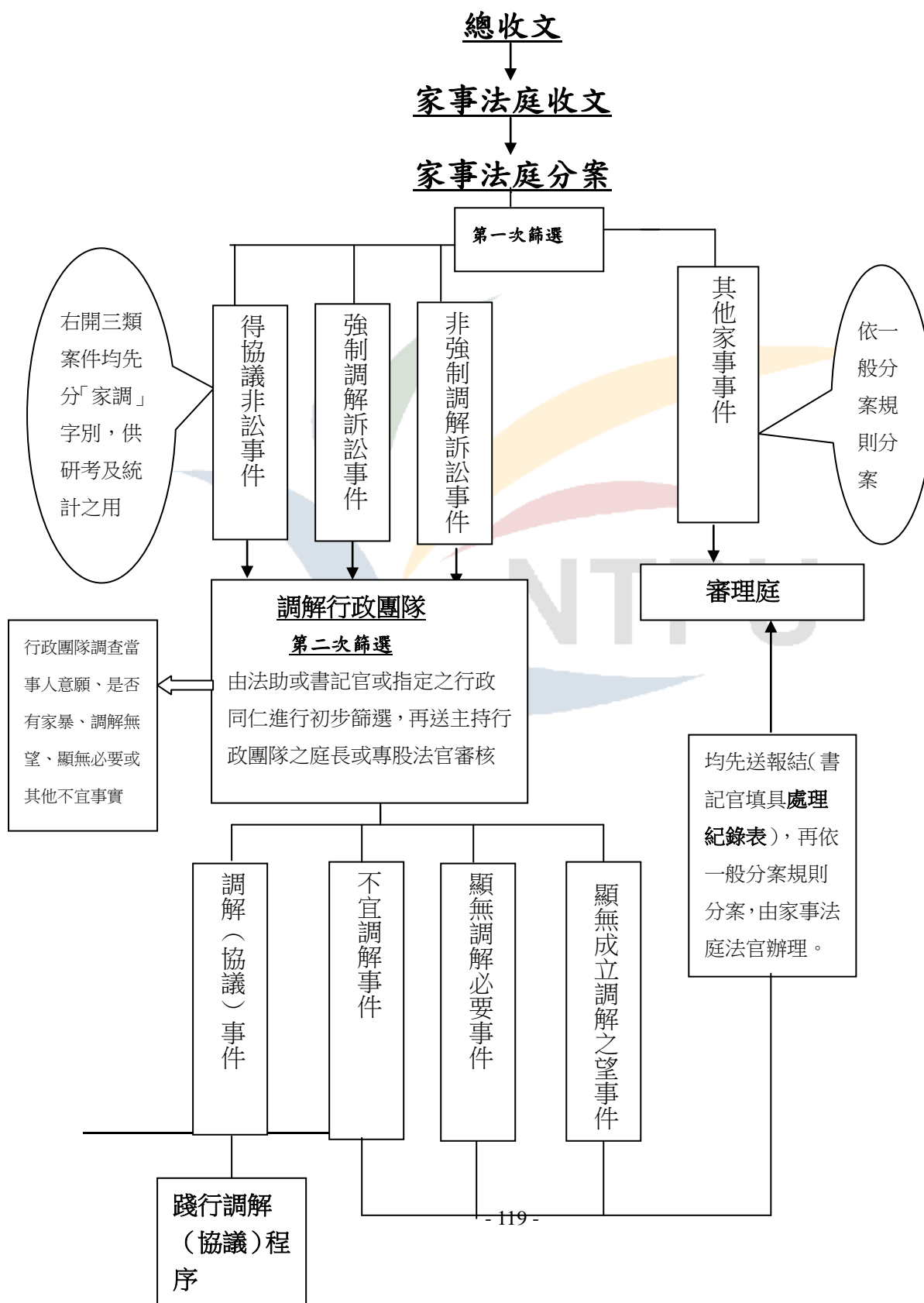
（七）調解程序中在場人員或調解行政團隊成員意見。

家事調解委員有前項第一款情形者，法院應予解任；有第二款情形者，一年內不得續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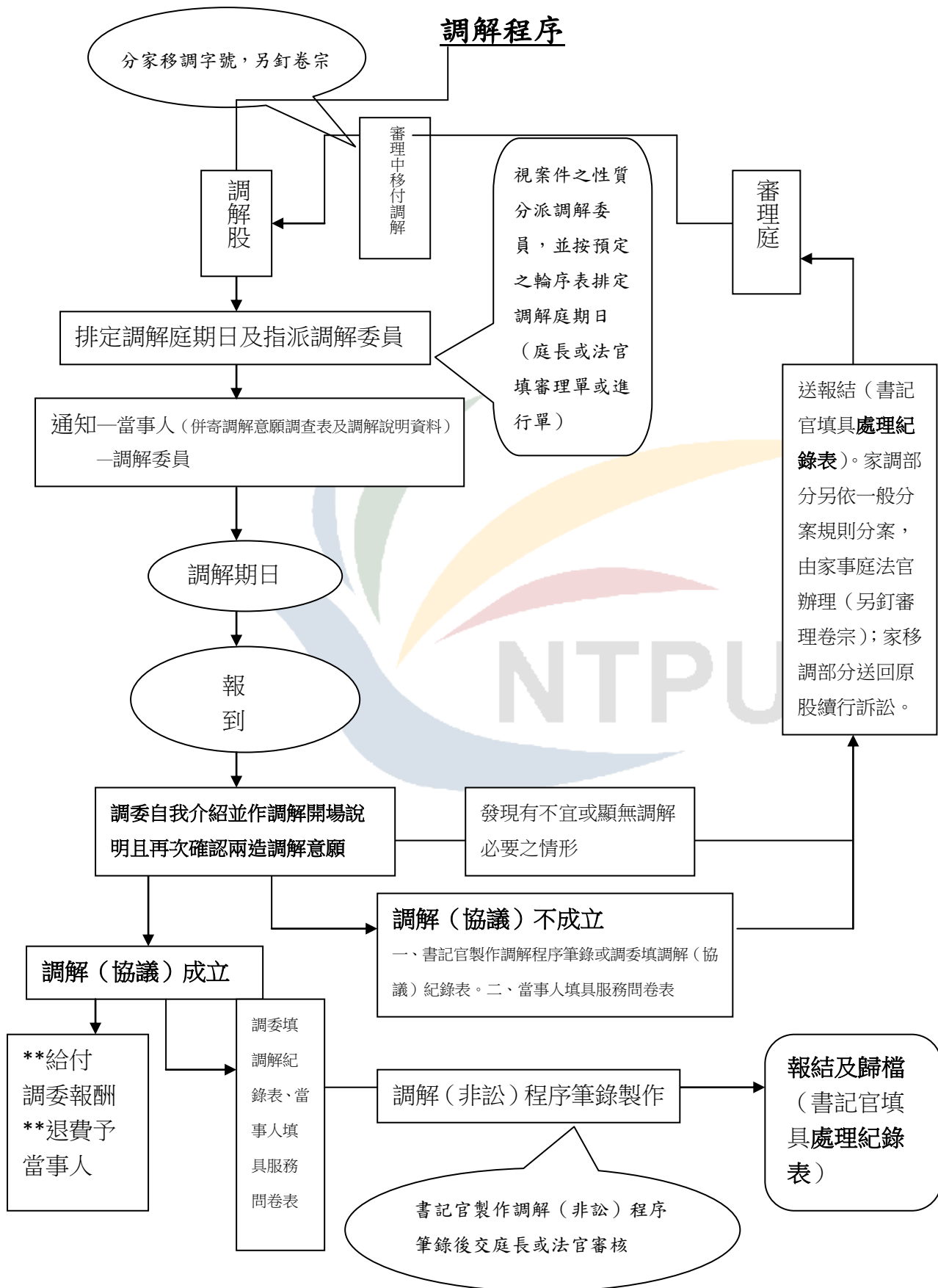
二十一、司法院及各地方法院每年應定期舉辦家事調解委員專業講習或座談會。

附錄三 家事調解作業流程圖

家事調解作業流程圖



家事調解作業流程圖（續）



附錄四 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法務部第 1157 次部務會報部長指示辦理事項。

貳、 前言

修復式司法 (Restorative Justice) 是對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們，即加害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甚至社區的成員或代表，提供各式各樣對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讓加害人認知其犯行的影響，而對自身行為直接負責，並修復被害人之情感創傷及填補實質損害。相對於以刑罰為中心的現行刑事司法制度，修復式司法關注的重點不在懲罰或報復，而是國家如何在犯罪發生之後，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並賦予「司法」一種新的意涵，即在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

目前已有逾 20 個國家運用修復式司法，且依國情發展不同的模式，如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家庭協商會議 (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和平圈 (Peace Making Circle, 或稱量刑圈, Sentencing Circle)、社區修復委員會 (Community Restorative Boards)，其中，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簡稱 VOM，其不同於我國現行調解制度)之運用最為廣泛。

而根據 2002 年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草擬「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mes in criminal matters, ECOSOC Res. 2000/14, U.N. Doc. E/2000/INF/2/Add.2 at 35 (2000)) 指出，以修復式司法處理犯罪，可達成提高當事人對犯罪處理結果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以及減少社會對立及恐懼等效益。

本部為逐步推動修復式司法、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於 98 年 7 月已核定「法務部推動修復式正義—建構對話機制、修復犯罪傷害計畫」，並在暫不修法之前提下，規劃推動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VOM」為主要模式之修復式司法方案，

初期擇定 5~7 處本部所屬檢察機關辦理試行方案，實施成果並將作為日後建構本土化修復式司法執行模式之參據。

參、 宗旨

- 一、 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群）進行充分的對話，讓當事人間有機會互相陳述、澄清案件事實、聽取對方的感受、提出對犯罪事件的疑問並獲得解答。
- 二、 讓加害人能認知自己的錯誤，有機會主動向被害人、雙方家庭及社區(群)真誠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並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之正向轉變，以改善自己與家庭、被害人及社區（群）之關係，俾助其復歸社會。
- 三、 提昇加害人對修復與被害人間關係的自信與動力，協助其啟動再整合之重建機制，並降低其再犯罪之機會。
- 四、 尊重被害人在犯罪處理程序有公平發聲的權利，讓被害人有機會描述其所經驗的犯罪過程、被害感受與直接詢問加害人，並表達他們的需求及參與決定程序。
- 五、 透過對話程序，讓被害人得以療傷止痛、重新感受自己仍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且能進一步了解加害人，而減少因被害產生的負面情緒。
- 六、 提供一個非敵對、無威脅的安全環境，讓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群）能完整表達其利益及需求，並獲致終結案件的共識及協議，以達到情感修復及填補實質損害。

肆、 辦理機關

- 一、 主辦機關：法務部
- 二、 試辦機關：由有試辦意願之檢察機關提報實施計畫，並經本部審核通過後辦理。

伍、 實施策略（流程圖請參附表 A）

- 一、 本部辦理部分：

- (一) 邀集學者專家、相關司處、本部所屬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組成任務性編制之諮詢小組，負責審核遴選試辦機關及統籌督導本計畫之實施。
- (二) 由本部保護司組成工作小組，負責規劃及執行，得視需要派員至試辦機關參與、觀察，並作成紀錄，以為未來推廣修正之參考。
- (三) 編製宣導素材及推動工作手冊（含簡介、申請須知、辦理要點、訓練教材、實施流程及相關表格/範例）。
- (四) 舉辦方案推動人員之基本教育訓練及修復促進者初階訓練。
- (五) 為瞭解實施過程並評估實施成效，得委託辦理方案成效評估研究及過程影像紀錄。

二、 試辦機關辦理部分：

- (一) 首需結合檢察、觀護、矯正人員與從事法律、心理諮商、社會工作、犯罪預防、被害人保護、更生保護及社區服務等專業團體、人士，共同組成執行小組，負責實施計畫之擬定及執行，並可邀集相關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
- (二) 視當地資源之特性，案件類型與當事人之需求評估，並參考本計畫之實施原則，規劃可行之試行模式。
- (三) 提報本部審定之實施計畫奉核後，應針對實施地點之相關人員，召開說明會。
- (四) 審慎選擇適當進行修復之案件及有參與意願之當事人(選擇標準請參陸、實施原則之二、三)。
- (五) 試辦機關應遴選具備下列要件之修復促進者，以中立第三者之角色，協助當事人經由對話完成犯罪傷害之修復：

1. 認同且充分了解修復式司法之理念、價值及進程序。

2. 具有真誠溫暖、同理心及良好溝通能力的特質。
3. 有參與被害人或加害人或其他助人工作之經驗。
4. 具備法律、心理、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知識、技能及經驗。
5. 可全程參與本方案之訓練及實習課程。
6. 能遵守保密責任、例外之預警責任及注意事項。（詳參附件）

（六）協助修復促進者參與本部之初階訓練課程，並配合本部或視需要自行辦理進階訓練。

陸、 實施原則

- 一、 偵查、審判、執行、保護管束、更生保護等階段，皆可運用本方案。
- 二、 依罪名、犯罪結果及當事人特性，排定適合參與本方案當事人之優先順序（建議以微罪、少年犯罪案件等優先，待試行成熟後再擴大實施），惟順位在後者如經評估仍認合宜，亦得進行。
- 三、 參與當事人或案件性質須具備下述要件：
 - （一）加害人必須先有認錯及承擔責任之意。
 - （二）加害人無重大前科。
 - （三）當事人未因罹患精神疾病致減損其溝通表達能力。
 - （四）當事人皆未因藥物濫用致有影響對話進行之虞。
 - （五）未成年之被害人或加害人，應經監護人同意或陪同參加。
 - （六）無被害人之犯罪及兒虐案件，暫不列入。
- 四、 尊重當事人之自主意願及權利（雙方均可提出申請或自願進行修復式程序），如當事人一方無參與意願，決不可強

制其參與。

五、 不得有意或無意強制加害人道歉或促使被害人接受道歉。

六、 適用修復式司法程序之案件，其原有之偵查、審判、執行、保護管束等程序仍併同進行。刑事偵查案件如因依本計畫進行修復式程序，致該偵查案件顯無法依「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第 35 點規定限期終結者，承辦檢察官得簽經該署檢察長核准，暫行報結，期間以 3 個月為限。

七、 當事人於參與過程之陳述、協議及履行情形，該案件承辦檢察官或公訴檢察官得自行衡酌是否列入偵查終結處分或提供法院作為量刑之參考；當事人一方如為在監受刑人，其收容監獄亦得衡酌是否將前開情形列入陳報假釋參考。

柒、 實施流程

一、 修復程序：依序為申請或轉介、開案、評估（二階段）、對話前準備、對話、後續追蹤及轉向措施、結案。說明如後（流程圖示參附表 B）：

（一）申請或轉介

有意願之加害人、被害人，可透過檢察官、法院、監所、觀護人、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及更生保護等機構之轉介或自行申請參與本試行方案。

（二）開案及評估

1. 第 1 階段評估（試辦機關成立方案專責小組辦理）：

（1）試辦機關應成立方案專責小組負責受理前項申請或轉介，並初步評估加害人是否符合前揭「實施原則」三之各款要件，必要時應與加害人面談，以求審慎。

- (2) 方案專責小組完成前項評估後，如認不適宜進行修復程序，應告知被害人及予以註記結案；如認適宜，即將本案全案轉送修復促進者，並提供有助其一定程度了解犯罪事件內容及當事人基本資料之資訊，俾供其展開修復之準備程序（如該案件尚在偵查中，應敦促其注意保密義務，以符合偵查不公開原則）。

2.第 2 階段評估（修復促進者辦理）：

- (1) 修復促進者分別與加害人、被害人及有必要參與之社區成員見面確認意願及是否適宜進行。
- (2) 修復促進者倘認當事人尚不宜面對面對話，可先以書信或其他間接方式互動，等評估適宜後，再安排雙方會談。
- (3) 經修復促進者評估認不適宜進行對話，本案即應終結，並分別轉知當事人，且將結果回報試辦機關評估小組，完成結案；倘認適宜者，即準備展開對話程序。

（三）對話前準備（修復促進者）

1. 事先需分別與雙方直接見面，了解雙方的情形及需要，並建構當事人間信賴與和睦的基礎。
2. 直接對話前應向當事人提示相關資訊，如對話程序、雙方權益、潛在危險及有關加害人之資訊。
3. 判斷有無適合陪同出席的親友或其他有正面支持力的人，並經當事人同意，邀請其陪同出席。
4. 注意雙方的身體健康及精神狀態是否適合對話。
5. 確保當事人之安全及解答其疑問。

（四）對話

1. 對話的概念及方式：

- (1) 經由修復促進者之召集面會或居間連繫，使當事人得以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或需求。
 - (2) 原則上以面對面之對話方式為主。但得視實際狀況採間接之書信、電子郵件、電話或遠距接見等方式（惟執行階段，因考量矯正機關之特殊環境及設備等限制，無法採用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進行）。
 2. 參與成員，原則以被害人、加害人為主，雙方家屬或陪伴人員需經修復促進者邀請或評估後參與。
 3. 試辦機關應提供和善、安全、平等及不受干擾的對話環境。
 4. 對話的主要內容：
 - (1) 描述犯罪事件。
 - (2) 結果及影響（包括感受及實質損害）。
 - (3) 修補犯罪傷害的責任者及方法。
 5. 對話過程應予觀察記錄，以便討論評估下次對話之方向與主題，並供為本方案試行成效及修正之參考。
- (五) 後續追蹤及轉向措施
1. 修復促進者應進行後續追蹤，以了解被害人對話後之需求及加害人履行協議之情形。
 2. 試辦機關於修復促進者回覆追蹤情形後，如認必要，應採行辦理下列轉向措施：
 - (1) 被害人如尚有心理諮商、醫療或生活重建等需求，應徵得其同意後轉介至適當機構，提供必要之協助。
 - (2) 當事人共同協議結果，如一定金額之賠償、向被害人道歉、參與社區服務或公益活動等，試辦機關之執行小組應依實際情狀，適時轉向導入民事和解、

試行調解、緩起訴處分、協商判決等程序，以取得執行名義或供為緩起訴、協商內容之參考。

(六) 結案

試辦機關應就修復程序訂立結案期限，如修復程序未能於該期限內完成者，其法律修復部分，應予終結，至情感修復部分，得依修復促進者之評估建議，另以專案續行辦理或予以轉介專業機構。

(七) 修復促進者應隨時評估修復進行狀況並決定是否繼續或結束；當事人亦可在任何階段決意暫時中止或完全結束。

二、 成果報告：試辦機關完成試辦計畫成果報告。

三、 成效評估：本部應自行或督導試辦機關進行方案成效評估（如針對執行人員、當事人、修復促進者等進行參與意見調查）。

捌、 執行期程

自本計畫函頒之日起 1 年，必要時得延長之。

玖、 成效評估

一、本計畫之辦理期間，工作小組與試辦機關隨時研商、評估、指導、調整實施方式。

二、試辦機關應於執行期程(10 個月)終結後 1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專案報部。

拾、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試辦機關相關經費或結合公益團體及社會資源共同辦理。

拾壹、預期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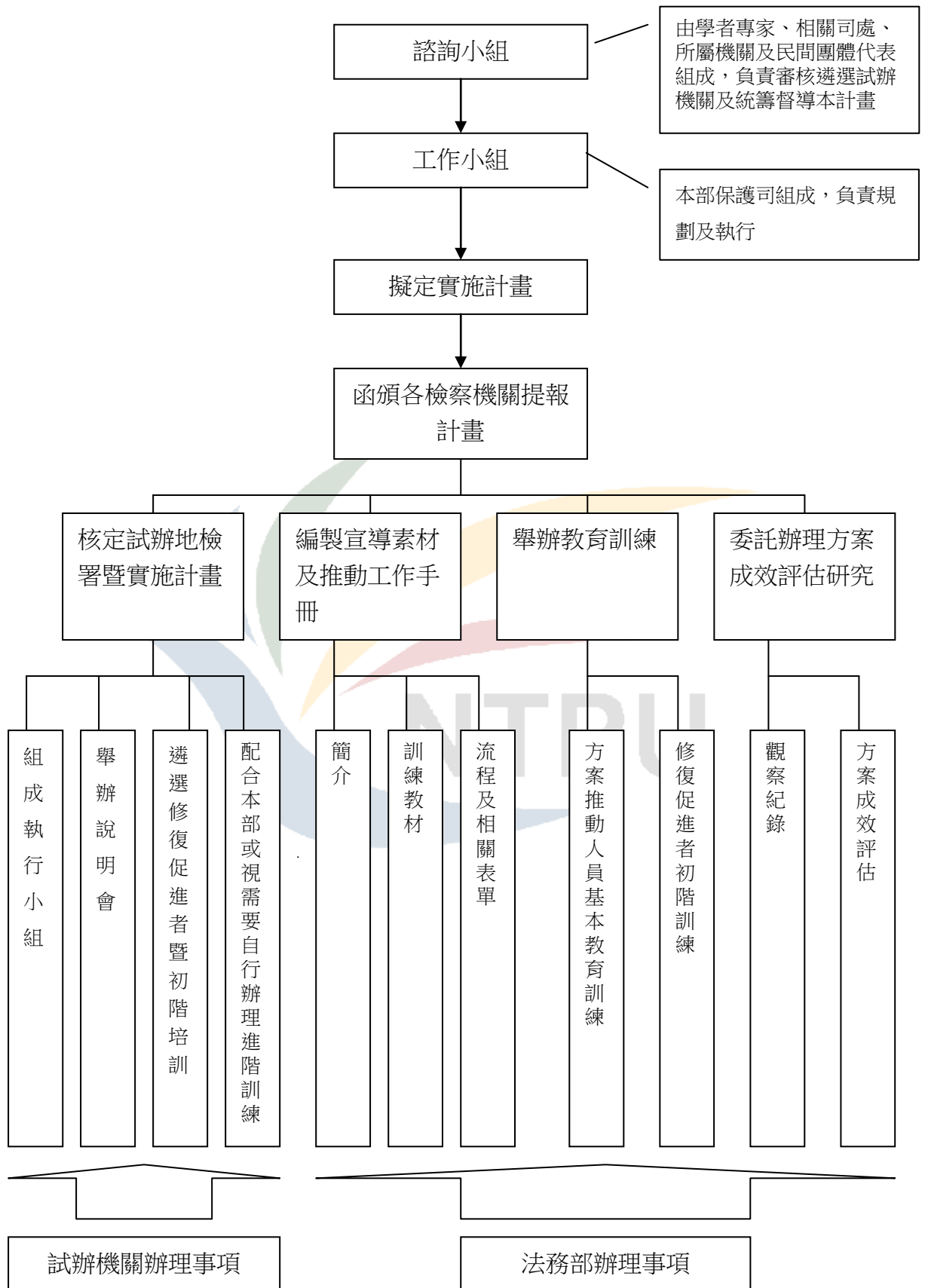
一、 本計畫具實驗性質，實施成果將提供未來本部檢討修訂修復式司法實施計畫之參據，並提供全國各檢察機關辦理修

復式司法方案之參考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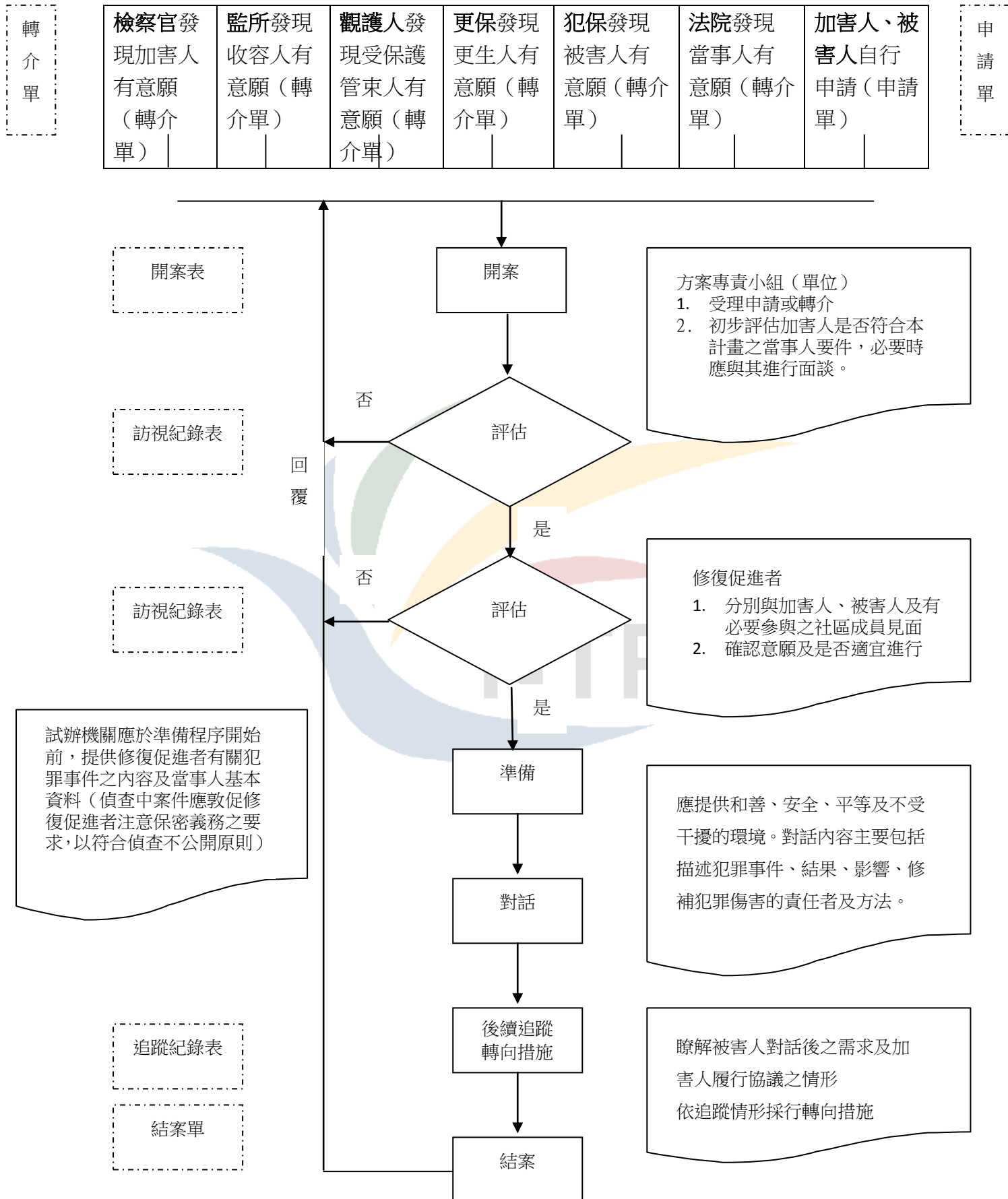
- 二、 現行司法制度著重對過去行為的懲罰，無法達成預防犯罪的實質效益，而修復式司法具有未來性，強調如何修復犯罪造成的損害，預期能消解犯罪的導因及減少再犯。



附表 A--法務部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作業流程



附表 B--試辦機關(地檢署)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作業流程



修復促進者之保密責任、例外情形及注意事項

保密責任

基於保障參與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當事人的隱私權，當事人有權要求修復促進者為其保密，修復促進者也有責任為其保密。

保密責任之例外情形

- A.當事人親自或透過法定代理人、法律代表而自動表示放棄。
- B.如保密之內容或當事人的行為，將緊急或嚴重危及當事人、第三人或公眾之生命及安全，修復促進者負有向其監護或監督者或該第三人或可能之受害者預警的責任。
- C.基於法律的規定(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之通報義務)。
- D.當事人有致命危險的傳染疾病等。
- E.評估當事人有自殺危險時。
- F.法院命令透露相關資料。
- G.當事人同意第三人在場時。

其他注意事項

- a.基於上述的例外情形，修復促進者必須透露過程中獲悉之當事人資料時，應先考慮當事人的最佳利益，再提供相關的資料。
- b.修復式程序之對話階段係採團體進行方式時，修復促進者應告知參與者保密的重要性及困難，隨時提醒參與者保密的責任，並勸告其等為自己設定公開隱私的界線。
- c.修復促進者應妥善保管相關資料，未經當事人的同意，任何形式的記錄皆不得外洩。但因本試行方案之個案研討、督導諮詢、機構研究或評估之需要，必須運用當事人於修復對話程序中透露之資料時，應預先告知當事人並徵得其同意，並設法為當事人的身份保密。
- d.與修復促進者共事的非專業人員，包括助理、雇員、實習學生及義工等，若有機會接觸相關資料時，應告誡他們為當事人保密的責任。
- e.當事人本人有權閱覽修復促進者製作之記錄，除非這些資料可能對其產生誤導或不利的影響。
- f.修復促進者如認有轉介之需要，於徵得當事人同意後，得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轉移相關資料。

附錄五 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 參與動機與理念

【1-1 修復促進者參與動機】請問您當初是什麼樣的機緣成為修復促進者的？參加的動機是？是否有參加訓練講習？

【1-2 修復促進者之背景】請問您有信仰宗教嗎？您先前的相關工作經驗為何？

【1-3 對修復式司法的看法】您所認知的修復式司法是什麼？您覺得它是如何看待加被害者在事件中的角色？您認為被害人是否也有某種程度的責任？

【1-4 對於雙方當事人關係的看法】您認為雙方當事人本來即認識或本為陌生人，對於對話的進行有何影響？您認為兩種同樣值得修復嗎？為什麼？

第二部分 對修復程序之認知與對話前之準備工作

【2-1 工作模式】您與地檢署以及其他的促進者合作的模式為何？

【2-2 初篩】請問您會透過什麼方式瞭解當事人是否適合參與(ex:是否精神狀況異常或有用藥等等)？

【2-3 準備步驟】請問您在對話前做了哪些準備工作？步驟為何？這些準備工作有何重要性？

【2-4 傳遞修復司法理念】當您向當事人解釋修復式司法的措施時，他們是否能瞭解？您覺得這個概念在臺灣社會被接受的程度如何？

【2-5 當事人初次反應】請問您大多如何接觸當事人？接觸時有何困難嗎（不同的案件在不同的階段，會不會使得接觸的困難度不同，是如何去克服的）？當事人的反應如何（願意或不願意）？願意或不願意參與的理由為何（您覺得什麼因素會影響當事人的反應）？

【2-6 說服當事人參與】當事人的情緒反應為何？您如何減少當事人的抗拒？是否會試圖說服當事人參與？如何說服？請舉例說明之。

【2-7 確認意願】您如何確認當事人瞭解並願意進入修復程序？若當事人一開始表明不願意則會進行到何種程度始放棄？

【2-8 對話前雙方對案件事實及責任歸屬的認知】在對話前您是否跟雙方確認事件發生過程及各自的責任？雙方認知相同與否有何差異？會影響您評估案件是

否可進入對話程序嗎？您認為加害人的道歉是進行對話必要條件嗎？

【2-9 對話定位之設定】在對話進行之前，您心裡是否已然設定將何種目標(例如責任或情緒或協議)置於首位？各種目標間的次序為何？這個目標與您對話流程進行的設定一致嗎？其考量點又在何處？加害人的需求或被害人的需求是您關心的焦點？或兩者一樣重要？

【2-10 修復促進者角色】您覺得自己在對話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樣的角色是否容易扮演？這樣的角色是否符合當事人的期待？

【2-11 當事人對於修復式司法的認知】就您的觀察，當事人在整個修復式司法流程中是否已能充分明瞭修復式司法之價值與目標所在？

【2-12 雙方比較】就您的觀察，參與者在對話結束後，哪一方會呈現較高的滿意度？原因為何？

【2-13 未對話原因】若當事人未進行對話也沒有任何形式的互動，大部分的原因是什麼？若雙方已進行對話但最後未能順利完成修復結果，原因又是什麼？

第三部分 (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之比較

【3-1 (家事)調解與修復之異同】就您同時有主持(家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的經驗來看，請問您認為(家事)調解與修復這兩個司法程序有何異同？(案類/準備/情緒/目標/協議/追蹤)

【3-2 (家事)調解之內部差異】調解又可細分為法院調解與鄉鎮市調解，而法院調解內似乎又分為民事/家事/刑前/少年調解，可以請您簡單談談這些調解各自的精神或差異嗎？您覺得哪一種調解較有修復式正義的精神？

【3-3 (家事)調解經驗之應用】您認為曾主持(家事)調解的經驗如何影響到您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序？有何利弊？

【3-4 (家事)調解是否含修復式正義之精神】有人認為現有的(家事)調解制度已經內含修復式的精神，因此主張不需要再另設修復式司法程序，您的看法是？

【3-5 兩程序之關係】在試行方案推動的過程中，有一些案件是調解不成才進入修復式程序，但也有人認為應該先進行修復再進入調解程序，您的看法如何？

【3-6 兩程序之互補】(家事)調解中的案件是否有些其實是適合以修復式司法程序來進行？在(家事)調解過程中，有沒有必要先以修復式司法程序恢復雙方關係？時機為何？

【3-7 兩程序中當事人意願之比較】調解似乎以當事人自行申請居多，而目前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的案件則大多是轉介而來，當事人不一定有意願進行修復，您認為這一點對於雙方對話的進行有何影響？為何會有這種差異？

第四部分 展望與建議

【4-1 制度之修正與配合】您認為未來是否該修正或增訂調解及修復式司法相關法規以互相配合？如果是的話應該往哪個方向進行？若是修改調解條例以融入修復式正義的精神，你的看法如何？

【4-2 誘因與公平性問題】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規定：「當事人於參與過程之陳述及協議，該案件之承辦檢察官或公訴檢察官得自行衡酌是否列入偵查終結處分或提供法院作為量刑之參考。」換句話說，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序的過程跟協議有可能影響被告在司法程序上所獲得之判決，有人認為這種誘因可能會影響被告參與修復式司法的動機，您的看法如何？這是否會有公平性上的疑慮？

【4-3 推行之困難】就您參與修復式司法至今的經驗，您認為推行修復式司法在目前臺灣社會的法制與環境上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有什麼克服的方法？

在結束之前，您是否還有任何要補充的？

最後，請教您一些簡單的個人基本資料：

出生年：民國 年

目前工作狀態：☐ (1)有全時工作 ☐ (2)自由執業者 ☐ (3)退休 ☐ (4)其他（請說明）

主要的專業訓練/工作範疇為：☐ (1)社會工作☐ (2)心理諮商☐ (3)法律☐ (4)醫療☐ (5)其他（請說明）

工作年資： 年 月

自何時開始擔任促進者： 年 月

曾接觸之案件： 件 實際主持之案件： 件

附錄六 訪談同意書

你好：

我是台北大學曾子奇，目前正在進行法務部委託之「修復式正義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研究案。研究目的之一為透過深度訪談之實證研究方式瞭解參與試行計畫相關人員對此一制度設計需求及建議。另外，我的研究論文希望探討、比較修復式司法制度與(家事)調解制度的異同及優缺點等等，這兩方面之研究進行皆相當需要您的協助。

為了尊重您個人權益且使研究順利進行，因此特別說明以下事項。除了以下事項外，您在受訪過程中有任何問題，均可以隨時提出：

- 一、 為了清楚瞭解您的經驗與想法，訪談過程中全程進行錄音。若在訪談中你有一些想法、談話內容不想被錄音，您可以當場提出要求。
- 二、 訪談的所有資料內容純為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在書面及口頭報告中，不會出現真實姓名。

如果您同意以上有關訪談之目的與作法，並同意接受訪談，請在本同意書簽署您的大名。很感謝您的參與與協助！！

訪談者簽名：_____受訪者簽名：_____

日期：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錄七 研究者逐字稿編碼分析過程範例

其實我覺得從修復式的目的是你不要再去傷害其他人，這才是真正就是說，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讓你去理解你對別人的傷害、人家有多麼的痛苦，進而你要約束自己的行為去符合國家的法律規定，過去可能是不小心吼，那可以理解(A1-015)

以此例而言，研究者先將其初步歸類為「修復式司法之目的」，復從受訪者回答之內容將此目的歸類在「預防再犯」中；以相同方式對其它受訪者回答之內容做分析整理，最後在「修復式司法目的」分類下的「預防再犯」一項中，除了上面引用的範例之外，尚有 E 的回答亦屬於此一分類條項：

我說這是一個新的政策，那主要的目的是預防犯罪，為什麼預防犯罪？我說犯罪發生了，第一個；那第二個，能不能預防我說其實不在於這一個...這一個不在於說當事人敢不敢做這件事情，而是在於當事人、那個犯罪者，他是不是對這個事情真實的內疚，他對他的行為是不是能產生一個真實的羞恥感，然後這個羞恥感才有辦法驅動他歸正，那我說那這個羞恥感通常有一個很重要東西是他必須要被害者原諒，那我想這是一個我的認知.....其實那是一個羞恥感的一個重建，如果他的羞恥感如果一直壓在這裡，我說人性是這樣子，人性就是說這個羞恥感壓力太大，那我就開始合理化，那透過合理化，他就可以把他的這個羞恥感消滅掉，那所以下次他再去做，ok 啊！.....那我也親眼目睹過說，當事人在沒有得到被害人的這個原諒之前，透過宗教、透過宗教得到釋放.....我想雙方當事人如果有一個平台讓他們去交流，我說或許對於受害的這一方就更容易諒解加害的那一方，那加害那方也更能夠明白受害的痛苦，那我、我大概解釋這樣。(E-047)

E 的此一回答除了說明其心中修復式司法的目的之外，於最後一段可以發現，這段引言的內容其實可以細分為「修復式司法目的」和「加、被害人對話目的」，從而將「加、被害人對話目的」獨立於「修復式司法目的」之外，進行下一次分類、歸類、分析之過程。

著作權聲明

論文題目：探討兼具調解經驗之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司法中的理念與實踐

論文頁數：137 頁

系所組別：犯罪學研究所

研究生：曾子奇

指導教授：黃蘭嫻

畢業年月：2012 年 7 月

本論文著作權為曾子奇所有，並受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保護。

